



俯仰之间

陈翰笙

——石西民纪念文集

姚北桦 王淮冰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0年5月石西民与夫人吴伟在重庆红岩纪念馆



石西民生平简述

杨润时

石西民同志原名石士耕,1912年11月4日(农历九月廿六日)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壶源乡石宅村。父亲石树勋,是一个不第秀才,清末在杭州读过新学。石西民出生时,家里靠祖上留下的田产和店铺过着殷实的生活。

1922年,石西民到离家50多公里的金华省立第七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1925年,考入建德县第九中学初中部。当时,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风起云涌,不久,北伐军兴,盘踞在浙江的孙传芳军阀势力兵败逃窜。石西民投身学潮,贴标语、打警察,经受革命的洗礼。他内心深处,经历着一场激烈的冲突——他再也不愿意像父辈那样安守祖业,在封建礼教束缚下,过那种寄生的乡绅生活。



1928年夏秋之际，石西民第一次来到上海，入群治大学高中部就学。这个16岁的青年学子，踽踽街头，依然能嗅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留下的血腥气息。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但是，地下的火在运行。一个偶然的机会，石西民遇到了初中时代的同学蒋治，他在上海艺专读书，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他的帮助和引导下，石西民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特别是当时蓬勃兴起的革命文学给石西民以巨大影响，郭沫若的《女神》、蒋光慈的小说……这些作品中那种有如熔岩奔突的革命激情，使他热血沸腾。正是在这一时期，石西民由大量阅读报刊而产生了从事新闻工作的愿望，他渴望能用手中的笔去无情鞭挞万恶的旧世界。这年10月，经蒋治介绍，石西民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

1929年2月，经蒋治介绍，石西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1930年3月，石西民担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部干事，从事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同时兼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后改为《红旗日报》）的通讯员。《红旗》是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创办的秘密出版的报纸。石西民采写的关于沪东工人运动的通讯，曾在《红旗日报》上发表。



这是石西民最初的党报工作实践。这期间,他还受组织派遣到浦江与诸暨交界地带策动武装暴动。九一八事变后,石西民两次参加上海学生集体赴南京请愿示威活动。在南京,上海学生与来自其他地方的爱国学生一起,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痛打外长王正廷。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1932年春,石西民转入上海公学,一面读书,一面积极从事学生运动。不久,因叛徒告密,两次遭到浙江国民党当局的通缉,石西民被迫转移到北平,在北平大学学习,并继续参加反帝大同盟活动。1933年5月,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打响了长城抗战第一枪。石西民于当月赶到张家口,加入抗日同盟军,并在吉鸿昌军部任政治宣传干事,英勇地参加了收复多伦、宝昌等战役。10月间,抗日同盟军失败,石西民结束了半年的军旅生活,潜回北平,因国民党宪兵搜捕,再度南下。

1934年1月,石西民在上海参加了由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骆耕漠、徐雪寒、姜君辰等同志发起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参加了《中国经济情报》的编辑工作。从这时起,石西民潜心研究经济问题,开始发表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论文,其中如《我国田赋的积弊和整理》、《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度营业报告



书》等论文，由于对国民党的腐败经济政策分析深刻、抨击有力而受到广泛注意。日本颇有名望的刊物《中央公论》曾刊载过石西民的经济文章。1935年华北事变后，石西民在中国人民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社会科学家联盟等组织内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此后，又进入《申报》，担任《申报周刊》编辑。他注意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国际形势问题成为世所瞩目的热点，于是，他克服种种困难，深入研究国际问题，写出《日本往哪里去》、《为什么川越会升任驻华大使》等一批有影响的国际评论，成为一些进步刊物国际问题的重要撰稿人。

1935年12月25日，上海市各界举行大规模的抗日爱国游行，声援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当游行队伍在南京路汇集的时候，指挥这次示威行动的负责人却因受到英国巡捕的包围而不能赶往现场，拥挤在马路上的游行队伍处于无人领导的状态，眼看要出现混乱。这时，游行队伍里走出一个中等身材、神情坚毅的青年，只见他来到队前，与扛横幅大旗的同志以及周围的群众简短地交谈几句，就带领队伍向上海北站进发。一路上，“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声和歌声响震黄浦江上空。游行队伍来到宝山路东方图书馆广场后，这位青年又出来主持召开大会，一些人登上临时搭起的台子发表讲演，表示坚决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



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继续前进,先后冲破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和英国巡捕的武装拦截,有十数人被打伤。沿途许多市民热烈鼓掌表示声援,几家西药房免费为受伤的人敷药包扎。游行队伍几度被冲散又几度汇聚,坚持前进,最后在上海北站集合。这位青年邀请几位受伤的同志一起站在石子堆上,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游行遂告结束。这位处变不惊、智勇兼备的青年人就是石西民。当时,他已获悉,被《申报》馆聘为《申报周刊》的编辑。

几天之后,即1936年1月初,他来到《申报周刊》上班。事有凑巧,这天正好新一期周刊出版。刊物的封里,赫然登着那天游行结束时石西民与受伤的青年高呼口号的照片。三四天后,《申报周刊》主编俞颂华先生约石西民谈话,指着这张照片问:“石先生,这是不是你?”石答:“是。”俞颂华先生说:“想不到你竟这样激烈!我要早知道,真不敢请你来工作了。”俞先生告诉石西民,《申报》、《申报周刊》影响很大,在这里工作要特别谨慎。这次谈话后,俞先生不但没有再提此事,而且对这个文思敏捷、沉稳勤奋的青年编辑信任有加。原来,俞颂华先生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他是在审阅来稿时发现石西民的,然后请石来到报馆面谈,经过考试,决定聘用石西民来任编辑。有



一次俞颂华曾与家人说：“在我编辑部的同仁中，将来最有前途的是石西民。”但是，当时俞先生却不知道，被他特别赏识的这个青年，已经有了8年的革命斗争史。

七七事变爆发后，石西民以《申报》记者身份，赶赴华北前线，采访了国民党华北军政要人孙连仲、宛平县长王冷斋等，采访了抗击日寇的士兵与民众，发表了《平津失守与平汉前线》等著名战地通讯。8月13日，石西民返回上海时，正逢日寇发动对上海的军事进攻，他又立刻转入对淞沪抗战的紧张报道。

不久，经党组织指示，石西民来到汉口。这时，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决定在汉口出版，章汉夫同志代表党组织通知石西民到《新华日报》参加创刊工作。1937年11月，石西民来到《新华日报》，开始了长达9年的中央机关报工作。

《新华日报》是民主革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中共中央机关报。1938年1月11日创办于汉口，1938年10月25日在日寇铁蹄踏进武汉的前夕迁往重庆，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以武力查封。在9年多的时间里，《新华日报》历尽艰辛，始终坚持在国统区复杂险恶的环境下出版发行。毛泽东、周恩来曾高度评价《新华日报》，说它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的又一支方面军。



《新华日报》在武汉时，社长是潘梓年，总经理熊瑾玎，总编辑先为华岗后为吴克坚，章汉夫任编辑主任。石西民负责要闻版的编辑工作。当时，王明在武汉，既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又顶着共产国际的吓人头衔，为推行他的右倾投降路线，不断对报纸工作横加干涉，经常训斥报社的领导和干部。石西民看不惯王明的家长制霸道作风，和章汉夫等同志经常进行抵制，王明便以派战地记者的名义，把他排挤出报社。1938年6月，石西民作为《新华日报》记者来到江西前线，这是石西民第二次当战地记者。

石西民早就向往到抗战前线，真正成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事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新华日报》发刊词），不想因受王明的排斥这个愿望得以实现，他感到十分兴奋。当时，徐州失陷，日寇进逼武汉，赣北一带炮火正烈，范长江、孟秋江等名记者都在南昌采访。石西民紧张奔波，出席过许德珩、雷洁琼等组织的抗日集会；与蒋经国作过长谈；在前沿指挥所听李汉魂将军分析战局、陈述坚持抗战、杀敌报国的决心；采访过薛岳、吴奇伟、冷欣、王耀武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战壕里，国民党下级军官和士兵曾向他讲述与日寇恶战三昼夜，血洒战地的故事。作为战地记者，石西民冒着生命危险，屡次赶往战事激烈的前沿。有一次遭到敌机轰炸，当他从



灰土中爬出时，发现身边的几个士兵已被炸死。他把满腔的热血凝于笔端，写出了《大战火烧山》、《战地访问李汉魂将军》、《金轮峰歼敌记》、《记九江姑塘战事》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战地通讯，向大后方人民如实报道了国民党爱国将士英勇杀敌的事迹，体现了党在国共合作中光明磊落的态度和党报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新闻作品在《新华日报》上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石西民也因之成为读者瞩目的名记者。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同志建议石西民到新四军军部去，既可采访，又可帮助创办报纸。于是，当年11月石西民动身去新四军，路上与黄源、邵荃麟等结伴同行。途经金华时，与在南昌时结识的吴伟同志结为终生伴侣。

经过长途跋涉，石西民于12月抵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村。当时，组建不久的新四军已取得赫赫战果，甚至在南京城郊与日寇展开了游击战，震慑了敌人，杀出了军威。石西民采写了《活跃在京芜的新四军》、《江南游击区横断面》、《一年来的新四军》、《越过江南敌人封锁线》等通讯，寄给《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发表，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报道了新四军英勇战绩。这些报道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1939年春，周恩来陪叶挺将军到达皖南，石西民参加了欢迎活动后，又单独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周恩来



指示他多向大后方报道新四军的战斗和工作情况，特别是多报道江南敌后的斗争情况。根据这一指示，石西民前往新四军一支队采访了陈毅同志，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陈毅将军访问记》。大后方民众通过这篇报道，第一次了解到陈毅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抗战名将的有关情况。石西民还参加过罗炳辉将军率队的夜间奔袭，到管文蔚所属的游击队深入采访……这些有声有色的报道，打开了大后方人民的眼界，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石西民在新四军军部，还筹备组织了军报《抗敌报》的出版，并担任了最初几期的编辑工作。他还发起了出版《新四军一日》的活动，并为新四军培训了一批新闻干部。

1939年夏天，石西民接到《新华日报》催他返回的电报。他又一次历尽艰险，终于在9月抵达重庆。这时的《新华日报》在人事上已有了很大变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成立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从此，《新华日报》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工作。继吴克坚之后，章汉夫任总编辑，石西民任编辑主任。从1939年4月起，国民党进一步强化新闻检查，重庆设立新闻检查机构，《新华日报》当然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一场检查与反检查的斗争就在《新华日报》与国民党当局之间激烈展开了。石西民作为主持夜班编辑工作的负责人，在南方局和报社领导的指示下，组织大



家采用违检、抗检、暴检(如开天窗)等方式,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与此同时,他继续深入研究日本问题,向在重庆的日本反战友人学习日语,大量阅读资料,撰写出一批有影响的国际评论,如《论米内内阁》、《由近卫到东条》、《日汪关系演变的新阶段》等等。他主持的“日本研究”专栏,因为资料丰富、立论深刻,受到各界重视,他本人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17日晚上,《新华日报》得知国民党最高当局发布乱命,诬指新四军为“叛军”,并强令重庆各报在第二天刊登。周恩来同志指示石西民与潘梓年一起,连夜到几家影响较大的民营报馆说明真相,揭穿国民党阴谋,希望他们在舆论上主持公道。回到报馆后,石西民又和章汉夫一起与前来坐镇监视的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斗智斗勇,使周恩来的著名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得以在第二天公开见报。在形势日益严峻的时候,党中央决定疏散《新华日报》人员,而石西民则是周恩来指定留下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三位干部中的一个。

1942年初,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新华日报》进行整风改版,石西民作为编辑部负责人,积极参加了改版的具体组织和实施。经过改版,《新华日报》成为一张具有鲜明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的“人民



的报纸”。1945年初，石西民改任采访部主任，他和报社同志一起，在重庆新闻界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2月，为抗议国民党特务制造“较场口血案”，他两次发起组织重庆新闻界大规模的签名活动，显示了党领导的国统区舆论统一战线的强大阵势和力量。

抗战胜利后，石西民于1946年4月奉周恩来、董必武之命，与中共代表团先遣人员一同前往南京，负责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南京版，并担任副社长。在此期间，他采访国共和谈，发表了著名通讯《时局的激流》、《“拖”“骗”已到尾声了》、《南京之秋》等。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新华日报》南京版未能出版。1946年10月，石西民随中共代表团由南京撤回延安，担任新华通讯社和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石西民到延安党中央机关报工作不长时间，胡宗南军大举进犯，根据党中央决定，石西民随廖承志率新华社大队人马长途跋涉，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建立新华社总社开展工作。党中央驻扎河北平山西柏坡后，决定抽调范长江、吴冷西、石西民、梅益等20余人集中到党中央所在地，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在半年的时间里，石西民经常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教诲和帮助。

1949年2月，石西民随新华社来到北京。1949年4月，南京解放的第二天，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即将



南下工作的党内外文化和新闻界人士。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把具有光荣历史的两张党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报名，分别给上海和南京。范长江去上海筹办《解放日报》，石西民去南京筹办《新华日报》。4月26日，石西民抵达南京，以军代表的身份负责接收国民党《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及中央广播电台，着手创办人民的新闻事业。4月29日，南京《新华日报》创刊，石西民任社长，兼任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和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与此同时还担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为适应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石西民主持创办了新华日报社和新华社南京分社新闻训练班，招收学员300多人，为军队和地方培养、输送了一批新闻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石西民继续在党的新闻和文化战线上努力工作。1950年3月，他在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全军新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关于新闻写作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党报的实践经验，探索新闻写作规律和文风问题。后来，这篇讲话被作为新闻工作的重要文献收入《中国报刊工作文集》。此后，石西民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54年2月，他被调至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副秘书长。

1955年5月，石西民被调往上海，在这里整整工作了10年，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市委



书记兼中共华东局委员和宣传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56年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作为分管宣传、文化、教育等方面工作的市委负责人，他真诚地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注意加强上海各级党组织和知识分子的相互信任，采取切实措施，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他倡议创办了上海文艺会堂，作为文艺界、学术界交流及增进友谊的活动场所。他破格提拔重用了一批专家，使他们的专业得以充分地繁荣社会主义文教事业发挥作用。1956年以后，党内“左”的思潮日益严重，为形势所左右，石西民也难免做过某些错事。但是，他的心毕竟是和广大知识分子相通的，他多次发表讲话和文章，公开批评“左”的错误。1956年，他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党的工作“还存在着很多的缺点和错误，最主要的表现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是宣传工作中严重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党八股气味”。“脱离现实、依靠条文等等，使我们目光如豆，思想僵化”。1959年7月，反右派斗争刚刚结束，石西民就在全中国医学界一次学术座谈会上说：“真理是靠实践检验的……科学不能少数服从多数，科学真理有时可能在少数人手里，不能用行政办法统一。历史上的教训太多了。”他还说：“不要随便戴帽子，不要随便定框框，不要轻易



下结论,不要以为这个方法对,别无其他方法了,那样就会限制与妨碍研究工作的发展”(以上引文均见《时代鸿爪》)。这样一些至今还闪现真理光彩的讲话和文章,在反右派、反右倾的年代发表出来,确实需要有超乎常人的勇气和胆识。石西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帮助下,一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文化人及青年免遭成为右派的厄运。石西民为保护著名翻译家傅雷过关,曾委托一位与傅雷比较熟悉的同志去做工作,劝说傅能在上海市作协的会议上检讨几句“过关”,遭到傅雷的拒绝。傅雷由于被打成右派,出版社不敢接受他的译稿,生活十分窘迫。石西民得知,想了许多办法,改善了傅雷的境遇。著名作家、编审何满子被错划右派后,长期在宁夏服苦役,不堪折磨,气息奄奄。在绝望中,他抱着“姑妄试试”的心情致函石西民,请求援助。他没有想到,信发出不久,就收到调回上海工作的通知。这些往事,在上海老一辈文化工作者中间几乎有口皆碑。

1957年,党中央接受舒新城先生的建议,把重新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上海,市委指定石西民主管这项工作。编纂这部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书,是一项工作浩繁的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为此调动了全国近5000名专家学者的力量,全国所有最著名的学者,几乎都为修订《辞海》付出了心血和劳动。石西民



精心组织和协调各方面工作,努力排除“左”的干扰,使《辞海》(未定稿)在较短时间内得以问世。孰料这项巨大贡献,竟成为10年动乱中批斗他的罪名之一。

石西民在上海主管宣传文教工作期间,非常重视文艺创作和传统剧目的改编工作,加强文艺队伍的建设。在他的直接关心领导下,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电影、戏剧、音乐、舞蹈作品,有的并饮誉海外。他主持创办的上海舞蹈学校、电影专科学校和他积极支持的上海戏曲学校等,为上海和华东地区输送了大批文艺骨干,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长为一代著名艺术家。他为促进上海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社会科学和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的建设,付出了巨大心血,功绩卓著。

1965年,石西民被调至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部党组副书记兼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文化大革命”中,石西民遭到残酷迫害,失去人身自由达九年之久,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他坚持正义,拒绝诬陷其他同志。1975年始获自由,后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组织推翻了“四人帮”强加在石西民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1980年3月,他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主管社科院科研规划和组织工作。这期间,石西民开始推动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工作,他曾到重庆、成都、武汉、南京、上



海等地广泛搜集资料,深入研讨几十年来党的新闻事业的经验和教训,研讨党的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学者与战士》、《党报史上的光辉一页》、《增强党性深入群众》等重要文章。他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热心培养青年学者,指导新闻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关心社会科学和新闻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在他的推动和组织下,成立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这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团体,他与张友渔等一批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被大家推举为学会负责人。石西民为党报史这门新学科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开创奠基作用。

1983年,石西民退居二线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名誉所长、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他继续为指导《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而呕心沥血,直到病危期间,仍在关心这些工作的进展。

1987年10月17日,石西民同志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75岁。



目 次

怀石西民同志	唐 弢	1
知己石西民	李纯青	6
挚友石西民	陆 诒	9
为马克思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者	杨西光	15
西民同志周年祭	袁 啸	20
“不为物喜,不为己忧”	尚 丁	23
哭西民同志	左明德	29
50年前认识石西民	张林岚	32
西民同志二三事	阚岳南	38
石西民与先父俞颂华	俞湘文	42
难得身后名	谢蔚明	48
深深的怀念	钱辛波	51
寄我哀思	杨永直	55
哀思绵绵忆当年	吴镇 等	59



从报纸到广播	李 扬	65
西民同志的赠言	王淮冰	69
既是领导又是友人的石西民	夏晨中	79
怀念我的启蒙老师石西民	李 廉	83
春风化雨	艾 煊	91
教诲·友情·思念	牛玉华	96
石西民与新华之友会	刘 彦	111
其人虽已歿 千载有余情	左 克	114
一件小事	梅延庆	116
我们的老社长	顾国政 等	118
老社长最后的题辞	邵树文	120
三次见石老	徐中海	124
石西民与《解放日报》	王 维	127
石西民和《新民报》	束纫秋	135
“简易谦和”石西民	蒋文杰	142
他为知识分子尽了心	荆位祐	144
石西民同志在上海	吴云溥	151
一张 40 年前照片引起的思念	丁景唐	155
记石西民一事	曾彦修	160
俯仰之间	柯 灵	163
知音何在	姚北桦	168
石西民与上海剧改工作	李太成	175
精心培育昆曲新秀的石部长	蔡正仁 等	178



石西民与上海青年京昆剧团	汉 文	182
石西民与艺术家的友谊	沈秉坚	188
回忆西民同志在文化部的日子	金冲及	191
晚年余晖	雷仲平	195
您的英名永在	张小曼	203
应是飞鸿踏雪泥	林 放	206
赞《时代鸿爪》	陈虞孙	209
《报人生活杂忆》序	张友渔	211
读石西民书感往	何满子	217
雪泥鸿爪启人思	姚江屏	221
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	刘 峰	224
悠悠故乡情	支德裕	229
石西民倡议为邵飘萍烈士塑像	任贵银	232
石西民对故乡婺剧的一片深情	王志忠	234
“迟暮犹燃赤子心”	沙恩存	237
苦乐共度 50 年	吴 伟	240
友情·亲情·乡情	石士助	250
父亲留给我们的无价宝	吴 捷	257
编后记		262



怀石西民同志

唐 弢

抗战前夕，我在上海出版的《新东方》、《现世界》、《自修大学》等刊物上，读过不少石西民同志的文章，当时我也应约为《自修大学》每期包写杂文一栏，但因西民同志写的财政经济方面的专文，正如另一位以“贝叶”笔名写哲学和青年修养文章的冯定同志一样，虽然都在同一个刊物上写稿，但我们之间没有私人往来，并不相识。全国解放以后，他们两位都在华东或者上海负责宣传工作，直接领导了我，开始相识了。记得冯定同志见面便提及这一点。

我见到西民同志稍为晚一点。那是1952年，前华东文化部已经成立，我协助徐森玉（鸿宝）老先生筹组文物处。那时华东最大的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在南京（上海直属中央），南京博物院院长徐平羽、副院长曾昭燏，南京图书馆则由贺昌群主持，说起来都是有过几面之缘的熟人。大概是为扩展的经费问题吧，我特地前往南京，住在南京博物院。那时西民同志是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由曾昭燏副院长为我联系，他正在开会，约定第二天上午晤面。不料当天晚上，西民同志就赶到博物院来看我了，我本来是讷于言辞的，这个举动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初次见面，简直什么话也说不出，有很长一段时间相对无言。



我不知道西民同志对我的印象如何,至于他,说实在话,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便非常好:朴厚、忠实、平易近人。我们大概先说了一点图书和博物馆的事情。我提出图书馆除供群众阅览外,还应当为专家服务。过去龙蟠里国学图书馆(当时已作为南京图书馆的一部分)附有单人寝室、膳堂,三个月一期,可以租住在里面做学问:翻检资料,写出论文。这个办法很值得发扬。反之,我觉得博物院里的有些文物倒该复制,送往县文化馆陈列,普及文化和历史的知识。这些都不过是书生之见,在经济比较困难的建国初期,我自己也知道姑妄言之而已。可是西民同志却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并且以为只要经费许可,以后应当向这个方向努力。其他还说了些什么,现在却什么也记不得了。

我记得的西民同志调到上海以后的事情,他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开会时经常见面,但由于我的不善交际,私人往来仍然不多。那时我和靳以、罗荪住在一个公寓里。西民同志和罗荪曾在重庆和南京共事,偶尔到他家来玩,见面招呼一下,没有作过长谈。看来他很了解我的相讷拙直、落落寡合的性格,始终予以谅解。人苦不自知耳。我这个人缺点很多,但在大节上,有所不为,看来这个西民同志知道,我也多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

使我怀着感激和佩服之情的是:西民同志和我接触不多,到了关键时刻,却显出一个人的品质——他的作为共产党员的知人论世的党性原则来了。我将永远永远地记住这一点。当有人莫名其妙地说我是一块大石头,终于被搬进党内的时候;当有人说全国解放前避居我家,一遇风声紧急,便将他的铺盖扔到街心的时候;当有人以整风补课领导人身份,拍着台子指



说我是党内右派的时候，黑云压城，谣诼纷纷。西民同志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经过详细的调查和冷静的分析，力排众议，独抒己见，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当然，西民同志不是为我个人，而是要卫护党的公正的立场，不过对我个人来说，却已经受惠多多，感戴不尽了。

西民同志提的意见，有些我也在场，有些则是事后听人转述的，他用这个办法保护了不少人。我觉得至少还应当提及两件事。一、巴金同志出版文集，印行早期作品，上海的党领导认为应当有一篇自我批评的序文，检查他早期思想的错误，与小说同时刊行，而竟阙如，因此姚文元已经写好一万余字的长文，准备“迎头痛击”。西民同志说，共产党既出版人家文集，又存心批判人家，这有点不讲道理，而且怎么知道人家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呢？就在这时，巴金同志谈自己创作的文章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原来他不写序文，另有计划。姚文元只得悻悻地把文章收回。二、傅雷同志准备把儿子傅聪送到国外深造，组织上原来的意思去苏联，傅雷认为苏联虽然出过几位大音乐家，但论社会基础不如波兰，他希望把傅聪送往波兰去，要我将这个建议向夏衍同志转达。组织上同意了。傅聪从波兰出走后，傅雷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那时夏衍同志已经调往北京。西民同志把我找了去，三五个人，七嘴八舌。西民同志说，出走当然是不好的，但研究了傅聪到英国后的言行，一没有具体背叛祖国的行为，二不曾说共产党和毛主席坏话，仍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因此他主张把事情暂时搁下，再看一看。如果单是为了巴金、傅雷乃至傅聪个人，或者仅仅为了石西民个人，我想我早就该把这些事情忘却，不必再提了，无奈事实并不是这样。



10 动乱中,这些都成了石西民同志的罪名。1975 年他重新出来工作,担任出版局局长。我应约于年底之前访问了他。他住在原文化部后面一间破破烂烂的屋子里,我尽可能将自己知道的文艺界情形告诉他。但我实在知道得太少,文艺界以外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我又后悔自己说得不够清楚明白。我只劝他将以下几项出版工作抓起来:鲁迅书简、《鲁迅全集》注释本(包括四卷本选集)、鲁迅传记。三项工作都是为 1976 年鲁迅逝世 40 周年纪念准备的。西民同志决心很大,打算让注释本《鲁迅书信集》于 10 月间问世。我觉得时间过于紧迫,又考虑到书信曾被“四人帮”抢走,许广平先生急得心脏病发作,突然逝世。为防止再有意外。我竭力劝西民同志采纳周海婴的建议,把当时已经搜集的 1280 余封书信(不包括给日本友人的信)不加注释,先作为白本印出,同时组织力量,将书信并入全集,从容加注,更有把握些。西民同志同意这主张。

这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仰思等同志协助下,上下两册《鲁迅书信集》如期出版了。至于注释,1976 年上半年也曾开过会,先在济南,后在北京。济南我没有去,北京的会却参加了,并且发了言。我认为注释应当简明扼要,顺便提及鲁迅早年丧父,他以长子身份辅佐母亲主持家务,深知艰难,很自然地会把家庭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不料这段话传到上海,竟被歪曲成北京有人主张“长子革命论”,完全抹煞了阶级观点,准备组织班子批判。西民同志听了很恼火。不久,唐山地震,北京受影响,我因心脏病不宜露宿,被送到黄山去疗养,以后又转至厦门,和西民同志隔绝了,直到“四人帮”垮台才回北京。

时光飞逝,10 余年过去了。这一段史实却不应忘却。这不



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一个胸怀坦率的共产党员的品质和形象。

1988年1月于北京

(原载上海《文汇报》1988年3月11日)



知己石西民

李纯青

在重庆的嘉陵江畔，在北京公园的菩提树下，在他家或在我家的会客室里，都有石西民和我在一起的足迹和声音。数十年如一贯，都是一见面就喊：

“啊！西民！”“啊！纯青！”

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无憾。我说：在浩瀚人海中，可以直呼其名的朋友并不多，于此也可以无憾。——我们无所不谈，从天文地理，马路新闻，到人生哲学各科各门，谈到大家都充分满足了发表的欲望为止。

我们不必相互吹捧，也不用彼此有任何戒心，一概免俗。

现在我再也找不到石西民了。有时一个人在绿荫道上踟蹰行走，忽然迎面来了一个石西民，“西民！”正想呼唤，睁眼一看，却不是他。

什么时候认识石西民，我记不清了。总之，是在重庆，抗战时期。其实也不必记清，天下历史，大部分都是真真假假，写真实很难很难。不管你怎么写，小人物与时俱亡，大人物总要受时间审判，大人物的身后，总跟着一长队考据学家：

西民和我大部分时间都从事新闻工作。新闻工作是看戏而不是演戏。西谚有记者是无冕帝王之说，我不以为然。帝王全靠那个冕。戴皇冠，坐宝座，有职有权，这才是帝王。我端相



过西民，他并未生得两耳垂肩，双手过膝。

“西民啊，我看你做不了皇帝。”我坦率告诉他，他笑笑。

印度有一家剧院，每逢演出，需要人头做道具时，便拿出一架真人的头骷髅。活着的时候，想当名演员，始终没有当成，因此写下遗嘱，死后贡献他的脑壳作道具。讲完这个故事后，我告诉西民：“我可不写这样的遗嘱，我只想看戏。”他听罢笑笑。

1941年7月30日，敌机130架，编队轮番向重庆投掷炸弹。成千上万的人在城内一条大隧道躲警报。轰炸时间太久了，隧道空气充满了碳酸气，洞内窒息不堪，人要冲出来，国民党守门军队把门锁住，洞内市民全部闷死，尸体运了好几天，究竟死了多少人，当时重庆政府很谦虚，数字未曾发表。

遇到这样苦难的日子，西民总会来看我，互报平安。我在《大公报》工作。馆址在李子坝，《新华日报》馆址在化龙桥，两地皆傍嘉陵江，相去不过一站多途程。西民进城必经李子坝，每周总能见到一两次，不是早晨，就是黄昏。

我们谈论了蒋介石微服上饭馆，侍卫事先对老板交代好，只能收多少钱。这位蒋委员长回府很高兴，逢人便说：“重庆物价很便宜么，这个是，这个是……”

我们谈论了记者彭子冈当面称孔祥熙为“孔胖子”，行政院长只好无可奈何地点头答应。

西民告诉我：有一次，潘梓年同志出席一个会议，要签名，他拿起笔良久不能落笔，回顾左右的人问：“啊！我，我叫什么名字？”

我们谈论了张飞曾经过浮图关，谈论了张献忠的七杀碑，碑在重庆，石刻：天生万物以养民，民无一物以报天，杀！杀！



杀！

重庆是长江三大火炉之一，名不虚传。炎热的白天汗从胸口沛然流下，滴答有声；夜里，躺在床上休息，一动也不动，汗水仍然肆无忌惮地淌出来。在不能睡觉的时候，最讨厌的是那种连猫都怕它的硕鼠，成群结队四出竞走，啃大米，啃衣服，饱餐之余又大磨牙齿，故意使齿声刺耳，目空无人。有一次，我实在忍耐不住了，利用暴雨洪流，将地板统统撬开，让地板与老鼠一齐滚入滔滔的江水中去。

第二天，我向西民报捷：“我杀死了大约 30 只老鼠。”他以唱一支江南小调给我犒赏。

“……孟姜女啊坟上冷清清……”

我们的交往诸如此类不胜条陈。根据长期的交往，我确信石西民是一个绝无固执脾气的老好人。

如果说他的缺点，最大的缺点也许就是身不由己做了官。一个看戏的人要演戏，是不容易的。当了演员，就必须听从“导演”的指挥，而“大导演”也不能每场“戏”都导演得好！



挚友石西民

陆 诒

人到老年 难免怀旧

今年10月17日,是石西民同志逝世一周年纪念日。缅怀往事,我们结交近50年,患难之交与同志之谊,兼而有之。每一念及,总是心潮难平,写作此文,以寄托我的哀思。

西民同志原籍浙江省浦江縣,但他从1928年起,就在上海读书并参加革命活动。1935年由《申报月刊》主编俞颂华先生介绍担任《申报周刊》编辑,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他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我还记得我们相互认识是在1936年。当时他在《申报》,我在《新闻报》,两报是近邻,人员经常来往,而他平素接近的钱俊瑞、徐雪寒、金剛人等同志,也是我所尊敬和熟悉的朋友。抗日战争打响后,我们分别奔赴华北战场。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我们又重新见面,从此我和他共同战斗七年多。解放后,从1955年到1965年,西民同志又回到上海做领导工作10年,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兼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和宣传部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曾为促进上海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社会科学和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的建设,



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功绩卓著。他对上海的感情很深，而上海文教界和新闻界的许多朋友至今还对他深切悼念！

抗日烽火 记者生涯

《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创刊，是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党报。当时报社社址设在汉口府西一路大陆里，租一幢二层楼石库门房子作为编辑部办公的地方。另在弄堂口租两间底层房子作为营业部和传达室。印刷厂设在另一处地方。我在1月15日到报社编辑部时，首先见到的就是西民同志和徐迈进同志，我们不是“一见如故”，而是上海时期的熟朋友，由他们两人为我向编辑部的章汉夫、吴敏、楼适夷、许涤新、何云等同志一一介绍，热情握手，欢叙谈笑。前一天，范长江同志已约我和报社董事秦邦宪（博古）与凯丰同志、社长潘梓年与总编辑华西园（华岗）同志见面，谈妥进报社工作的问题。

我初进报社时的感受，觉得这里是个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又像是个温暖的大家庭，同我过去工作过的《新闻报》和《大公报》大不一样。另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工作紧张，人力不足（当时全报社职工不到60人），通常一个人要顶两个人的工作。共产党员既是大公无私、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又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知心人。西民同志当时就是这样的人，受到同志们的敬爱。

我进报社20几天，因津浦路战局紧张，2月8日报社派我到徐州采访前线战讯。台儿庄血战以后，4月中旬报社曾派戈茅同志来徐州协助我工作，给我带来一封编辑部同志集体



写的慰问信和一小袋慰劳品(其中有香烟、糖果),每个同志都写上几句,签上名,其中也有西民同志的赠言。在战地,读到这样热情洋溢的信件,又收到同志们集体凑钱买来的慰劳品,内心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激动!

5月底,我从徐州突围归来,与报社同志重聚未及一月,武汉外圈战斗又打响了。我先派到长江北岸战区,7月25日又转到长江南岸瑞昌前线采访。8月1日到南昌见到西民同志,真是高兴之至。他说,报社调他当战地记者,如今我们走到一块儿来了!他带我到新四军办事处访黄道同志,还介绍我认识当地文化界好友夏征农、笄移今、吴志元(即后来成为西民终生伴侣的吴伟)等同志。当时,我和《大公报》范长江、孟秋江同志住在四照楼旅馆,西民同志常来同我们纵谈时事,分析战局。不久,我们又分手,我转赴阳新前线,他去赣北德安前线,后来又到新四军地区采访,写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战地通讯,到1939年上半年才回到重庆报社。

云遮雾障 战斗方酣

从1939年6月到1940年上半年,我被派赴华北敌后战场,历时一年。旋赴昆明,采访滇缅路重新开放后的动态。等我于1941年上半年1月回到重庆,就发生皖南事变。1月17日,国民党当局发出了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和下令向新四军部队进攻的反动命令。为了向国民党统治区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这一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周恩来和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同志以及南方局和报社负责同志在当天晚上在红岩咀八路军办事处召开紧急会议,筹商对策。



报社同志也紧急动员起来，警卫着编辑部、印刷房和排字间，严防反动派破坏，大家通宵未睡。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所长那天一反常态，在晚上10时就赶到报社编辑部，坐等审查第二天报纸的内容。章汉夫和于刚同志出面同那位新闻检查老爷在会客室内周旋，西民同志和其他编辑同志即按原定安排，开始紧张的工作，先排好两种不同的版面，一种是准备二三版上刊载周恩来同志抗议题词的，一种是对付审查用的。半夜过后，派人到八路军办事处取回周恩来同志的亲笔题词，立即刻成木版，拼好版面，加紧付印。同时又把没有题词的也印刷了几份，交给这位新闻检查老爷，让他“胜利”完成任务而去。黎明之前，把印好的报纸由报童翻山越岭走小路，送进城内，一早就到广大读者的手中。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周恩来同志的这些亲笔题词，简短有力，只有25个字，但它突破了重庆的重重浓雾，揭露了“皖南事变”的实质，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控诉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第二天新闻界纷纷谈论一则笑话：18日早晨，新闻检查所所长曾到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公馆，汇报他17日晚上到《新华日报》编辑部检查经过，并面呈几份没有题词的报纸，得意洋洋。潘公展看了，也颇为高兴。这时，有人送来街上叫卖的一份《新华日报》，上面就有周恩来同志的题词，潘看后脸色由青变白，顿足痛骂新闻检查所长是个饭桶。

皖南事变之后，为了继续和国民党顽固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报社精简机构，缩减报纸篇幅，并疏散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我去了南洋。西民同志当时是中共南方局决定留下坚持到底的报社负责同志之一，他和潘梓年、熊瑾玎、章汉夫等同



志在国民党顽固派严密控制的重庆，坚持战斗，冲破重重迷雾，阐明真理，传播真实的新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我撤离新加坡，取道印度、缅甸回国，5月份仍回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当时西民同志一家，和我的一家同住在化龙桥报馆编辑部门外一座小楼中，朝夕相处，经常亲密交谈，从工作谈到学习，谈到重庆新闻界情况，几乎无所不谈。西民同志待人诚恳、坦率，很重感情，他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但在同志之间相处，又平易近人，善于团结他人。当时周恩来同志提倡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西民同志可以说是报社中“三勤”的标兵。他在办报业务方面是多面手，既能写社论、短评和专论，精心编辑报纸，又能做采访工作，写出文情并茂的通讯。在学习上，他不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而且专心研究日本问题，对敌情有较深的了解。在勤于交友方面，因为我们都在国民党新闻封锁和压迫下做过采访工作，更有共同的切身体会。他谦虚、热情，和蔼可亲，善于结交各方朋友，并把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采访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回忆在报社工作期间，我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工作上得到西民同志的教导和帮助极多，毕生感铭难忘！

劫后余生 聚首京华

解放初期，西民同志在南京办《新华日报》，而我在上海《新闻日报》工作，见面机会不多。1955年他调来上海做领导工作，有时我们还相约在朱济忍同志家中叙旧长谈。但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斗争，我和老朱同志都在“扩大化”之列，从



此西民同志就不便同我们多接触。这点，我们都充分理解。“文化大革命”中，西民同志遭到残酷迫害，被非法关押长达九年，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即使身陷囹圄，处于逆境，他仍然坚持正义，拒绝诬陷其他同志，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

粉碎“四人帮”以后，1980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在一次聚餐会上，又与西民同志握手重逢，谈到范长江、孟秋江、潘梓年、章汉夫同志等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我们都为此悲愤交集！1983年3月6日，我们在北京举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成立大会并纪念《新华日报》创刊45周年，同志们欢聚一堂，兴高采烈。西民同志是我们史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当他与乔冠华、胡绳同志（化龙桥时代号称报社的三位酒仙）举杯向全体同志敬酒时，豪兴不减当年。

1985年5月和10月，西民同志出席《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分会成立大会和重庆举行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时，我都和他见面长谈。重庆集会后，我们还一起到大足去参观石刻，当时西民同志尚能攀登北山，健康情况还好。但以后两年我到北京去访问他时，身体每况愈下，衰老、瘦弱，他总是扶病同我深谈，勉励我振奋精神，力争晚年继续为党工作，发挥余热！

一年之前，西民同志不幸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这是党的事业和我国文化、新闻事业的一大损失。他的一生光辉的业绩和崇高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

西民同志，安息吧！我一定遵照您的勉励，努力去实践！

（原载《上海滩》1988年第10期）



为马克思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者

——悼念石西民同志

杨西光

我同西民相识已经近半个世纪。那还是1939年的年底，我受党组织的派遣，转移到重庆青年记者学会工作。西民比我大两岁，已是《新华日报》的编辑部主任。在重庆新闻界，他是个十分活跃的人。尽管周围环境那样险恶，他的工作却总是充满活力，待人又总是谦和诚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全国解放后，我在福建，他在江苏，恰好都担任省委宣传部长，见面的机会又多起来了。1955年，我们先后调到上海，直到“文革”前一年，连续10年在一起工作。去年8月，我生病不能走动，西民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坏了，还抱病来探望我。没想到这竟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他的逝世，使我不尽思念，无比悲痛。

西民同志的革命历史，他忠诚于党的事业，为党的宣传、文教工作奋斗毕生，这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具有令人钦佩的才能，而又总是坚持做实事，讲求收实效，对工作有高度责任感，并且始终保持先进思想和进取精神。

作为党在宣传战线的活动家和杰出的组织者，西民同志在这条战线的很多方面担任过领导工作。他在新闻、出版、宣



传、文化、社会科学等许多领域内都做过工作，施展了他多方面的才能。他是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我在重庆最初见到他的时候，西民才 27 岁，已和范长江、孟秋江、陆诒一起被大后方读者誉为四大名记者。他所写的《一年来的新四军》、《江南游击区横断面》、《陈毅将军访问记》等作品在社会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不仅参与《新华日报》的筹建和创刊，还在报社工作了九年之久，并且一直是《新华日报》领导成员之一。全面内战爆发后，他撤回延安，又担任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的副总编辑。党中央在西柏坡时，经常用新华社社论、评论和报道作为教育全国人民和指导各地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西民那时是新华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直接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建国后，他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副书记，是全国文化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两度主管全国的出版事业，做过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粉碎“四人帮”后，他还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负责社会科学的研究规划和组织工作。他在解放后的主要岗位是在党的宣传战线上，先后担任过南京市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宣传部长。在党的宣传文化工作者中间，像西民那样担任如此众多工作，在多方面有过贡献的并不多见。他的逝世，确实是党的一个很大损失。

西民同志的为人和作风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实实在在。他虽然多年身居领导岗位，从来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十分注意做实事，讲求工作成效。我同他在上海共事 10 年，很少听到他讲大话和空话，总在切实地研究上海文艺界、理论界、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的种种实际问题，商议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具



体措施。上海舞蹈学校成立时,他自己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跑,去挑选学员。排练芭蕾舞剧《白毛女》时,他从讨论剧本到看演出,每个环节都抓得很细,提出许多具体意见,有时也拉着我一起去。育才中学总结教学改革的经验时,他也参加讨论。1957年,毛泽东同志接受舒新城先生的意见,把重新修订《辞海》的工作交给上海市委。这件事在西民的主持下进行。为了出好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书,动员参加的专家学者近5000人。西民和一些同志对这部辞书先后提出了“六性”(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正面性、知识性、稳定性)的要求。这些要求,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60年代初,曾两次在浦江饭店集中上海和各地专家会稿。会稿时,“百家争鸣”的气氛十分浓厚,不同学派都可以无所顾虑地展开争论,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的。公平地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做到这样,确实同西民同志的民主作风是分不开的。对上海的知识分子,他是关心和爱护的。他倡议创办上海文艺会堂,作为上海文艺界学术交流和增进友谊的活动场所。在他坚持下,发展了好几位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入党。他还设法保护过一批身处逆境的知识分子。我曾看到过被错划成右派的傅雷先生写给他的一封信,感谢他的关心和帮助。回想起来,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上海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社会科学和教育卫生事业曾出现过一个比较繁荣的局面,这其中自然包括西民同志付出的巨大心血。

西民同志是一个思想先进的人,是一个具有进取精神的人。他从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无论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里,还是在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的大后方,都曾出生入死,顽强地为传播真理而斗争。1959年7月在上海中医经络



针灸学术座谈会上，他曾说：“我们要正确解决古今中外的问題，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得快而且高。一只手伸向文化遗产，一只手伸向外国，吸收好的营养，才能发展快，发展高。”并且尖锐地提出：“科学真理有时可能在少数人手里，不能用行政办法统一。历史上的教训太多了。封建时代，状元写的钦定的文章到底留下几篇？！凡严肃认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要鼓励。新的成功是在过去失败的基础上得出来的。不要随便戴帽子，不要随便定框框，不要轻易下结论，不要以为这个方法对，别无其他方法了，那样就会限制与妨碍研究工作的发展。”西民同志这些话是在反右派斗争后两年说的，并且是以市委领导身份说的，这需要多么大的理论勇气啊！

西同同志在上海还多次抵制过江青抓“样板戏”的那一套。他曾私下对我说：“江青这个人不懂京戏。”“她把京戏都改得不像京戏了。”他的抵制引起江青很大的不满，后来就不让他参与“样板戏”的事，而让张春桥来管了。“文化大革命”中，听说江青曾两次讲过：“石西民是一个坏人”。因此，他在10年浩劫中遭受迫害十分残酷，被非法关押达九年之久，而且绝大部分时间是单身监禁。当他被“造反派”揪回上海时，我同他一起经受过多次批斗。他受到的不仅是毒打，“坐喷气机”，还被打倒在地，踏上许多只脚，受尽人格上的侮辱。然而，当“造反派”要他“交代”问题时，他总是光明磊落地把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不往别人那里推，拒绝诬陷其他同志。在周围没有人的时候，他就悄悄地对我说：“反正他们一定要搞倒我们的，随便他们怎么搞好了！”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凛然正气。

粉碎“四人帮”后，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彼此又常有见



面的机会了。在平常的言谈中，我时时感觉到他的身上依然具有青年时代的那种火一样的热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开展时，因为他一直反对“两个凡是”和种种“左”的思想，非常兴奋。他常来看我，支持这个讨论，我们还一起分析情况。他提出许多好的建议。西民和我一起，应邀参加过1986年5月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在这次会上，他竭力主张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摒弃保守、僵化思想，建立新思想、新观念。这些年，他不顾病痛，写了不少文章。读到那些倾泻自肺腑的经验教训、针砭时弊的议论时，我总有一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在我眼前的西民，依然不脱他当年那种书生本色，依然不减一个老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顽强进取的锐气。他不愧是一个为马克思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者。

（原载上海《文汇报》1988年5月4日）



西民同志周年祭

袁 啸

大文学家韩愈说过：“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我和西民大哥近 50 年的友谊，用韩愈的这两句话来概括他待人处世的一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石西民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从 1939 年认识起，在重庆相处七年。日本投降后，天各一方；建国以来，又在两地工作。待到他调入文化部工作，我也仅仅去看过他一次。只在 10 年浩劫的丧钟停歇，忧患元元们从恶梦中苏醒，我在干校被恩准“解放”，过了两年，西民也从监狱中释放时，彼此互庆余生，这才往来频繁。尤其当他体质日衰之际，我也经常犯心脏病，我们更以惜别的心情，争取更多的良晤。哪怕是默然相对片刻，也觉得濡沫的友情，使一室生春。

石大哥！你只不过大我一岁，为什么就这样匆忙地撒手西去了呢？我看你身体日趋衰弱，劝你锻炼，你笑笑；劝你进药，你仍然笑笑；终日只是埋头于几案之间。我记得，当你受命于危难之际，你一再邀我同去分担劳务。我婉言辞谢了，并进而劝你珍惜余力，等待雾散云开，再踏征途。而你沉思了一会：“党要我去工作，我能不去吗？我的余力也有限了……”。面对你的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我是惭愧的。

这使我想起了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和你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你拿着邵荃麟同志写的介绍我的信，极其仔细地问我从上海到重庆一路上抗日救亡的情况。你眉宇间时喜时忧，特别关于老家浙江，你更是殷殷询问。谈话间歇，我猛抬头看见邹韬奋同志的遗像，默读着韬奋同志要求入党的遗言，我被激动得眼眶湿润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这时，只见你站起身来紧握着我的手说：“这是每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所必走的道路。”多么语重心长啊！我点点头说：“我愿步韬奋同志的后尘，为党献身！”

自此以后，我就在石西民和章汉夫同志指导之下，在重庆展开了团结知识分子的活动，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和自然科学座谈会（前者以郭沫若同志为首，后者以梁希先生为首），广泛吸收社会名流和大学教授，不定期地举行学术活动和时事座谈。皖南事变前后，我因多次采访马寅初先生被软禁的消息，为鹰犬跟踪，其势不得不离开重庆，我找西民同志诉说我去延安的决心。西民约了汉夫同志共同传达我党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剖析时事，说服我一定要留在四川，一旦时局恶化，准备转入地下继续办报。他们对我反复开导，情深谊切。两个多小时的谈话，终于使我心悦诚服地留了下来。尤其是长者风度的西民，言词之诚恳，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日本投降后，我调职到湖北宜昌。我赶赴重庆，匆匆见到了西民。他高兴我的调动，说：“宜昌是水陆重镇，你到那里，希尽可能协助做好报馆职工及家属们的疏散工作。”又说：“后有期，要善于独立作战，到处撒点革命种子。”直到1950年，他来北京参加新华社的全国会议，我们又见了面，他还是老样子，不修边幅，和善可亲，仍然是一个长者。

西民的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不倜过，不矫饰，不矜持等优秀品质，正是我钦佩他、喜欢他，由此而建立起深厚友谊



的基础。所有和他共过事的人也大都有此同感。我平生最厌恶伪君子 and “教师爷”们道貌岸然、一副训导的面孔，动辄原则，张嘴主义的样子。我欣赏戏剧大师汤显祖的名言：“一生爱好是天然”。西民正是这种性格。

但使我惊奇的是，他调到文化部以后，我拜访他，多年未见，见他跟从前有些不同，便直言奉告：“西民，怎么你身上也染上了官气？还能接近群众吗？”他听了也觉吃惊，说：“是吗？我不觉得啊，你提得好，我一定改！”语气坚定又诚恳。我笑着说：“你这样从谏如流，你还是我的大哥！”

我们在晚年相聚的日子里，大概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了吧，话题之多，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然而话题转来转去，总是落到党风问题上。我们曾谈到一位老同志，他突然问我：“你看他有没有‘党’气和‘官’气？”我说：“此人一点也没有。”他大笑起来，说：“这位同志老是自卑，总觉得没有去过延安，气味不够正统。你过去不是批评我有‘官’气嘛？其实我是去过延安的。”我说：“延安作风也要作具体分析，落到每一个人身上，更要具体分析。”他说：“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批评、团结，这些都是好作风；搞个人崇拜，却是亡党亡国的邪风。”

西民为党工作了 50 余年，一贯勤勤恳恳，人皆见之。他从不表功，也从不在背后说人坏话。10 年动乱中，即使在威逼利诱下给人写证言，也从无一句不实之词。这样一位志行高尚的至诚君子，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于愧于同志！石大哥，你完全可以安息了！



“不为物喜，不为己忧”

——记石西民同志二三事

尚 丁

石西民同志去世了。他的音容笑貌，他对我的教育帮助，他的高尚情操，时时浮上我的心头。每当我思念他的时候，他在一封信中说过的两句话——“不为物喜，不为己忧”，便会更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1979年春，我被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后，即赶忙写信告诉了他这个“喜讯”。接到他5月12日的回信，信是这样写的：

尚丁同志：

在上海同台挨斗，一别转眼已经十载。回忆抗日战争年代在重庆聚首，种种往事，一一浮上脑际，而我们都在光阴的流逝中，老了。

接读来信，喜甚。若身体可以支持，希望你尽可能为人民多做一点事，如能为后代留下点什么，那就更好了。

我患的是心脏病，自从去年4月底突然患心肌梗塞以来，已有一年多了，经过抢救，总算过了一关。但一直不能控制，一不小心，心绞痛常犯，也很难掌握规律，所以至今仍不能离开医院。虽然朋友们也希望我早点恢复健康，



出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但疾病缠身，有心无力，殊为怅怅！而患心脏病需要心境安静，不为物喜，不为己忧，是延年益寿之宝。我除吃药外，努力实行这一精神疗法，或许对病有些帮助。

专此

敬礼

石西民

五、十二

我和石西民同志相识，是在抗日战争年代的重庆。他当时担任重庆《新华日报》的编辑部主任和采访部主任，我在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先生主办的《国讯》杂志作编辑。我们的关系还远不只是同行。当时《国讯》的主编俞颂华先生，抗战前曾是上海《申报》和《申报月刊》《申报周刊》的总编辑、主编，而石西民同志是《申报周刊》的编辑。俞先生器重石西民的才华、人品，石西民很尊敬俞先生，视之为师。他俩十分亲密，无话不谈。

当时的重庆，隔不久就来一次反共高潮，白色恐怖严重，政治空气非常沉闷。《新华日报》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成为人们心目中追求光明的明灯。记得1943年3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重庆出版，为其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恰在是年5月，共产国际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于是，国民党顽固派大肆叫嚷“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等等。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竟发出一片“打下延安”的叫嚣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些幼稚的青年



人，不免感到有些迷惘。当时，石西民同志就常到张家花园来和俞颂华先生长谈，蒙俞先生厚爱，总是叫了我陪坐。听了石西民同志的分析，对照《新华日报》上一系列的反法西斯文章，如《法西斯丧钟响了》、《彻底消灭法西斯》等，我心里顿感亮堂多了，信心和勇气倍增。为此，石西民虽只长我九岁，我却一直把他当老师看待，称他为“西民师”。

当时，我们每个月举行一次“宪政座谈会”，这是重庆的一个重要的民主讲坛。我是这个座谈会的具体组织者，每次总是提前几天告诉他，他则每次都带两位记者来参加，第二天《新华日报》就以整版篇幅发表座谈会的发言记录。他还介绍了两位记者同我保持经常联系，便于随时通报民盟、职教社、文化出版界和青年们的情况。

那时，我在黄任老身边工作，所以常能见到中共领导人，而我个人则与南方局的青委书记刘光接触较多。一天，刘光同志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和石西民、黄洛峰同志商量，可以不被人注意。”黄洛峰当时是读书出版社经理，也是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的董事长，我代表国讯书店担任董事。从此，石西民、黄洛峰就是我的正式领导人了。

这期间有一件鲜为人知的大事，石西民同志可说是始发者和组织者。

那是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回到重庆，写了《延安归来》书稿，交我出版。我当时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出版部主任、国讯书店经理。我很快读了书稿。书稿以日记体裁翔实记录了作者亲眼目睹到的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实施，和解放区军政、经济等多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毫无疑问，这本书对于国民党多年来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种种造谣诬蔑，是个雄辩而有力



的揭露。当时，按照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必须把原稿送交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核准后才能发排付印。这本书稿送审是肯定不会被通过的，即使碍于黄炎培的地位声望，客气一点，也会被拖上一年半载，仍免不了被删得“体无完肤”。我一时想不出对策，就拿了书稿去找石西民、黄洛峰同志商量。石西民给我出了一个很大胆的主意，他说：如果黄任老同意，这书稿索性不送审就自行出版发行，并用这本书打头阵，发动一场“拒检运动”。当时还商定，这个“拒检运动”以重庆杂志界为主力，打响以后，新出版业和《新华日报》立刻给予全力支持，发动各界起而响应。我把这些设想告诉黄任老后，他沉吟良久，决然同意了。于是我立刻抓紧时机，只用8天时间，第一本不送检的书——《延安归来》就大量出版发行了。当时我是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唯一的一名干事，经过多方奔走，重庆16家主要杂志发表联合宣言，宣布拒绝送检。新出版业立刻起而响应，《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也一连发表几篇社论，给予热情支持。重庆杂志界登高一呼，立刻得到重庆各界进步人士和全国各地文化、新闻、出版界的坚决支持和热烈响应，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蓬勃兴起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国民党中央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布撤销战时新闻和图书杂志审查制度。至此，我们的“拒检运动”获得了全胜。

我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具体工作者。在那惊涛骇浪的搏斗中，我时刻紧紧依靠党，依靠石西民和黄洛峰同志的领导去做工作。我在重庆时期参加的许多政治活动，也都是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对我是极好的教育和锻炼。

西民同志在前述信中说：“在上海同台挨斗，一别转眼已经十载。”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石西民同志被“揪”到上海



来批斗，我是陪斗。“造反派”说石西民包庇了我这个大坏人，说我受到“包庇”的有以下几件事。

一是石西民同志 1955 年调来上海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他刚来，我就受到一个“集团”的株连。石西民同志在我的问题上一直不避嫌疑地说：“我是了解尚丁的，他不会反革命！”我被关押了一年多，终于弄清了事实，得到彻底平反。石西民同志亲自为我恢复名誉，安排我工作。

二是在 1957 年，我被错划为右派，有人说我负责的《展望》周刊“一贯进行反革命宣传”，并正式向中共上海市委请示，要把《展望》定为“反革命宣传的黑窝”。石西民同志不同意，他明确宣布：“《展望》是党领导的刊物，解放前有重大贡献，被国民党封闭；解放后也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即便尚丁犯了错误，《展望》并没有什么错误。”

三是我戴了右派帽子后，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进行改造。市委批准我去青海。行前石西民约我谈话。据“揭发”说，几个出版社的负责人在外面等了几个钟头，石西民都不接见，竟和一个大右派分子关着门谈了一个下午。谈一个下午是事实，但完全是他耐心细致地帮助教育我，根本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私房话”。

四是 1962 年我摘了右派帽子，因在牧区的四年正是自然灾害时期，我的身体垮了，浮肿到了肚脐。我写信给石西民同志，请他考虑把我调回上海。他把我调回了上海。据说我是当时唯一调回上海的人，这证明石西民特别“厚爱尚丁这个大右派”。

五是我调回上海后，石西民向当时出版局局长提出任命我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审。出版局局长说：“尚丁不是搞文



艺的，安排为文艺出版社编审似不适当。”据他说，石西民当时随手把我在青海写的诗剧《名央嘉错》书稿丢给他说：“你可以看看，这是尚丁在青海写的。这样一部诗剧，你写不出，我也写不出，为什么不能当文艺出版社的编审？而且，他原来就是古典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嘛！”

以上这五大“罪状”，当然都是实有其事。但是，这只能证明在“左”的思潮泛滥时，石西民同志虽然在那位有名的“好学生”手下工作，他还是敢于站出来说话，说真话，并想方设法保护了一大批身处逆境的知识分子。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呀！

“不为物喜，不为己忧”，是从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转化来的。相传岳阳楼为唐时所建。宋庆历四年（1044），滕子京因被诬告，贬为岳州知州。五年，他修了此楼，请范仲淹作记。范仲淹当时正因改革受阻，被贬为邓州知州，与滕子京的遭遇有相似之处。于是，他应约写了这篇《岳阳楼记》，以激励自己和朋友。文章抒发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坚强意志和博大胸襟，成为千古绝唱。

石西民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被非法关押达九年之久，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但是，在他身患重病之时，还以范仲淹的名句激励自己和朋友，体现了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的坚强意志和博大胸怀，这正是石西民同志的高风亮节。

（原载《新闻研究资料》，1988年6月出版）



哭西民同志

左明德

西民同志离开我们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我含着泪捧读着石西民同志治丧办公室发来的讣告，心中万分悲痛。从此，党失去了一个优秀的、才华横溢的好儿女，我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师长、好同志……近50年的革命情谊使我禁不住涕泪涟涟。我不相信西民同志已经离我而去，他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如在眼前：他的确已经走了，我手中印在白纸上的黑字宣告了他的逝世……

记得1987年6月，为了筹备组织出版“抗日战争大后方文学书系”，我和沈世鸣同志曾去北京拜访过他。那时他已重病在身，医生嘱咐他谢绝会客，闭门疗养。而他说：“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生活、工作、斗争了八年，不能不管呵！”他对这套书所指的时间极限、地域概念、选稿范围等等提出了中肯而详尽的意见。因为抗战时期他是重庆《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遵照党的指示，积极在新闻出版界和其他爱国人士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对当时在重庆、昆明、桂林等地活动的文学艺术界的同志、朋友和他们的著作都比较了解。他不顾身体健康，反复给我们讲解如何广泛选稿，如何反映那个时期的时代风貌，如何反映两种思想体系的斗争……他吃力的、亲切的谆谆之言至今还在耳边缭绕。



记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两次来重庆，都把《新华日报》的老同志——大部分是当年的报丁、报童——邀去谈心叙旧，十分关怀询问每一个同志的工作、生活情况。特别是有些受到委屈的同志，他关心地了解政策落实情况，并表示在政策范围内将尽力协助早日解决。当年《新华日报》领导者之一，现在是中央部长级的西民同志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同志们感动不已。

还记得1943年我和爱人冲破封建家庭包办婚姻，自由恋爱在报社结婚的情景：熊老板为我们主婚，工会为我们举行一次联欢晚会。我们不请婚假，不办酒席，不借钱，不收礼。这简单而隆重的婚礼，是在西民同志和其他领导的支持帮助下举办的。至今，我常常以此教育我的子姪辈要艰苦朴素，不要铺张浪费。

还记得1939年初到《新华日报》工作时，我是一个文化不高、政治上幼稚的少年。西民同志比我长10岁，已是采访部主任、编辑部主任，写了不少新闻、通讯、专论、评论、社论等。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同志们赞誉他是“江南才子”。他常常给我们上政治课。有一次，他给我们作时事报告，其中有些地方我弄不清楚，他不厌其烦地给我举例、分析，直到我理解为止。西民的民主作岗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使我终生难忘。

50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数不清，理还乱。

西民同志16岁参加革命，半个多世纪为党、为人民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为传播马列主义真理，为创建和繁荣党的新闻事业、文化事业竭尽全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可是，万恶的“四人帮”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监禁九年（因为他在上海工作时间长，了解他们的底细多），身心受到严重摧



残。如果不是“四人帮”的迫害，他肯定会活得更长久一些，起码那10年不会白白过去！那他将为党为国作出多大的贡献呵！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90诞辰纪念，也是《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创刊50周年纪念。还在西民病重的时候，作为《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的副会长，他始终关心着这件大事。同志们到他的病榻前，和他商议决定回重庆去参加纪念会，去召开扩大理事会，让久别的老战友在他们当年生活过、斗争过的、而现在又魂牵梦萦的“故乡”团聚。3月初，山城已开始回春，树木已发出嫩芽，同志们从北京来了，从陕西来了，从广东、湖北来了……张友渔老人来了，“老板娘”也来了，还有熊复、曾德林、周而复、罗戈东、郑新如……好多好多老领导、老战友都来了。一见面，大家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虽都已鬓发斑白，却像年轻人一样激动、欢快。而西民同志却没有在他们之中。

理事会如期召开了，大家在欢乐中怀念起那些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积劳去世的《新华日报》的老战友们，我们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们的副会长西民同志。而他，再也不能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了。不过，可以告慰西民同志在天之灵的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在老朋友们积极关心支持下，已陆续完稿；我们史学会通过这次理事会增强了领导，明确了今后工作方向，相信两史将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

安息吧，西民同志，我的好领导、好师长、好同志！

（原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重庆
分会会刊第9期）



50年前认识石西民

张林岚

石西民同志周年祭的日子，我曾想写篇短文，纪念他的遗爱，后来看见这类文章发表于报刊的多了，也就不大想凑这个热闹。但心里还是放不下，看到北京、上海、南京和重庆等地不少人怀旧，记着他的好处，不禁又提起笔来。

我与西民同志有点乡谊。虽说40年代都在重庆从事新闻工作，算是同行，但认识他，却比这更早，抗战初期就已在我的家乡见过。至于他的大名——他在家乡的名字是石士耕，出了名的“赤色分子”，我略知世事的少年时期就已听说。

我的家乡浦江县在浙东山区，地瘠民贫，西民文集《时代鸿爪》一书中头一篇《亢旱后的浦江农民生活》写的就是30年代家乡的景况。——当时，他与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在上海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工作。因为是小地方，名人也不多，石士耕这样的共产党倒是妇孺皆知的。他家在北乡的廿四都石宅，离我家所在的县城10公里，他青少年时的好友楼思静、号静玄的，与我是世交，后来又多次为我补习功课，又是我的老师，但平日仍以兄弟相称。30年代初期他在上海中华艺大读书时加入过共青团，与西民是常在一起的。不知什么缘故静玄后来转向消沉，长期家居，读书而已。不过他一面教我读桐城派古文；一面又教我唱旧俄革命歌曲《光明赞》。到了



1937年夏天国共二度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他静极思动，也参加我们一些小青年的救亡宣传活动，给我们民先队队刊《吼声周刊》题写了刊名。同时，还给一群因战争而失学的“回乡知青”补习功课。

大约是1938年初秋的一天，一个精神抖擞、身着旧西装、年纪约二十六七岁的人来找静玄。静玄一见，大喜过望，随即拉他在我对面的座位坐下，回头对我说：“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士耕。”他俩在促膝谈心，我只听见西民说：“我只停留一天。不过我还是到国民党县党部去打了招呼，算是挂个号。”

后来我听静玄说起：西民本来在上海工作，1931年曾到浦江、诸暨一带策动农民武装起义，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第二年到了北方，多年没有消息，最近才知道他已南来。不久前作为战地记者到华北前线去采访过，随后又要西行，经江西去武汉，参加《新华日报》工作。

西民曾劝静玄到延安去，那里有一个叫什么“陕公”的学校，希望他去当教员。静玄出身书香门第，又有家累，踌躇了半年以上，终于没有走成。而西民同志行色匆匆，给我的也只是零零碎碎的几个印象：穿破西装的共产党，跑来跑去的新闻记者，炮火连天的前线，神秘的“异域”延安……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七八年之后，我又在重庆见到了他：那已是第二次见面。

当时已是抗战末期，胜利前夕。我进《新民报》不久，编本市新闻版。西民在《新华日报》任采访主任。我以同乡兼同行的身份，常到他们报社去找他。谈的尽是对阔别多年的家乡的怀念——他比我离家还早，与乡人似乎接触不多，浦江对他来说，是很渺茫了。不过一谈起来就没有个完，谈的虽是琐事，倒



是兴致不浅的。分手的时候，我忽发奇想，悄悄问他：“我能到你们这儿来工作吗？”我的思想认识是幼稚可笑的。我觉得我们自己的报纸虽好，志趣相同的朋友也多，但是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即所谓民间报，终不及干新华日报有劲儿。

他笑了一笑，劝我安心在新民报工作：“新华日报应该有许多朋友，配合我们工作，新民报就是这样的报纸。我看你在那里也许更合适，更能发挥作用。”

我自然有些懊丧，但还是找他。他知道我爱好文学，有一次还带我到枣子岚垭的文协去，介绍邵荃麟、葛琴、叶以群等几位作家朋友给我，对他们说：“这是我的小朋友、小老乡。”人是见了不少，但我现在还记得清楚的只有邵荃麟、葛琴夫妇，他们正在文协门前路边摆地摊，出卖一堆旧衣物，准备筹措盘缠，买舟东下。那个时候等“复员”回家的人很多，长江航运的船只被国民党政府拉去输送军火、部队，有的人等了半年、一年，才出大价钱弄到一张船票。

重庆谈判时期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就被蒋介石撕毁，内战阴霾四合。有一天，我在七星岗附近的马路上走，与西民同志邂逅。大约是形势恶化，工作紧张，他的脸上有一丝憔悴。我问他：“形势如此，你今后怎么办？得离开重庆了吧？”他平静地说：“我们是没有个人自由的，只要工作需要，就得留在这里，直到最后。”我又问：“最后”是什么意思？我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处境太危险了。他笑了一下，还是很平静地说：“我们心里都是有准备的，随时都可能吃官司，坐牢，以至牺牲。”

我为之黯然，也为之感动。心里说：“到底是共产党！”

第二年的秋天，我也离开重庆“复员”东下。经过南京的时



候,去看了浦熙修,恰巧西民同志也在座。谈到近午,他站起来说:“我请你吃个小馆子去,熙修作陪。”我已记不起那是个什么小饭馆,看得出来他是常客。带着酒酣的豪情,他与浦二姐议论时事,议论重庆、南京、上海各报的政治态度,还评鹭报界人物,包括我们报社的赵超构、张恨水、张慧剑、程大千和曹仲英等等,使我大长见识。

第三次与西民同志相见已是1955年,离前一次又有八九年了。听到他调上海工作的消息,自然是高兴的。但他已做了官,而且成了我们的“顶头上司”。可能是出于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某些莫名其妙的洁癖,爱跟自己闹别扭的心态,我一直没有登门拜谒,只在剧场偶然与他相值时寒暄数语而已。以后几年中也是只在各种集会上见到他,单独叙叙私谊的机会没有了。1964年他调任中央文化部后更少见面,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才发现他已被造反派揪回上海,有一次甚至被揪到我们报社来批斗。这次相见,我自己也忝列“牛鬼蛇神”队伍,不能“乱说乱动”,所以连“牛衣对泣”的自由都没有。

“文革”中作为西民同志“罪行”之一的事是说他“鼓吹封资修文化”,也说到抢救垂死的昆曲,还支持了家乡戏婺剧。这倒是事实。我也爱好戏剧,对昆婺二剧更有好感。因之,在剧场与他见面的次数比别的场合多些。他见我在座,总要叮嘱我在报纸上“吹嘘吹嘘”。浙江几个婺剧团的多次来沪演出,确实得到他的关照。婺剧《白蛇传》的“断桥”具有特殊的表现风格,现在已成为全国公认的好戏,最近还在中国戏剧节展览,被誉为“天下第一桥”。这个戏第一次在沪演出,却是在“大世界”一个小场子里。那里的演出条件和空气都不怎么样,但西民情系桑梓,捧场如故,看了不止一回。从传统剧目《珍珠烈火旗》改



编的《双阳公主》一剧，也是由他请上海戏剧学院加工的。本来要搬上银幕，连中央几位管文化工作的领导人也已点头认可，只是因为“文革”那场大闹剧开锣，《双阳公主》只得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据我所知，西民参加革命50多年，大约也只“三过家门”：回乡三次或四次。一次是1937年，只在家住了一夜。一次是“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之后——他的老母就是在饥馑中病歿的。这次也是匆匆来去，只逗留一两天。最后一次是他谢世之前一两年。那年他由在《解放日报》工作的四弟士耒（助）陪着游览了浙东雁荡等处山水，回乡探望了亲友；楼静玄与他又见了一次面，其后不久就作古了。他向浦江人许下心愿，要把他的藏书捐赠给县图书馆。这时他的心脏病已愈来愈严重，只靠起搏器维持；还一度传说他得了癌症。上海的旧友们都很惦记他，去北京的人纷纷前往探望。有一次我到木樨地去时，正在跟他大谈家乡元宵花灯的盛况，他要留我吃饭，话刚出口，突然双眉紧蹙，面色苍白，心脏病发作。他要躺下休息，还强作笑容说：“我现在是长安布衣了，大家随便些吧。我常常想念上海的朋友们，50年代我在那里没有做多少工作，但自信是对得起朋友们的。如果换了个人，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这时，我想起，1957年鸣放座谈会上那位“毛主席的好学生”是说过“你们记者可以到杭州放把火”的，我也去了。发出通讯稿的当天下午，我在武康路华山路口遇见西民同志，心里还很得意。谁知他脸色一沉，泼了我一瓢冷水：“浙江的事要去管什么！”

一个多星期之后，反右斗争的风暴幕天席地而至。

我与西民同志当然说不上是布衣交，但也不同于那些革



命老战友,我只是他的一个小同乡、小朋友。尽管我也早已年逾花甲,做祖父的人了。

(原载上海《新民晚报》1988年12月25、26日)

作者附记:此文作于1988年冬,离开今天又有八九年了。收入纪念文集时,稍有补充修改。



西民同志二三事

阚岳南

惊悉西民同志不幸逝世，我感到十分悲痛。我过去曾有幸多次面聆西民同志的教诲，有些事至今历历在目。

我和西民 40 年代相识，那时我在重庆民营报纸做记者和编辑，西民同志是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由于他在思想上对我的影响，我日益敬重他，有时互相交换新闻。在 1943 年夏天重庆闹市区大梁子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中韩文化协会所办的文化餐厅在电力线上私接电线窃电，电力厂工人胡世合奉命前去剪断电线。文化餐厅的“外交经理”、军统特务田凯竟然用手枪将胡击毙坠落地面。我和几位年轻同志得知此事都很气愤，但我们都是受雇于老板，我们都愁写了稿子登不出来。我正在面对自己的稿子发愁时，西民同志来看我。我当时说：“你们共产党的报纸总可以为工人说公道话。经常有空袭，许多水电工人死在日寇炸弹之下，现在竟然有地面飞起的子弹……”西民同志见我很激动，就一面安慰我，一面看我的稿子。阅毕，他热情地说：“有可能刊出，但须作修改。”我当即请他代我修改，他把语气尽量改得平和客观。并对我说：“我们新华日报如果首先刊登，人家会说我们共产党鼓动工潮。你们《国民公报》社长曾通一先生是“国民政府”监察院川康监察使，于右任的红人。你们报纸是川康地方财团“丰”字十大公司的报纸。



你试试看,如果在你的报上登出来,会比新华日报登出来还要好。”又将我原拟的标题“堂堂陪都人权何在,恶人横行善人寒心”,改为“大梁子枪声,工人胡世合毕命。”第二天我的稿子刊出,石西民同志代拟的标题也一字未动,而且是“独家新闻”。当天报纸零售激增,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给报社打电话表示声援,有的人直截了当地问有无特务捣乱。接着两天全市水电工人大罢工,国民党终于被迫判处田凯死刑。后来王昆仑先生书“恶人横行善人横心”一联赠我。

* * * *

湘桂大撤退时,重庆震惊,曾组“陪都各界湘桂前线将士慰问团”,由国民党中宣部长梁寒操任团长,我代表“重庆报业公会”参加。报业公会是十几家日报的资方组织,当时因为被公推的国民公报经理李致用先生不愿上前线,才指定我充数,还可用特派记者名义写报道。我出发前和归来后,西民同志均约我长谈。我在报上发表了十几篇报道。后来西民约我吃晚饭,并问我为什么不写高级将领,如汤恩伯等。我说“河南四灾:水、旱、蝗、汤。他在河南的败绩你比我清楚。”西民同志反复向我说明只要抗日,就该写他,还说汤是当时黔桂一带国民党抗日部队的高级将领。于是我在报上写了《三访汤恩伯将军》,写汤恩伯腰系皮带剃光头像个伙夫,在南丹前沿阵地为我们充当日语译员,讥诮日俘。

* * * *

重庆谈判期间,我在《时事新报》做记者,领了记者证,逐日到会旁听旧政协会议。西民同志鼓励我多写国共两党之外代表的发言。有一次他问我为什么不写李烛尘的发言,我回答说:“黄海公司大老板说的是根治黄河的设想,迂阔不切当前



民主运动的实际。”西民笑着说：“你比共产党还要左”。西民同志还鼓励我常去参加工商界的定期集会——“星五聚餐会”。当时重庆私营报纸大都靠国民党官方或有钱人资助，而时事新报虽有大老板孔祥熙做后台，但他却不经常出钱，就连当时的总经理张万里和主笔吴世昌也都常私下议论说，越是有钱的人越吝啬。因此报纸要靠广告过日子。西民同志对我说：“常去那里，可以多反映各阶层意见，又有利于报纸广告收入。”

* * * *

“较场口事件”中，我们 42 位民营报纸记者，签名揭露中央社的歪曲报道。我们中的有些人，常在一些记者集会或新闻招待会等场合，嘲弄那篇歪曲报道的执笔人殷××。西民同志就劝我们不必针对个人。殷感到大家不再给他难堪时曾表示他也是雇员。因此在李公朴、郭沫若等延请史良律师控告特务刘野樵的殴辱时，殷被传到庭，他言语支吾，似有难言之隐。

* * * *

马歇尔来华调处前后，西民同志曾鼓励一些朋友学英语。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自己也在学，并要我教他。我从他手中接过敞开着的书本，见是林肯在格特斯堡的演说词。他一定要我为他示范朗读，我告诉他说：“我只能粗略地阅读，却不大会讲。”为了尊重他，我还是结结巴巴地朗读了一遍，他给了我鼓励。后来我知道他用这个办法结交了好几位能讲英语的朋友，有的还去解放区部队当译员（如张维能等）。

* * * *

全国解放后，历次运动中，特别是“反右”，有些共同的熟人受过审查或不应有的委屈。他们中有些人在我面前埋怨西



民同志，西民同志每次总是向我耐心解释党的政策，并对受委屈的朋友表示惋惜，但从不私下议论党的决定。10年浩劫之后，1979年春西民同志来到南京，我对下放的遭遇很不满，向他大发牢骚。他已满头白发，仍像年轻时一样地接待我，听完我的诉说，他对我深表同情，甚至沉痛地说：“我们对不起许多朋友！”几天之后，他住到汤山疗养，仍然来信对我多方劝慰。我从上海和北京一些朋友那里得知西民同志在“文革”中，所受的磨难比我深得多，但却很少听他鸣冤叫屈。

（原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
分会通讯第9期，1988年3月出版）



石西民与先父俞颂华

俞湘文

早在我不到 20 岁时就认识了石西民同志，他那时也只有 20 多岁。他给我的印象是稳重、寡言，而又是很诚恳的人。近几年来，时有通信往来。每次接到他的来信，都能从中得到不少教益，信中却从没带有“教训”的口气。

西民同志原是我父亲俞颂华的忘年深交，他们的相识也完全是偶然的。1934 年到 1935 年，西民同志因察北抗日同盟军失败而来到上海，从事左翼文化运动。那时的地下党员在国统区工作，既要冒抛头颅的危险，又得自谋生活。他到上海后，偶尔投了一篇稿子到《申报月刊》，其时，我父亲是该刊的主编，接到此稿，非常赏识，就约他去报社谈话，当场找了一篇文章请他翻译，过了几天就请他去担任《申报周刊》的编辑（这时《申报月刊》刚改为《申报周刊》）。他在 1984 年和夫人吴伟同志来上海时，还当着我的面笑着告诉在座的钦本立同志说：“我进了《申报周刊》，每月可得薪金 70 元大洋，我一个人租了一间小亭子间，生活很可以过得去了。”

西民同志去《申报》前夕，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一下影响到了上海。12 月 25 日，上海各界举行了盛大的反日爱国游行，西民同志也参加了。队伍在南京路上受阻，这时他自告奋勇地站出来把队伍带到宝山路上在一二八事变中



被焚毁的东方图书馆广场,开了大会,接着继续游行。在经过北四川路时,遭到租界大批巡捕及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殴打、冲击,不少人受伤,队伍无法通过,只好被迫折回宝山路。恰好《申报》也有记者采访了这天的游行,并拍摄了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正好是西民同志站在两个受伤青年的中间,正在振臂高呼抗日口号。这张照片恰恰在西民同志于1936年1月去就职的那天被刊在刚出版的《申报周刊》封里的时事照片页上。石西民同志见到照片时心想:“这下,我的饭碗要‘砸’了”。三四天后的一个下午,父亲在编辑部其他同人下班后,约他到办公桌前,指着那本周刊上的照片说:“石先生,这是不是你?”答说“是”。父亲就说:“想不到你竟如此激烈!我要早知道,真不敢请你来工作了。”还向他说了《申报》、《申报周刊》影响很大,在这里工作,特别要谨慎等话。西民同志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我以为要被辞退了,结果并没有。俞先生一直没再提这件事,对我的工作却是信任有加。”

当时,《申报周刊》的影响确是很大的。该刊每星期天出版时,随《申报》附送,不另取资,并可另行订阅。暑假两个月间,凡有学生函索,均予赠阅。所以它的发行量在上海刊物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在这个刊物上凡是西民同志所写的文章,多署名“栖民”。《申报》还曾派他去当过战地记者,发表了战地通讯。

关于西民同志这次参加游行的事,父亲连对我们家属也从未谈起过。父亲那时并不知道西民同志已是一位地下党员,也没有能亲眼见到他解放后担任了不少重要的职务。石西民同志曾经说过,那时《申报周刊》的班底是不差的,而父亲那时却对家里人说过:“在我编辑部的同仁中,将来最有前途的是



石西民。”这句话果被父亲言中了。

“八一三”爆发后,《申报周刊》停刊。继《申报》主持人史量才为该报总经理的马荫良先生派父亲到汉口去参加《申报》,汉口版的筹备工作。父亲遂即去信上海请西民同志也去汉口。西民同志冒着日机空袭的危险,押运了汉口版所需要的卷筒纸,也到了汉口。1937年底,他们相继离开了《申报》。父亲以后就奔波于海内外任教或办报;西民同志则奉党组织之命参加了在汉口初创的《新华日报》。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我已从西北到了重庆。有一天,因事去化龙桥《新华日报》社探望陆诒同志的夫人。在那里我又见到了西民同志,他立刻放下工作来陪我谈话,方知他是随新华日报社由汉口迁到了重庆。

抗战胜利前夕,父亲也到了重庆,应黄炎培先生之邀请,主编《国讯》。西民同志时常从很远的化龙桥到张家花园《国讯》茅草小屋的宿舍中,和父亲促膝谈心。父亲那时的身体已虚弱不堪,步履艰难,但因为《国讯》经费拮据,来搞只能给以薄酬或无酬,只得约请交谊深厚的笔友们给《国讯》写稿,因此也曾拄着拐杖去探望过西民同志向他约稿。那时,除了达官富商外,其他人们的生活都是很清苦的,西民同志当然也不例外。他不计稿酬,在抗战胜利前后,利用工余时间,用笔名为《国讯》写过不少时事评论,宣传党的政策。

1946年,父亲复员回到上海,西民同志到南京筹办《新华日报》未成,到上海向周恩来同志请示报社人员撤退事宜时,他怀念着病中的俞颂华先生,曾去探望我父,并向我父亲辞行说,他要到解放区去了。翌年,父亲去世了,从此他们就再也不能相见了。



解放之初，我对政治可以说是无知的。得悉西民同志已到南京主持《新华日报》，就去信请教他如何使我能适应新社会的环境。他立刻回信叫我要多学习学习，并说：“我永远怀念着俞先生，因为是他，使我正式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

西民同志到上海任市委宣传部长期间，我们也见过几次面。第一次见到时，他就向我母亲和我说：“我在解放区见到报载俞先生去世的消息时，很难过。他朋友多，如果他能活到解放以后，我们无论如何要设法把他的病治好。”我们深为他的念旧之情所感动。

1965年，他被调至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以后，相互就中断了联系。“文革”期间，我在病中，有朋友来告诉我说西民同志曾被押到上海来“批斗”。后来从吴伟同志处又知道他曾被关押九年之久，由此种下了不治的病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才又恢复了通信联系。他鼓励我和我的老伴为父亲编纂一本《文集》。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需要他的指导，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中肯的答复，还帮助联系《文集》的出版单位。他还答应为《文集》写一篇“前言”。不想等到我们把《文集》基本完成，正想请他过目后写“前言”时，他已病得力不从心了。而今《文集》已由商务印书馆接受出版，但西民同志的“前言”，读者再也不能见到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西民同志不仅对我父亲有如此的念旧情谊，对其他友人，亦复如此。1984年，我接到他的来信，说是他将到沪看看老朋友们。不久，他夫妇俩来沪了。吴伟同志悄悄地告诉我说他是到上海来治病的；他自己却若无其事地整天忙于在宾馆里会客或走访朋友。他还念及在运动中受到折磨的一些朋友，尽可



能设法会见了他们。凡是在他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期间在“反右”中无辜受害的朋友，尽管并非由他亲自点名所致，也一一予以亲切慰问，并当面引咎自责，还说是埋没了不少人才。

西民同志的又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从他年轻时代直到他逝世，他所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位平易可亲的谦谦君子。

上海的《新闻记者》创刊后，连载了他的一篇长文——《报人生活杂忆》。这篇文章特别对新闻界后辈是很有益处的。我去信说：“您的这篇大作，我差不多都拜读了，其中有些叙述使我回忆起在抗战期间许多进步文化人和我们一般人的艰苦情况……”。他来信说：“这谈不上什么，我不过是留下一些脚印而已。”

1985年，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本著作《时代鸿爪》，他寄赠了我一本。这是一本搜集了他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一部分文章的文集，他留给了我们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我通读了全文，其中没有发现他有一句夸耀自己业绩的话；相反，在他的《后记》中，却自称这是一本“大杂烩”，并写道：“我感谢朋友们的鼓励与支持，但我的内心又总是惶惶不安。我担心这既无卓见又无文彩的文字，这样印将出来，说轻一点会浪费读者的精力与时间，说重一点就怕害人不浅了。然而由于我的一生毕竟处于一个空前变动的时代，如果读者在这一堆大杂烩中，偶尔能找到一星一点资料，那就是对我最高的奖赏了。”在《后记》的最后一节中又写道：“当然，如果是一位左右历史发展的风云人物，我倒非常赞成在适当的时候，能如实编出他们的全集，并且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至于像我这样一类普通的人，恐怕经常检点回忆一下一生的的是是非非，有所警惕，从而不断提醒自己要认真做人，倒还是应该的。”



方今国家正在加速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党和国家需要他，人民需要他，许多朋友需要他，新闻界的后辈也需要他。他虽已退居二线，在重病中仍关心并盼望能见到《郭沫若全集》、《俞颂华文集》早日问世。但是，回天乏术而一下就和世长辞了。惜哉！哀哉！

（原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
分会通讯第9期，1988年3月出版）



难得身后名

谢蔚明

石西民同志逝世的噩耗传到上海，在老一辈知识分子中引起了痛惜和思念。50年代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曾经顶住“左”的逆流保护过一些知识分子，在安置、任用知识分子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事隔30年，至今人们还在传诵他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有胆有识，这是很难得的。

1946年在南京，我初识西民同志，当时他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筹备创建《新华日报》南京版，后来国共和谈破裂，办报计划落空。报纸虽然没有办成，他却团结了新闻界一些朋友，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贡献。他在南京大约住了半年，我和他相见的次数不过几回。有一天，忽然接到他用旧式八行笺写的一封信：“今晚6时半，请到新街口五味和餐馆一叙，并请约毕公同来。”（“毕公”指的是北平《世界日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毕群，是介绍我认识西民同志的朋友）。事出仓猝，临时找不着毕群，我就一人如约前往。五味和是一家小饭馆，以川菜闻名，西民同志和我以前曾在这里吃过饭，这大概是他选择这里相聚的原因。见面之后，他告诉我：“找你来叙谈，是话别，明天一早我就要坐飞机回延安了。”饭馆人多，他低声说了这几句话。接着告诉我，中共代表团这一批撤退的是哪些人，留在南京的还有董老、王炳南、梅益一些同志等等。谈话中，猛然发现



四座的顾客陆续走完，我们才起身离座。走出餐馆，看到闹市中心的新街口许多商店已经打烊，深秋的南京夜凉如水，我想彼此该珍重道别了，但是他要我再散散步，似乎还有些话要说。我们便折向中山东路，边走边谈，他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和对时局的看法，随后是他的临别赠言，语重心长，是期望也是嘉勉。西民同志儒雅谦和，乐观自信，待人诚恳，在南京短暂的交往中，我深受他的启迪教益。

两年半以后，我和西民同志又在解放了的南京重逢。带有历史嘲弄意味的是，在反动政权时期“寄人篱下”的西民同志没有办成《新华日报》南京版，现在他随解放大军进入南京，亲手接管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胜利地实现了创办《新华日报》的夙愿。时移势易，他当了官，但他待人接物诚恳谦和的态度没有变，遗憾的是，因他工作繁忙，我们又不在一地，我接受他的教益机会少了。

前几年，他退居二线，特地从北京到上海重游旧地，上海是他工作过近10年的地方，他是很有感情的。过去在南京新闻界的故交旧识听到消息，相约请他聚餐叙旧，杯酒联欢之中，他动情地说：“过去当官，和老朋友们无形中疏远了，现在当了老百姓，以后可以和大家多接触，谈谈心。”

1987年6月，我为《文汇报》创刊50周年纪念到京组稿，西民同志是约稿对象。到我离京返沪的前一天，才和他电话联系上，原来他每天上午要到医院就诊，下午有空，约我到他的寓所见面，这天是6月19日。见面时我说明来意，一是看望，二是约稿。他一听，饶有兴趣地谈起《文汇报》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于上海孤岛时期的战斗历程，并说，解放初期《文汇报》复刊，他是参与其事的。50大庆写点祝贺文字，义不容辞，不过



身体不好,但是愿意努力试试。我问起病情,他把手伸给我看,油光发亮,原来是浮肿。去年8月我到北京,他因膀胱病住院,我和吕德润兄前往探视时,见他必须用导尿管排尿,由于病情缠绵,肾功能日益衰退,出现水肿。我了解他的病情之后,倒懊悔不该麻烦他写稿。叙谈中,他的情绪兴奋,一谈就是两小时,我怕影响他的病体,不敢多打扰,就起身告辞,想不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我回到上海没有几天,就收到他撰写的纪念报庆稿。附信说:“病中多时未执笔,辞不达意,文字能力日益衰退,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发信日期是6月27日。读着他文采斐然的文稿和来信,想起一周以前目睹他浮肿的手,再想象他支撑病体,用浮肿的手力疾撰稿的情景,我被深深的感动了!最近接到吴伟同志来信说:“西民那篇文章,是抱病断断续续写就的。其他一些地方约稿,他因体力不支,执笔又放下,没有完成任务。真是憾事。”西民同志从事文字工作50余载,写作终生,这篇遗作是辞世前的绝笔,更为珍贵。

岁月流逝,抹不掉我对西民同志的深深怀念。

(原载《人民日报》1988年2月25日)



深深的怀念

钱辛波

在《新华日报》创刊 50 周年纪念会上，我得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新华日报史》(上册)。这使我马上想到了石西民同志，他为这本书的出版曾倾注了许多心血，但未能亲睹它的出版就辞世了，实在是一桩憾事。

出版《新华日报史》是石西民同志生前的一个心愿。197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不久，就确定将重庆新华日报史作为重点研究课题。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的石西民同志不时来新闻所，和大家一起商讨怎样列提纲、收集资料、制订研究计划。打算在三五年内完成《新华日报史》。

为了写这本书，开过不少次的会，西民同志在会上多次发言。他提出，写这段历史的第一个原则是尊重事实。如果在以前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如实反映事实的话，今天就应该还其本来面目。他不止一次提到，1938 年在武汉《新华日报》创办初期，王明把持报纸，硬要给陈独秀加上托派汉奸罪名加以排斥的事例，主张像这种情况应据实写出，不要回避。

西民同志为能早日出书想了许多办法，可谓不遗余力。他提供了收藏多年的宝贵资料，组织老同志聚会，共同追忆往事，出版了多期《新华日报研究通讯》，建议把范剑涯和田伯萍同志从外地请来北京写作，并向社科院申请新华日报史研究



基金。可是这本书仍然迟迟未能出版。1985年10月,我和西民同志一起在重庆参加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他不胜感慨地对我说:“没想到出版这本书这么难,如果在这个会上大家能看到这本书该多好!”

我初识西民同志是在1946年的4月末,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前夕。我作为南京《新民报》记者,当时忙于采访自重庆飞来的要员。一天下午,我和浦熙修到光华门外机场采访。黄昏时刻,机场开始冷落下来(当年还没有夜航班机),我们正准备离去,机场上空突然响起了飞机轰鸣声。熙修说:“不如再等等,看看有谁来。”这是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待它停稳,我们迎上前去。机舱开启,走出几个美国军人,随后舱门口出现了一位身穿西装的中年男子。站在我身旁的浦熙修不禁叫出声来:“是石西民!”原来他和龙飞虎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先遣人员,搭乘美国军用机来到南京。

西民同志下机后,环视四周,没有看到旧政协来人迎接,却见到了浦熙修和我,感到很奇怪。熙修请他坐《新民报》的汽车进城,先到她家坐坐再说。就这样,我们挤在一辆车上进了城。在车上,西民同志告诉我们,他此行是来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南京版的。

车子快到浦熙修家时,西民同志突然对熙修说:“不妥,不能先到你家。共产党一到南京就到你家,以后说不清。”西民同志的深思远虑使我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于是我建议先到新街口蜀中餐厅。西民同志认为这个主意很好。我们在那里吃了晚饭,并给政协秘书长邵力子打电话联系。

1946年石西民在南京只停留了几个月,在中山北路美国新闻处隔壁找到了新华日报馆址。但报纸没有出成。风云突



变，国民党撕毁了政协决议，内战又起，西民同志就在当年冬天离开南京回延安了。在南京短短的几个月中，我们曾经去玄武湖划船，当一叶小舟摇向湖心时，他说这是谈话最保险的地方。

1949年5月，南京刚解放，西民同志南下出任《新华日报》社长。我和赵超构、徐铸成、王芸生、杨刚等从北平南下到了南京，西民同志热情招待我们。这时候大家的心情是最愉快的，席间谈笑风生，议论南京《新华日报》终于问世了，但已不是一张在野党的报纸，而成为执政党的报纸了。

建国以后的30年间，我和西民同志没有什么来往，直到1979年，我们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见面的机会才又多起来。1980年为浦熙修平反，西民同志和我谈论写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他不无愤慨地说，浦熙修无论在重庆，在南京，一贯热爱共产党，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帮助党做了不少事，说她反党，于情于理实在难以想象。党把许多忠诚的朋友视为敌人，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西民同志怀念旧友之情到晚年愈深，每逢全国人大和政协开会，他常主动打听从外地来的故友的住处，唯恐失去一次聚晤的机会。去年9月底，韬奋基金会成立，他的身体已不太好了，还是勉力出席。在会场上见到我时，说：“难得有机会一见老朋友，我还是要来的。”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1985年后，西民同志担任新闻研究所名誉所长。他不常来所，但来时总要在我的办公室先坐上一会儿。西民同志是位老新闻工作者，他坐定后的第一句话总要问：“最近有什么新闻？”他虽然已退出新闻工作第一线，但对新闻改革仍然非常



关心。他说,不管怎样,报上新闻少,不能满足读者需要,就非改不可。他深感当前新闻界还没有完全从“左”的影响中摆脱出来。西民同志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对“左”的危害感受尤深。他多次谈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挨过整,但也伤害过一些同志,每思及此,总深感歉然,痛心!他说,整来整去的结果,不仅伤害了同志,对党、对国家的伤害更大。与西民同志的交谈使我受益匪浅。我建议他将丰富的经历写下留给后人,当是一大财富。他总是说,写是想写的,无奈身体不好,精力不济,又无帮手,以后再说了。但是病魔无情,夺去了他的生命,也夺去了他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宝贵经验,这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原载《新闻研究资料》,1988年6月出版)



寄我哀思

——悼石西民同志

杨永直

10月16日在风雨声中忽然传来石西民同志病危的消息,时近午夜,这一晚我在神魂不安中度过。第二天清晨忽报丧音,石西民同志病故了。风雨敲窗,寒意侵衣,我的眼泪潸然而下!

我知道石西民同志的名字是在1938年,我在川东一带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他在重庆新华日报,我常在报纸上读到他的文章。谁知10年之后,1947年冬,我们在塞北延安——中国红色首都的清涼山上聚会了。那时,国内战云密布,国民党胡宗南几十万大军进犯延安,延安《解放日报》正准备最后一批的撤退。在硝烟烽火之中,石西民同志和梅益、钱俊瑞等许多著名的报人学者纷纷来到清涼山。2月的延安,仍然地冻天寒,寒风在山谷中呼啸,胡宗南逼近延安的消息频频传来,但我们,刚来乍到的,束装待发的,都无视逆胡猖獗,从容欢聚。在远远的炮火声中,我和石西民同志第一次碰杯,预祝我们不久之后重返延安。那天在清涼山上,窑洞里盏盏油灯点得通明,欢声达旦。第二天,我们就在解放日报编辑部分手了。石西民同志留在延安接手主持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我随廖承



志、陈克寒等同志向西北方向撤退，着手实现边撤退边出报的计划。尽管刀光剑影，子弹横飞，我们在撤退的第二天，又在山沟里出报了。留在清凉山上坚持工作的同志方从容地离开延安，石西民同志是最后离开的一个。

在战争年代里，日子过得飞快，从延安撤退到1949年4月，不过两年，国民党的白色的首都——南京被我军解放了，这一胜利震惊世界。这时我正奉命率领山西日报的部分编辑记者随彭德怀、罗瑞卿进攻太原的大军，在山西前线等待进城接管，谁知攻破太原前夕我忽奉命迅速南下，赶赴江苏丹阳陈粟大军司令部报到，随军进入上海办报。我日夜兼程赶到丹阳，上海解放在望了。我奉命休整待命，一天忽传陈毅将军召见，在座的还有范长江同志。陈毅同志对我说：“长江同志随我进上海，你立即返回南京，石西民同志急需助手，你明早就出发吧！南京是你的故乡嘛！”

江南5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好时节。我兴奋地走出下关车站，急忙赶到南京新街口新华日报报到。报社社址就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旧址。我走进三楼社长室，石西民同志已经迎出门外，携手坐下。西民同志笑道：“你这身打扮该换一换了。”原来我着了一身褪了色的灰色军服，腰间还挂着手枪，我把枪解下，西民同志继续说道：“我们还不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战争未完，但我们是来办报的，我们现在的斗争要用笔杆子，枪杆子对你我暂时没用了。”我笑道：“命令很急，行色匆匆，来不及更换行装，请你分配工作吧！”

石西民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报社接管情况，编辑、出版、发行以及记者的状况。接管工作进行了三天，驰名中外的新华日报，就在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编辑部出版了。接管工作做得



漂亮！西民同志还告诉我说：“中央决定把《解放日报》的名字给上海，把《新华日报》的名字给南京。这是我党办的国内外最有影响的报纸。我南下时，周总理亲口说的。”

我十分激动，深感党中央对报纸的关怀，深感任务光荣与责任重大。我握着西民同志的手：“好极了，我一定在你领导下，把报纸办好。你单枪匹马一个人接管了中央日报，并且顺利地出版了新华日报，真不容易！”我望着他那高瘦的身材，充血的眼睛，赞赏之心油然而生。

“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南京市委，是老区调来的同志，是地下党，旧中央日报社里的进步记者、编辑、工人和发行人员等。我们共同搞好接管，并迅速出版了新华日报，打倒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他脸上闪过一丝隐约的微笑，是高兴的谦虚，是愉快的流露。

我们在新华日报合作了整整一年，又在南京市委宣传部分合作了一年多。

随着日月的流逝，国势的兴旺，我们在此后几十年的大风大雨骇浪涛天中，依然时聚时分。想起几句辛弃疾的词：“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这好像是对我们友谊的写照！

1986年的初夏，在上海一次聚会上，石西民、梅益、姜椿芳、杨西光、王元化等同志都到了，还有许多脱颖而出的中青年理论家参加。我和西民同志站在上海大厦19楼的阳台上俯瞰全市，闪烁的灯光如亿万繁星密布，远眺黄浦江水奔腾入海，他不禁慨然说道：“我们不说塞北江南，就是这黄浦江水，我们也共饮十几年了！”我不禁动情道：“如今我们虽都是华发苍颜，但眼底的万里江山是一天比一天更美了，我们为之奋斗



一生的理想，你我虽不能亲眼看到，还要几代人的努力，但蓝图已见，也堪告慰了。”

我举起杯来一饮而尽。这是一年前的事，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欢聚。

（原载上海《新民晚报》1987年11月14日）



哀思绵绵忆当年

——悼石西民同志

吴 镇 王淮冰 姚北桦

面前放着石西民同志书写的《南京新华日报大事记》的题签。这是去年11月，应我们的请求，在北京寓所中抱病写成的。他磨墨展纸，认认真真地写了四遍，字字都饱浸着他对这张报纸的深厚感情。

时间只过去一年，字迹还是那么清晰有力，当时的情景如在目前，而这位党的著名报刊活动家却已遽然离开我们而去了。我们怅望着这张题签，哀思绵绵，心情格外沉重。

他的名字与新华日报分不开

从1937年底党中央决定在武汉出版机关报《新华日报》，西民同志就参加了筹建和创刊工作。作为战地记者，他深入赣皖前线和江南新四军游击区，发表了一系列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战地通讯，是当时的名记者之一。1939年7月由前线回到重庆后，又先后担任《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和采访部主任等职，在报社工作达九年之久。

抗战胜利后，奉周恩来、董必武同志之命，他作为先遣人



员,于1946年4月由渝来宁,负责筹办《新华日报》南京版。经过数月的奔走,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障碍,在中山路成立了筹备处,最后连精心编印的试样都已准备就绪。然而,决心发动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当局,硬是拖着不发给登记许可证。10月,和谈濒于破裂,报纸出版无望,他奉命随周恩来同志撤回延安。

离宁前夕,他曾满怀信心地向新闻界友人表示:新华日报总有一天要和南京读者见面,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把新华日报的命名放在南京

这一天,很快到来了。

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在北京中南海,周恩来同志接见并宴请了包括范长江、石西民等在内的一大批准备南下的文化、新闻界知名人士。席间,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宣布:把延安时期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命名给上海,在国统区有巨大影响的《新华日报》的命名放在南京,并分别任命范长江和石西民同志为这两张报纸的首任社长。

接见后的第二天,西民同志即衔命南下。4月26日抵宁后,立即受军管会委派,接管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和中央广播电台,同时集中全力投入出版新华日报的准备工作。仅仅经过三四天时间,29日一大早,套红印刷的《新华日报》创刊号已满街叫卖,和沉浸在解放后的喜悦中的南京人民见面了。



他领导我们这样办报

那时，南京刚刚解放，群众对党的政策十分陌生。由于国民党长期反动宣传的影响，有些人甚至疑虑重重。人们迫切要求了解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和政策。面对这种情况，西民同志要求编辑部，把正确宣传党的路线政策，放在报纸工作的首位。而在进行宣传报道的时候，他教育编辑记者，一定要针对群众的思想情况，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做到有的放矢。例如，当时有不少人对什么是剥削与非剥削的界限分不清，有些人甚至连人力车也不敢坐。西民同志指示有关编辑，就这一问题专门写了一些答读者问，通过这些群众关心的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进行宣传，使群众逐步了解党和党的政策。6月间，报纸副刊曾连续数日转载关于对著名作家萧军及某报所谓“错误”的批评，西民同志发现后立即制止，认为解放才一个多月，就连篇累牍地刊载此类文章，只能在新区知识分子中造成思想混乱，弄得人心惶惶。对他的远见卓识，编辑部同志无不敬佩！

当时的新华日报是一张城市报纸。西民同志认为，办好这张报纸一定要从城市的特点出发。而城市读者历来有关心国内外大事的阅报习惯，加之当时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读者极为关心，因此他指示编辑部要大力加强时事宣传。那时候，报纸每天除以较大篇幅刊登电讯稿外，还针对读者提出的问题，经常发表时事评论、宣传讲话、问题解答等。这些文章，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决不含糊其词，回避矛盾。抗美援朝开始后，又增辟了《时事一周》专页，西民同志亲自执笔为专页撰写时政



论文。报上几乎每天都有配合时事的漫画和图片发表。有述有评，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尖锐泼辣的时事宣传，成为报纸一大特色。

西民同志经常提醒我们，一张刚诞生的报纸，要想在群众中生根，赢得读者的信任，关键在于能否坚持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敢不敢于讲真话。他说，新闻报道，事实第一。事实是对的，就说对的；不对的，就说不对，并强调这是周恩来同志领导重庆新华日报时的一贯思想。记得解放后不久，有位记者曾写了一篇关于某私营工厂少数工人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批评稿，市总工会个别负责人坚决不同意发表，认为这样会长资本家的威风。官司打到西民同志那里，他当即批示刊用。他说，工人有了错误，为什么就不能批评教育？这样我们还能恢复和发展生产嘛！在他的影响带动下，报纸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文过饰非，不讲假话。看腻了谎话连篇的反动报纸的读者，一旦读到这样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报纸，自然耳目一新，感到两种政党领导下的两种报纸，确有天壤之别。

为了办成一张真正是人民自己的报纸，西民同志高度重视报纸的群众工作。当时报社的群众工作组，是编辑部最大的一个组。他们每天要处理数以百计的读者来信，还要接待四面八方登门来访的大批读者。报纸每天用半版篇幅发表各阶层读者来信，有建议，有批评，有议论，成为沟通党和群众的一座桥梁，真正发挥了党的耳目喉舌的作用。

此外，西民同志还在领导报社人员广交朋友，做好统战工作；消灭差错，提早出报；改善经营管理，实现企业化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总之，他为了给这张报纸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付出了大量心血。



他的作风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凡与西民同志共过事的人，都知道他的最大长处，是善于团结干部，使用干部。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平易近人，待人宽厚。在他领导下工作，使你感到愉快。即使受到他的批评，哪怕是严厉的批评，也让你心悦诚服。

他放手使用干部，而在必要时又能手把手地帮助干部。他把任务交待明确之后，总是鼓励你放开手脚大胆去干，信而不疑，从不乱加干涉。你做出成绩，有了进步，他为你高兴；工作中出了问题，他首先承担责任，绝不把一切过失都委之于下级。对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同志，更是爱护备至。他在修改稿件的时候，常常把写稿的同志叫到跟前，和颜悦色地告诉他这一段为什么改，那一句为什么加，从政策思想到谋篇布局，从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无不一一指点。其一丝不苟的精神，不下于一个优秀语文教师批改学生作业。不少经他亲手培植的青年，后来都迅速成长为颇有成就的编辑、记者，有些同志至今仍活跃在新闻战线上。

西民同志自奉俭朴，而对周围战友们们的生活却关怀备至。他指示总务部门要为夜班编辑和排字工人做好夜餐，宿舍装上深色窗帘，尽量减少周围噪音，让辛苦了一夜的职工上午能有一个安静睡眠的环境。那时报社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但在西民同志领导下，党内党外，上下一心，亲密无间，团结融洽。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许多人仍继续工作，西民同志等领导干部常常要催促大家早点回去休息。位于南京新街口的报社办公大楼，有如一艘灯光通明的航船，满怀信



心地朝目的地驶去。同志们每忆及那段时期的战斗情景，至今怀念不已。

报纸创刊后不久，西民同志调到省、市宣传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虽然任务繁重，但他仍十分关心报纸。直至1954年离开江苏去中央和上海工作后，对新华日报始终怀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

去年11月，曾在新华日报工作过的同志们，听说西民同志身患不治之症，深为惦念，曾委托王淮冰、姚北桦同志专程赴京探视。当时，他刚由医院回家休养，身体极其虚弱，但仍支撑病体，殷殷询问南京友人近况，对新华日报史的编写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他一口气谈了将近个把小时，似乎言犹未尽。没想到这次语重心长的谈话，竟成了他对这张亲手创建的报纸的最后遗言。

编写好《南京新华日报史》，总结在西民同志领导下办报的经验，使党报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为此而努力，以纪念我们的老社长石西民同志！

（原载南京《新华日报》1987年11月13日）



从报纸到广播

——回忆解放初期在西民同志领导下工作

李 扬

1986年12月27日，我到北京看望刚出医院在家疗养的西民同志，叙旧两个多小时，不料这竟是一次诀别。

我和西民同志相识，是在1949年4月底，我在新华社第八兵团分社主持工作，为刚创办的南京《新华日报》提供进驻南京部队战斗和生活的报道。西民同志向我提出，新华日报缺少军事记者，想借用几名兵团分社记者，以加强大进军的报道。我毫不犹豫，立即应允。从当年5月份起，季音等同志便参加了《新华日报》的军事报道工作。这可以说是和西民同志工作上联系和配合的开始。

和西民同志相知，是在1949年7月，新华社第八兵团分社成建制地合并到新华日报社，接替原中原解放区新闻干部准备进军大西南进行集训后的工作，这样，便在西民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一年。

最使我受教益并显示西民同志超群才智和优良美德的，是下列几件事：

一是他提出并组织实施的报纸宣传报道方针：立足南京，面向华东、全国以至全世界，既体现了新解放城市南京的特



点，又发扬了武汉、重庆两个时期《新华日报》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政治事件，西民同志都是雷厉风行、以身作则的。他主持各界代表座谈会，直接听取并及时发表他们的呼声、意见和要求，富有成效地密切了党报同民主党派代表人物，科技和体育、教育界知名专家学者的联系，使报纸成为进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阵地。

二是西民同志提出，并通过社委会、编委会作出创办“新华之友会”和新闻训练班的决议。一年多的实践，使“新华之友会”拥有2000多名会员，成为一座群众教育自己的社会大学，西民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大学校长。1949年6月底，新华日报、新华社南京分社联合创办新闻训练班，录取了369名学员。同年8月，新华总社又委托石西民同志，由新华日报代招了200名新闻班学员。由于西民同志的高瞻远瞩和精心组织，这500多名学员结业后，不仅充实了新华社、新华日报、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还输送了一批学员进军大西南，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新闻战线上的骨干。

三是西民同志长期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善于团结来自各个解放区、二野和三野、公营和私营新闻单位、公开党组织和地下党组织聚集于南京的新闻工作者，形成了密切配合、团结协作的局面。当时的新华日报是南京新闻界活动的中心，以西民同志为首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是南京新闻工作者之家。

1950年6月底，西民同志对我说，根据市委的意图，他已辞去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兼台长的职务，推荐我主持南京台的台务兼总编辑工作。我提出对广播工作不熟悉，还是从事



报纸编辑工作为好。西民同志循循善诱地启发说：广播工作是我党执政后新的宣传阵地和喉舌，急需加强领导，掌握好这个宣传武器；不熟悉就拜能者为师和刻苦钻研吧！我说我执行市委的决定，我请求你带一段路，我再挑这副重担。西民同志接受了我的要求。这样，我便去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了。

在电台工作初期，总自觉不自觉地习用从事报纸工作的观点和方法搞广播工作，自以为市委不是把广播同报纸同等重视，有畸轻畸重之分，我请求西民同志帮助解决。西民同志明确地说，报纸和广播都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传播的媒介不同：报纸是用文字和图像，广播是用语言和声音；党政机关重视和运用广播，也有一个认识发展过程。关键是广播工作者要充分发挥广播工作的特点和优点，来争取党政领导进一步的重视和运用这个武器。

在西民同志经常关怀下，由于电台编采同志坚持勇于探索创新，发挥广播媒介的优点，不断扩大广播讲座范围，陆续开办了卫生、医药、工商、财税、时政、俄语等专题讲座，并现场转播各界代表会议。1951年南京市镇压反革命现场广播大会，由市委出面作周密部署，西民同志现场指挥，电台同志全力以赴，以人民大会堂为中心会场，各区设分会场，组织50万人收听实况，各分会场收听的电话反映接不胜接，检举揭发的信件一束束送来，在南京全城迅速掀起镇压反革命高潮。这就揭示了广播宣传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语言媒介的瞬息性、群众性、广泛性的特点和优点，得到各级领导和广大听众的承认，受到市委领导同志的表扬，我们广播工作者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西民同志对广播工作特点的论



断得到了实践的检验，进一步赢得了广播工作者的尊敬与爱戴。

（原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
分会通讯第9期，1988年3月出版）



西民同志的赠言

王淮冰

“我觉得一生大难不死，至今皓首，年过古稀，也很已够本，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如老天开恩，则多看几年花花世界，如马克思相召，随时也可奉召前往。心地光明，没有包袱，所以心情乐观，可以告慰老友。”

这是1987年8月29日，重病中的石西民同志给我的信中的一段话。尽管当时他已“心脏、肾脏一齐告急”、“步履维艰，每日头脑昏昏”，但仍以乐观心情，安慰挂念着他的远方老友。“人老了会更念旧，最大幸福为老友相聚，可惜不容易。”哪知道，48天之后，她的女儿石小国突然从北京打来报丧的电话；75天之后，这位“心地光明，没有包袱，心情乐观”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闭上双目，安详地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中的鲜花丛中。在哀乐声中，我热泪盈眶，默默地站在900多人的长长行列中，带着他的南京的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的嘱托，缓缓地走近他的遗体，深深三鞠躬，看一眼，再看一眼，再看一眼今后只能在梦中相见的遗容。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我们再也享受不到和他倾心交谈的愉快了。



一次难忘的采访

和西民同志相识几近半个世纪。1939年春，是胡愈之、范长江同志创办的国际新闻社，使我们得以相互有所了解。当时，西民是重庆《新华日报》战地记者，他和范长江、孟秋江、陆诒等都是活跃在抗日前线的著名青年记者。西民同志还是日本问题专家。这些进步名记者，成为我们这些追求进步、初入新闻工作大门的青年人的学习榜样。

和他相交，是从1945年8月下旬开始的。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几天以后，我从贵阳赶到重庆，准备去汉口筹办《大刚报》分版。八年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国共两党能否继续合作，组成民主联合政府，进行和平建设，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大事。我一到重庆，首先去拜访西民同志。我们先后在《新华日报》采访部、张家花园《国讯》编辑部俞颂华先生处、归元寺《大刚报》驻渝办事处，多次长谈。他诚恳热情，肝胆相照，既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又不强加于人，使人从内心深处愿意亲近他。

最使我难忘的是，8月28日中午，毛主席即将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的前几个小时，他乘坐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吉普车，突然来到归元寺我的住处。那天山城特别炎热，我正在挥汗吃午饭。西民同志带来好消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由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陪同，马上就要到达重庆。我与《大刚报》驻渝记者李凌飞，立即放下饭碗，跟着西民跳上吉普车。接着，他又去接了郭沫若夫妇和《大公报》记者彭子冈、《新民报》记者浦熙修，直驶九龙坡飞机场。



这是一个举世关心的重大政治新闻。我初到重庆，人地生疏，李凌飞虽然驻在重庆，也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因此在开展采访活动时，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只好求助于西民。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在候机室内，先后请各党派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勱等发表谈话。在场的国民党人士，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和邵力子。周至柔全身戎装，高傲得很，我们不愿找他，想去找闭目养神的邵力子谈谈。当我们也想请西民作介绍时，他为难地摆摆手。我们立即意识到，西民同志是《新华日报》采访主任，公开的共产党员，如今国共谈判，他怎么好为我们向国民党要员作介绍呢？我们笑了笑，表示完全理解，就鼓起勇气，拿着名片，自我介绍，请邵老谈话。这是我记者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采访活动。没有西民同志提供信息和交通工具，我是不可能得到这个机会的；在现场，没有西民同志的介绍、指引，我也不可能在短短时间内访问各方面代表人物，使这次采访报道获得成功。

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西民同志总是竭尽全力给予支持。我要从重庆去武汉，最便当莫过于坐飞机，但是民航未通，军用飞机载的尽是“劫收”大员，我们这些人只好望空兴叹。于是，就乘船东下，但是，又传说宜昌以下，江中布有水雷，轮船开不到武汉，须经过新四军五师的防地——洪湖地区。西民得知情况后，立即请钱之光同志为我们开了一张路证，盖上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大印和主任钱之光的私章。当我们在宜昌下船登陆，改乘木船经过洪湖地区时，一路开绿灯，终于顺利到达汉口。和我们同路的一位武汉商人，看着我们处处得到方便，他也一路沾光，感激地说：“你们真有办法！”对于西民同志的帮助，当时我只能秘而不宣。直到武汉解放以后，1949年



11月9日，汉口《大刚报》庆祝创刊四周年时，我才在会上公开了这个秘密。

“我们很快会回来的”

和西民同志再次相见，是1946年5月在南京，当时他正日夜奔波，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南京版。

八年抗战，国民党当局视《新华日报》如眼中钉，时时欲除之而后快，所以，还都南京后，下决心不让《新华日报》在他们的首都出版，百般进行刁难。

办报，首先得有房子。5月，我从武汉到南京，是在鼓楼南面现在的中山路百货商店那栋两层铺面楼房中见到西民的。我只知道这栋房子得来不易，却不知其中奥妙。南京解放以后，我们在一次闲谈时，他讲到购买这栋房子的故事，颇为有趣。他是4月份到南京的，每找到一处房子，已经谈妥，就要成交，房主忽然变卦。原来他们到哪里，特务就跟踪前往进行破坏。最后，只得先由一位地下党同志购得中山路这栋房子，然后“卖”给新华日报社。为了使这笔交易合法化，西民同志还特请南京颇有名气的大律师傅况麟作公证。共产党的房子“卖”给共产党，律师只是在合约上签个名，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广告，就得到一根金条，还在六华春吃了一席美味佳肴。西民同志回忆这件事，自己也感到颇为好笑。

为了向国民党南京市政府申请出版登记证，西民同志多次去找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交涉。这位市长先生，既不敢准予登记，又不便公然拒绝，而是一拖再拖。到了10月份，人员、设备均已齐全，可谓万事俱备，并且已经试刊，但是，国民党政府始



终没有发给登记证。由于出报无望，在中共代表团撤退以前，西民就随周恩来同志先行飞返延安了。

西民离宁前，特地乘代表团汽车，提了一个大提包，到南京大刚报社，走进我的办公室，要求刊登广告，实际是向我告别。他拿出一包法币，作为广告费，我说“不必，不必！”我那时是报社经理，刊登免费广告，是常有的事。可是，西民同志摇摇手，轻声说：“不好，不好！”意思是怕给我带来麻烦。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走到楼梯口，见四下无人，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多多保重，我们很快会回来的！”

创办新闻训练班

仅仅相隔两年多时间，1949年4月23日，南京宣告解放，没有过几天，西民同志果然回来了。他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接管了中央日报社。1937年、1946年，党两次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都没有办成，现在终于在人民取得政权后，顺利出版了。

南京解放后，西民同志先后要我介绍几位同志到报社工作，但我自己却没有主动提出到党报工作的事。于是，他就要在市委统战部临时协助工作的刘尊棋向我转告，大意是，如今革命胜利了，大家都成为国家的主人，为何自己不主动要求分配工作，是不是要三顾茅庐才肯出来呢？我听了这番话，很不好意思，第二天就到报社找西民同志，提出要求。他表示欢迎，并立即分配我协助采通部主任李力众筹备新华日报与新华通讯社南京分社合办新闻工作人员训练班。一名非党员，穿西装，吃中灶，成为报社内部的一件新闻。



办新闻训练班，主要是为解放大西南准备新闻干部。学员入学后，听说要随军去云、贵、川，不少人思想动摇。有一位学员，不辞而别，开了小差。当时，经过班部讨论，认为此风不可长，就由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林采在大会上宣布将这位学员开除。西民同志兼班主任，听到反映，立即把林采和我找到报社，要我们就此事经过向他汇报。西民同志平常是那样平易近人，这时，脸色沉重，严厉批评我们：“是谁给你们的权力，不经请示就把学生开除！”“你们有没有想一想，这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这个学生今后怎么办！”经过社委会讨论，取消了开除的决定，由我们登门把学生找回来，让他继续学习，并向他明白宣布，既然不愿去西南，不必勉强，可以考虑在南京分配工作。后来，这个同学通过学习，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不对头，自己动手编了一出活报剧，现身说法，在晚会上演出，使同学们都受到深刻教育。两个月学习结束，绝大多数同学志愿报名进军西南。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成为云、贵、川省市一级新闻宣传单位的骨干。从这件事中，使我懂得：对人的处理，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思想上的弯子一时转不过来，要耐心教育，善于等待。

谈到对人的处理问题，我还有自己的亲身体会。

我送走了去西南的学生，回到报社，西民同志没有立即给我分配工作，而是要我等等。半个月后，他通知我，到报社资料室担任研究员（另外还有两名研究员，一位是夏晨中同志，还有一位是曾任河南地下省委领导工作的赵更生同志）。为什么要等半个月？我感到发生了什么问题，但西民却不动声色。直到两年多前，他到南京来时，才在一次闲谈中，讲到事情的原委。原来当时市委接到一封人民来信，揭发我有政治问题，西



民同志是了解我的，他根本不相信；但是他赞成组织部门找检举的人谈话。原来是我没有替这两个人介绍工作，因而心怀不满，写了诬告信。西民病逝后，我写给吴伟同志的唁函中说：“西民同志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就是指这件事而言的。

更使我感念的是，在三反运动对我的审查中，西民同志所持的态度。从1949年12月起，我担任新华日报经理。1951年底，三反运动开始了，我成为被怀疑的对象。经理部有十几位同志被当成了“老虎”，圈了起来。对我这个长期与党有联系的党外人士怎么办？西民同志根据过去的交往，深信我不会营私舞弊，但在群众运动中，多数人并不了解，只好宣布“停职反省”。我每天在自己房间内自我反省，实则“闭门读书”。当时，恰是毛选一、二、三卷发行，我反复读了多遍，还写了笔记，并试用矛盾论，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具体分析，也算是自我反省吧。1952年4月30日，雨过天晴，在公告栏上贴出了恢复经理职务的通知。这一天，恰是南京新华日报创办三周年，为了庆祝报纸的生日，报社全体同志中午会餐。西民同志环视饭厅，看不见我，立即派人到我家中去找。他把我拉在身边的位子上坐下来，亲切地说：“参加革命，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审查，审查清楚了，更会得到组织上的信任。不打不相识嘛，千万不要背包袱！”杨永直同志也讲到自己在延安整风受审查的经过，他幽默地说：“这次对你的审查，可以说是洗个温水澡，要文明得多啊！”

正是由于经过这次审查，使我受到锻炼。10年浩劫中，我被当作“头号牛鬼蛇神”来批斗，有些好心的同志担心我想不开，去自杀，然而，我终于挺过来了。饮水思源，与西民等同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任命非党同志为党报经理

西民同志在用人问题上，我也有些亲身体会。

1949年12月，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已经排上议事日程。怎样搞好经营管理？老区来的同志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这样，他就想起我这个备而未用的“研究员”。因为解放前，我先后担任过一些报社的经理，还曾创办过汉口《大刚报》和南京《联合晚报》。西民同志征求我的意见后，报经市委批准，任命我为南京新华日报经理。

任用—一个非党同志担任省市一级党报经理，在全国虽然不能说是“唯一”，但也是少见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是摆摆样子，还是有职有权？当时报社的副经理和工厂厂长、绝大多数科长都是共产党员，有的还是来自延安的老八路，他们听不听指挥？为此，西民同志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我大胆负责；—方面又对党内同志打招呼，要学会与党外同志共事。由于领导关心帮助，党内外同志全力支持，艰苦创业，南京《新华日报》在全国省市级报纸中较快地实现了“自给自足”，不仅不要国家财政拨款，而且还有盈余上交国库，受到了政务院新闻总署的通报表扬。

作为领导人，他既放手让你独立思考，大胆负责去工作，又不时给予具体指点。我接任经理不久，西民同志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晋冀察，他认识一位后勤部长。这位同志的一个战友，从内蒙带来一件皮大衣送给他，但在他任职期间，始终没有拿出来穿，因为大家眼睛都盯着后勤部长，是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搞特殊化。尽管东西来路正，但人多口杂，容易造成误



解,直到这位部长改任别的工作,才把皮大衣穿上身。经理是管家人,要时时把同志们的疾苦放在心上。特别是对夜班同志,他们通宵工作,很辛苦,更要多关心。他关照我们,分给夜班同志的宿舍,要安排在较安静的地方,卧室要挂上黑布窗帘,让他们能够很好休息。要办好食堂,对夜班伙食更要注意,除按供给标准开支外,再适当增加些补贴。当时从事夜班工作的同志,对免费供应的一顿夜餐,是比较满意的。西民同志想得多周到啊!

“中年是危险年龄”

西民同志待人诚恳宽厚,重感情。在工作上,我们是上下级;在私人关系上,我们是朋友。1950年春节,我的爱人和孩子在湖南尚未调来,成为临时“单身汉”,另一个长期单身汉毕群同志,是西民同志重庆时代的老朋友。除夕之夜,他把我们两人约到祠堂巷家中,一张小桌,摆上咸肉、咸鱼之类,水酒一杯,边吃边谈,海阔天空,论古道今,使我们毫无孤单之感,愉快地辞旧岁迎来新的一年。

1954年,他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仍念念不忘老朋友。他写了一封情文并茂的信给我们大家。我记得信中有这样一句富有人生哲理的话:“中年是危险年龄”。人的一生,进入成年后,一般分为青年、中年、老年三大段。为何中年“危险”呢?我思考了很久,感到这既是鼓励,又是劝勉。鼓励继续奋进,且莫安于现状;勉励谦虚谨慎,不要目空一切。人在青年时期,跌了跤,只要爬起来,还有时间奋起直追;人到中年,转眼就是老之将至,如果有重大失误,欲补救就时不我待了。我在回信中,谈



了这点体会。大概是只可意会，难于言传吧，他一直没有表态。但是，他的这句赠言，却成为我的座右铭，时时记在心中。

西民同志“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走了。但是，在他最后给我的信中，讲到“梦想中的苏北之行”，未能实现，这不能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中国之大，花花世界，可看的地方太多了，他为什么偏要梦想去苏北一行呢？大概因为那里是周总理的故乡，他对周总理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担任江苏省委常委，深知苏北是穷困之区，如今旧貌换了新颜，他多么想亲眼看看，好向马克思、周总理作汇报吧！

1987年12月10日

（原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
分会通讯第9期，1988年3月出版）



既是领导又是友人的石西民

夏晨中

1949年南京解放后，石西民同志来南京任《新华日报》社长、南京市委宣传部长。当时他同南京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文化界、教育界的学者专家们广泛接触。一些高等学校、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常把关于教育、研究计划和一些学术文稿送宣传部审阅，西民同志总是亲自认真阅读。他有渊博的知识，同那些学者专家交谈时，既坦率提出自己的观点，又认真听取对方的意见，互相研究探讨。当时我曾听文教界的朋友说，石部长既是懂行的领导，又是待人以诚的同事、朋友。

石西民离开南京到上海工作后，有一次在江苏省政协的小组会上，我曾听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说，解放后我把博物院的工作计划和文史研究方面的文章送给市委宣传部审阅时，石部长同我谈话，他从不把我当客人，当外人，而是同志和朋友式的交谈。他有渊博的知识，对一些问题坦率地谈他的观点意见，也要我坦率地谈意见共同探讨，偶尔也谈谈生活。他作风诚恳、坦率、自然，找他请示工作既受教益又心情舒畅。曾昭燏说，自从石部长调走后，再去宣传部听取对工作计划或文稿的指示时，往往只听到几句客套话，没有什么具体意见，感到生疏隔膜。就更想念石西民亲切自然的作风。

曾昭燏是文史知识渊博、自视颇高的女学人。她在座谈会



上谈了对石西民同志的观感后，在座的人都表示深有同感。

石西民同志领导南京《新华日报》时，非常关注时事宣传。《新华日报》每周发一期国际问题专栏。西民同志当时主持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南京分会的工作，常邀请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开会，座谈国际形势。会上，石西民同志传达阐述了党的方针政策，还亲自约请潘菽、史国纲、朱偁等学者撰写国际问题的文章在《新华日报》专栏发表。

石西民同志还在编辑部出题目做文章。1950年7月，我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剖析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文章。当时党的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曾全文予以转载，《东北日报》编辑部的“编者按”说：关于国际形势的问题已在报纸上讨论几个月了，现转载南京《新华日报》这篇文章作为结论。其他有些省报和刊物也转载了此文。这篇文章就是由石西民出题目，在他的具体帮助下由我执笔的。

1949年我到《新华日报》工作不久，有一天石西民对我说：军事胜利了，南京解放了，大家都高兴。现在有些干部从乡村进入城市，看到城市的生活优裕，很容易忘记农民对战争的艰苦支援，忘记农村还处于贫困之中。要写一篇向农民学习不畏艰苦为革命服务的文章。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却颇费踌躇，因为我虽然生长在农村，对农村的生活有些了解，但对于农民支援解放战争的情况不了解。好在资料室有从解放区带来的《雪枫报》、《淮海报》等报纸，上面有不少农民出粮出力支援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感人消息。看了这些报道自己也受到教育，终于给报纸写了一篇专文。

西民同志过去长期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工作。现在进了城，仍关心农民的生活贫困，怀念农民对革命战争的伟



大贡献,这样的思想感情是十分感人的。去年看了他的文集《时代鸿爪》,第一篇是1934年写的《亢旱后的浦江农民生活》。这说明他在大城市上海仍时时关注农民的生活。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毕生从事革命工作,一直企望的是革命胜利后建成一个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

* * * *

大约是1962年或1963年,我到上海复旦大学了解新闻系的教学经验。西民同志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负责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领导工作。我到市委去看望他。他知道我到上海的意图后,当即打电话给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并写了一封信给我带去。

几年没见面,我向他汇报了别后情况,他也同我谈了一些事。他谈到上海市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源地,现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改造了。原来的那些资本家、工商业经营者对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历史情况是熟悉的,他们还有工商业经营管理的经验和对外贸易的经验。现在这些人闲下来了。西民主张设立一个机构,把一些人收罗起来,安排他们写上海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把买办资本、民族资本都写出来,同时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工商业经营管理问题。这对于我们发展经济有借鉴作用,也使这些人思想、精神有所寄托。

他又谈到,解放后全国进行了土地改革,现在已过去10年了。他主张设立一个研究机构,收集华东地区土地改革的资料,写出土地革命史。但这些主张都没有得到领导人同意,不少应当办的事办不起来。言下不胜感慨。

回想起来,石西民同志当时主张写经济发展史、社会变革史的时候,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造成国家严重



困难时期。他当时想做的这些事不仅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而且是关系到要不要接受历史经验教训的大问题。没有想到那以后又出现了10年动乱，国家受到更大的损害。直到事隔近20年，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工作重心才真正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国家的面貌才有了根本改变。回想石西民同志那时的思想、主张，确实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原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
分会通讯第9期，1988年3月出版）



怀念我的启蒙老师石西民

李 廉

我第一次见到石西民同志，是在南京解放后的第三天。他奉党中央之命，急匆匆从北京来南京创办《新华日报》。一路辛劳，到南京后，又马不停蹄地为报纸创刊忙碌。《新华日报》在南京解放后的第六天出版了，然而，西民同志却病倒了。我与报社的几位同志到广州路他下榻的地方去看望他。可是，当我们登上二楼，踏进他的卧室时，只见四壁空空，地板上重叠地铺着两条灰旧军毯，这就是《新华日报》社长的病榻，旁边连个热水瓶也没有。病人不在，不知又到何处忙工作去了。

从我参加南京《新华日报》工作的第一天开始，西民同志和报社的其他负责同志对我的教育培养也就开始了。“课程”是全面的，从新闻业务到马克思主义原理；从采访、编辑到整理资料、写评论；从培训通讯员到作时事报告；从团结同志到自律作人，等等。西民同志真是一位博学多才而又循循善诱、以身作则的好教师。

我原是旧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又在国民党的中央党报《中央日报》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近两年。对如何作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是开始“描红”的小学生。西民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针对我的特殊情况，在短短的几年中，把我培



养锻炼成一个能独立工作的党报工作者。

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第一课，是从我写的一则新闻特写开始的。1949年5月23日，原南京中央大学和其他大专学校的学生一万五千多人，在中央大学操场举行“五二〇”纪念晚会，我被报社派去采访，写了一则特写《纵情的歌唱》，于5月25日见报。由于我的无知，报道中违反了党的纪律。当时，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还没有公开，不许公开报道某某是中共党员。然而我却在特写中指名：“晚会主席是中大学生朱成学。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天，西民同志把我叫去，给我讲了一个无产阶级新闻报道的原则。原话我已记不完整，大意是：见报的必须真实，但真实的不一定见报；一切以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为取舍标准，这是个立场问题。接着，西民同志将新华社内部印刷的一本小册子给我，其中都是党中央负责同志关于新闻出版工作的指示。从此，我才开始注意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立场、观点、方法。

西民同志教我如何正确编写新闻资料。那是1949年9月初，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西民同志要我配合纪念消息，写一篇新闻资料，其中包括中国人民抗日、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无条件投降等等。由于我长期在白区生活，无形中受到资产阶级报刊的影响，跟着它们将日本投降的直接原因，说成是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威力巨大的原子弹。西民同志亲自审稿，看到此处，笑着对我说：你上了美国宣传的当。日本投降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领导的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胜利，直接原因是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日军如卷席。日本天皇眼看大势已去，妄图迁都东北对抗盟军的梦想破灭，又怕红军解放日



本本土，才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又是意义深长的一课。同样的事实，什么是现象，什么是本质；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不能正确认识复杂的社会问题的。西民同志指出我写历史资料中的错误，对我震动很大，使我不能不反躬自省，检查我在政治理论方面的知识，开始警惕起来，认真检查自己长期在白区所受熏染的错误认识。

为了将老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文化生活介绍给南京读者，同时也为了扩大眼界，增长我对新社会各方面的感性认识，西民同志派我代表《新华日报》，参加《大连工展会南京参观团》，作为团员到东北老解放区去作旅行采访。临行前，西民同志谆谆嘱咐我到大连后，要好好向在那里从事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华山和人民日报记者田流等同志学习。

从南京登上去东北的专车，轮渡过了长江，所见所闻，对我都是新鲜的，我相信对于南京的广大读者也会是新鲜的。所以每到一处，必有通讯；每遇新主题，必有报道。从大连到哈尔滨，从长春、永吉、沈阳、鞍山、抚顺，到天津、北京，历时两个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通讯近20篇。西民同志可以说是篇篇关心。初时，通讯的发表，只以我个人的名义，后来，据说是西民同志提议在我的名字上冠以“本报记者”四字。我知道，西民同志期望我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党报记者。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约我将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关于东北的通讯，整理成册，以《东北访问记》的书名出版（1950年6月），并邀请西民同志为这本小册子写序。西民同志在百忙之中，审阅数万字的书稿，写了令我十分感动的序言。其中说：这些报道“记录了不少动人的，由东北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生



产奇迹和克服困难的丰富经验，也动人地报道了苏联友人的热忱帮助和运用苏联先进经验的事实”。还特别指出：“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东北劳动人民在恢复与发展生产的重大任务上，已创造了辉煌的成绩，这一成绩，便是我们新中国经济建设一定胜利的有力的证明。”现在看来，西民同志当时的推断，都为新中国的伟大实践所应验了。

党报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国内国际的现实作分析与说明；一个新创办的党报，需要尽快培养这方面的工作人员。西民同志就将资料室的同志作为培养理论人才的一个点，特意调来两位经验丰富的老报人担任研究员，撰写理论文章和时事评论。当时，我兼任资料室主任，也深深体会到西民同志深谋远虑，积极培养理论工作者的部署。由于我懂点英文，西民同志就从安排我翻译苏联《新时代》（英文版）的论文和评论入手，在短短的八九两个月中，就翻译了四篇论文和时评。从1950年开始，西民同志经常为我出题目，要我学写评论文章。1950年5月发表的《中国目前的社会性质》，便是我的理论文章处女作。随后，西民同志和杨永直同志又亲自指导我写国际评论，从1950年5月到1951年9月，仅我手头现存的剪报，就有30多篇。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发动侵朝战争后，报纸上的时事宣传便上升到重要地位，编辑部决定我作为杨永直同志的助手，创办《时事问题》周刊。同时，许多机关、学校以及广播电台邀请西民、永直同志去作时事报告，有时他们忙，就派我去。对于我应讲什么，如何讲，都一一给予指示。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以后，其势汹汹，向朝鲜北部侵犯，北朝鲜战局十



分危急，国人对此极为关注。金陵大学的教师来报社邀请派人去作关于朝鲜战局的报告。那时，中国的军事动向还是绝密的。报社领导派我去作报告，临行前西民同志关照我，“可以告诉金陵大学的老师们，中国对于美国侵朝战争，不会坐视不管！”当我向听众说明这一点时，立即引起热烈的掌声。几天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了！

1950年，西民同志出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以后，南京市的反帝爱国和民主改革运动广泛展开，各区的群众宣传教育任务加重，需要调人充实基层宣传战线；而我又学生出身，缺少群众工作锻炼。市委宣传部调我到南京第三区委（夫子庙地区）担任宣传部副部长。这时社会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如禁毒运动，反动党团登记，反动会道门登记，爱国卫生运动，等等。在这些运动中，西民同志倡导的居民宣传员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他很重视，有时在夜晚，只带一个工作人员，到城南“老南京”居住的深巷小院，听居民宣传员向市民宣传党的政策。他嘱咐我总结居民宣传员工作。为此，我曾将一年的工作经验写成一本小册子，系统地向中央宣传部派来考察的一位负责同志作过汇报。这位同志称赞西民同志领导下的群众宣传工作深入、系统、经常、细致。

南京、苏南、苏北并为江苏省以后，西民同志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53年夏天，我被调到省委宣传部。报到以后，西民同志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如何对待名利地位。记得在新华日报社工作期间，西民曾批评我“个人得失观念太重”。这一次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调你到省委宣传部来，



可没有处长给你当！有四个工作可供你选择：到新闻出版处接替白沙同志的工作（副处长），在宣传部报刊处、宣传处、文艺处担任指导员。”西民同志的开诚布公精神和原则性，使我铭记在心。

不久，农村开展了统购统销和互助合作运动。中央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农村宣传调查组到江苏蹲点。组长是西民同志，副组长是中央宣传部的陈笑雨（马铁丁）和镇江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西光。西民同志要我随他到武进县去蹲点。我和地区的一位男同志、中央宣传部的一位女同志蹲在万塔乡。一个宣传部署下来，我们便从省到地、到县、到区、直到乡，全面掌握宣传活动情况。那是大冬天，一蹲就是三个月。我们在乡里参加各种会议和农民的活动，有时还随着渔民到太湖上去打鱼，懂得了天越冷打的鱼就越多。使我体验到农村生活之艰苦，农村工作之不易，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之必要，党的总路线在农村之深入人心，因而还给《新华日报》写了一篇通讯《总路线照亮万塔乡》。还有一件事看来虽小，但对我很有启发。在武进县蹲点过程中，西民同志要我写一份向中央宣传部的汇报材料，我按指示的要点写出来了，站在西民同志工作的桌子旁边看他修改。突然他将稿子推在我的面前，要我看他改的一个字：“即”改为“及”。我的神经立即为之震动，为什么粗心大意到此地步？转而一想，这并不偶然，除了作风以外，同我的文化底子不够坚实也有关。虽然西民同志没有批评，却比打我十“戒尺”还使我记得牢：工作要认真，文化要提高。

不久，西民同志被调到中央宣传部任副秘书长。从此，我直接受西民同志教诲的机会就少了。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我



曾因公赴沪，去看望他几次。他了解我的处境、遭遇和心情，每次见面总是意味深长地要我“相信党，相信群众，安心工作”，有时还诙谐地说一句“皇天不负苦心人”以示勉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同西民同志的接触增多。每逢我去北京或北方参加学术会议，总要约一二好友，去看望西民夫妇。80年代初期，他同吴伟同志也几次来南京，与老朋友、老同志聚会。相见之下，大家好像比“文革”浩劫前更为知心，更感亲切了。

1986年10月，我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有意多留一天，约王明远同志一同去看望西民同志。得知他的病情已经很重，正在清理自己的一项“财富”——图书，准备送给家乡的图书馆，同时也在写回忆录。西民同志虽已穿上丝棉袄，但精神还很矍铄，我特地请他和我们在向阳的楼前花坛拍了两张彩色照片。当时，我估计这很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一次合影了，特别请为我们拍照的同志将篱笆上的一串美丽的紫牵牛花和金黄的菊花、丝瓜拍入镜头，以增添聚会的喜气。言谈间，他很关心在南京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说明由于他未能及时给一些同志作应有的证明，致使这些同志在“文革”期间受到委屈。还特别要我转告毕群同志，解放后他到《南京人报》工作，是共产党派去的，如果组织上要他证明，请给他发正式公函，他会证明的。临别前，西民同志还将他刚出版的《时代鸿爪》，签名赠我。

在西民同志与病魔又搏斗了一年之后，我于1987年8月中旬又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因为西民同志夫妇一向关心我的老伴汪兰同志的成长，所以这一次特别带着老伴一同前往。可是，西民同志已住进协和医院，不时得靠输氧维持。在这



种情况下，我深怕老伴看到老首长时会激动流泪，这会干扰西民同志的心境。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不到医院去了，请牛玉华同志将我带的碧螺春转上，就说我们要赶火车，时间不许可到医院来，下次再来北京一定看望他，请他多多保重。其实，我不愿在我的脑海里留下西民同志卧在病榻上的形象。

现在永远映现在我心目中的，是精神矍铄，满面笑容，站在金黄的菊花和丝瓜架前，有成串紫红色牵牛花挂在身旁篱笆上的西民同志的留影。

1990年清明节前夕于南京

（原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
分会通讯第16期，1990年12月出版）



春风化雨

艾 焯

1949年夏天我接手主编《新华日报》副刊时，石西民同志没有正式跟我谈过工作问题。但他有时在夜班时间转到我的办公室来，问问副刊情况。也讲讲他对副刊版面处理，或某篇文章的意见。有时又讲讲办副刊的方针、方法。讲得极为随便。

编副刊我是新手。他随随便便地讲，我不敢随随便便地听。他是令人崇敬的老新闻工作者，学识、经验丰富，可以向他学的东西很多。他谈起业务问题，并不用理论家惯用的那些惊人的词汇，简直像谈家常。开头我抓不准要点，后来慢慢明白了，他的谈话，不像常见到的领导指示那么庄严。像是朋友谈天，也许更像老师的课外辅导，所以要细心点听，才能辨出味来。

他说，副刊要办得生动活泼，群众喜欢看。这都是些老生常谈，似乎没有什么新意。但真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因为时代在变，读者口味也在常变。编辑要善于及时抓住这些变化。

那时南京还没有专业的科学技术报刊，他说，要尽可能使科技知识通俗化。副刊室要办好这方面的专刊。

当时副刊室有文字编辑三人，美术编辑一人，通联一人，连我共计六人。每天出副刊一整版，广告多了就出半版或大半



版。每周还要再编几个专版：科学、文艺、卫生，等等。这几个专版，是运用社会力量合编的。当时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央研究院各个研究所，集中了相当多的学者。专版上要请一些有学问的先生写通俗的文章，这不容易。

西民对这些学者了解得很细，那是他在重庆时打下的工作基础。他也向我讲讲这些先生们各不相同的性格。要我在和他们交往中，学识上，要虚心求教，人格上，要尊重他们。除非纯事务性的事，一般不要靠打电话解决问题。稿件需要商量研究的，不要假手编辑，你这个主编要登门向人家当面请教。南京城就这么点大，要多登门拜访。我当时年纪轻，20多岁的人，骑个自行车城南跑到城北，也确实很便当。

编辑做久了，有个职业习惯，看稿时，遇到不顺眼的地方，往往随手大笔一挥，一砍。西民说，学者们做学问，写文章，都是很认真的，一丝不苟。不要随随便便改动人家的稿子。即使要改，也要提出意见后，让他本人自己改，或者用铅笔改在旁边，再征求作者意见，同意则存，不同意就用橡皮擦去。

有一次，我说到在一位科学家的书房里，我们谈得很开心，谈了两个多小时。西民很细心，关照我，和科学家们谈话时间不宜过长，研究学问的人，时间是很宝贵的。

西民自己的语言修养很好，对记者的语言运用也就特别敏感。有一次，我在北京参加新闻总署的一个会议。乔木在讲话中引用了一个典故。这典中有个单字词，我没有听懂。当时没有录音机，为了不耽误速记，这个单字词，只好随手打个圈圈，准备会后再去向乔木请教。会后又忘了去问。隔两天回到南京，照笔记本传达时，这才发现那个该问的单字词，还是个圈圈，空白。我想打个马虎眼，一带而过。西民觉察了，追问我



是什么词,怎么写。我无以应对,很窘。他笑笑说,哦,秀才不好当,记者也跟秀才一样,怕考官。一句笑话,空气立刻轻松了。这种轻松的批评,有时比严厉的批评更厉害,让你过后自悔自愧,会记住一辈子的。

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学问的修养上,记者不可能是个专家,但应该是个博士,博学之士。只有在语言的修养上,记者恐怕应该达到专家的水平。否则的话,语汇贫乏,语意干瘪无味,天天讲套话,空话,读者是会感到乏味的。也不能很好的达到宣传效果。

南京《新华日报》初创时,是个各路诸侯大融合的班子。人员来自各式各样的社会环境。有从中央来的,有解放军二野、三野的,有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好几块解放区来的,有南京地下党的,有国民党区域报纸的从业人员。这么复杂的干部构成,这么许多互不了解的人聚到一起,竟能团结一致,目标明确,同心同德把报纸办好。以西民为首的几位领导人,把这么复杂的群体,团聚在一起,这里面有什么经验,有什么学问,这远远不是我能讲得清的。我只讲一讲与此有关的事。

50年代初,西民曾举行过一次少见的宴会。

有几位同志历史上有些问题,但解放时他们没有跑走,留下来了,这是对共产党的信任。但这几位又不宜留在报社工作。临调出时,西民和他们谈过话,对他们新的工作岗位,都做了妥善安排。有一位不想到分配给他的地方去,又很快作了调整,尊重他们的合理要求。不像后来搞政治运动那样,动不动就搞惩罚性的下放劳动。这几位临调出时,西民还为他们举行过一次送别宴会。50年代初,宴请的事是极少的,所以举行这次送别宴,就更加不容易了。



1949年冬，派我去北京采访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总编辑杨水直向我交待任务后说，他和西民同志商量，给我配一名译电员，要我多发稿，发快稿。领导对记者的工作条件设想得如此周到，我不好偷懒。每天总是在会场上一面听，一面写稿。中午或晚上休会时，初稿已写好。回到住处，一边修改，一边交译电员译稿。后来派我到北京建立新华日报驻京办事处时，西民听说我用的那支缴自日本军队的自来水笔坏了，采访用铅笔。那时供给制，生活不愁，但买支钢笔也不容易。在我临行前，特地关照经理部，买了一支新民笔送给我。为记者创造工作条件，竟设想得这么细密周到。

后来西民离开报社，专任宣传部长。他找牛玉华和我分别谈话，要我担任某一处处长。我说，我不适合。这位厚道的长者，把我的遁词当成了谦词。说，你愿意到另外一个处也可以。我不敢隐瞒真实的想法，直截了当陈述了我的意见：我不愿当官，也不善当官，只想当个文字匠，胸无大志，雕虫小技。希望能让我去搞搞文学创作。

他笑了笑，没再说什么。既没有劝导，也没有批评。回来后心中很感不安，在这位长者面前，讲话太欠分寸。事后不久，有位领导人和西民谈到此事时曾说，艾煊不服从组织分配，应该批评。西民说，算了，艾煊就是这样块料。

此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不光是因为西民宽宥了我，迁就了我。从此事中，我明白了另外一点。作为领导人，西民不但考虑到干部的优点，缺点，长处，短处，而且还考虑到干部的个性特点。

这事也并未结束。西民临离开南京前夕，又提出要我去宣传部工作的事。他要我不慌表态，想想再说。过了一段时日，



俞铭璜正式找我谈话,提到了西民以前说过的话。我不敢再违命,老老实实去了宣传部。这已是西民头一次和我谈话以后两三年的事了。西民同志耐心教育干部的态度很使我感动。

西民调离江苏以后,在宣传部的一次会上,一位部的领导人,曾当众公开检讨,说对西民同志这样一位宽厚的领导人,态度不好,尊重不够,很不应该。西民已走了,但他还不忘记检讨自己的缺点。我当时心中想,我也应该检讨。但这个会不是我检讨的地方,惟有心中愧悔而已。

一个谦和的人对人的影响,表面看,不明显,不强烈。但就像春天的微微细雨,更能慢慢地渗透进地下的深层。

西民是学者、长者。肚子里容得下种种古今学问,也容得下种种性格不同的人。

(原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
分会通讯第18期,1989年6月20日出版)



教诲·友情·思念

——纪念石西民同志

牛玉华

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在记忆中渐渐模糊了。然而也有例外的情况,对于某些人和事,时间越久,记忆越深刻。我对石西民同志的思念,大概就是这样。他早已离我们而去,但他那朴实无华、平易谦和的风度,和诲人不倦的音容笑貌,总是那样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脑际。

我在西民同志直接间接的领导下,前后达10年之久,离休后又经常见面。回忆他对我的谆谆教诲,我们之间的革命友情,时时在思念之中。

(一)

我是1949年的初秋在南京认识石西民同志的。这年3月,他在刚解放不久的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去见范长江同志时,恰巧我也在场,应该说从那时候我们就见面了!但他为了工作直接和我谈话,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南京城呈现着一片喜气洋洋的时刻。一个刚从山东老革命根据地沂蒙山区来到大城市工作的女同志,一方面兴致勃勃,一方面又



觉得不熟悉,也很不习惯。去《新华日报》工作之前,心中还有些顾虑。但见到石西民同志,看到他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色军装,左臂上戴着蓝底白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的袖章,军帽下露出几缕乌油油的短发,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他是一位文质彬彬的人。

西民同志和我谈话的时候,没有任何客套,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我们工作的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啦,办报,总的方针不会变,但有些方面也和解放区有所区别。”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指着编辑部左边的“龙门酒家”说:“你看,我们就在这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中工作。”“龙门酒家”舞厅前面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映入我的眼帘,吹吹打打的靡靡之音,刺激我的耳鼓,在这样的环境下编报,的确不太习惯。西民同志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要改造环境,首先要适应环境,我们能在敌人虎视眈眈的地下编报,能在枪林弹雨的山头上编报,就不能在这点小小的干扰下编报吗?不过,要精力特别集中才行。”

好在那时我已学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暗暗地想,从头开始学着干吧!反正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西民同志接着说:“我们研究,要你主持编辑地方新闻版,这一版虽然没有特别重大的消息,但要办出地方特色,内容的品种要多一些,版面也要活泼一些,办好这个版面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除了你任主编之外,还有两个助理编辑。试试看怎么样?”我点点头,思量着“试试看”的话。

地方版的确很不好编,有些稿子要等到晚上10点多钟才拿到手,大样送到西民同志那里审阅的时候,常常已是午夜。稿子虽然经过编辑部主任初审,但一到了他那里,往往还要提出一些问题,修改一些词句,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搞不



好还得另换稿件。每次送审稿件之后，我只好坐在电话机前等他的指示，盼到他说一声“可以开印了！”才放心大胆回到宿舍。有时刚刚躺下，红彤彤的朝霞已映上东面的窗子，地下室印报房咔嚓咔嚓的印报声，敲打着我的耳鼓，怎么也难以入睡。

(二)

1950年6月的一天，西民同志打电话要我晚饭后到他家里去一下，我以为工作上出了什么差错，下班后匆匆忙忙吃了几口饭，就按着他说的门牌号码，通过几条小马路，来到琅琊路他的家里。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仅仅放着一张写字台和一只大靠背椅，旁边是几把普通椅子，落地台灯的灯罩很大，屋里显得比较昏暗，他写字台的桌面上凝聚的光却特别明亮。他招招手让我坐在一张普通椅子上，自己非常习惯地坐在那张可以左右转动的大靠背椅上。那时他已是市委宣传部部长，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准备调你到宣传部教育科工作，看你还有什么意见。”我习惯地回答他说：“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西民同志简单地谈了部里的一些情况，以急迫的话音叮嘱我：“那你明天就到报社交待一下工作，到部里去报到。”

市委宣传部长开始住在AB大楼办公，那是当时南京城一二流的大洋房。部里从解放区来的同志比较少，地下党员和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占相当大的数量。我去了不久，科就改为处的建制，很快又将秘书处改建为办公室，不久我又调到办公室负责，究竟怎样作好办公室的工作，确实是瞎子摸象，一点也摸不着边沿。我还是抱着“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的老想法，



对待面临着的新的工作任务。好在西民同志曾简要地对我说过，办公室是承上启下的纽带，也是综合协调各方面关系，处理好文书档案材料的重要部门，既不能埋在具体琐碎的事务堆里，对任何问题也不能有丝毫的马虎。不论他叮嘱得怎么仔细，实行起来，却并不是那么容易。

记得那时找西民同志的人很多，有下属各单位的负责人，也有一些文人学者来访问，只要他一到办公室，人们便接踵而至，常常遇到“撞车”的情况。有一次石西民同志对我说：“找我的人太多，你们办公室应该分轻重主次安排一下，那么多人一齐拥到我的办公室，我那里不成了骡马大市啦！”话音刚落，他觉得用词不当，笑着补充了一句：“我的说法不妥，主要是请你们帮着做些接待工作，一拥而来是什么话也谈不好，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从他的话里，我觉得增长了一些知识，也自愧工作没做好。便在他办公室的旁边安排了一个房间，有些来客我们代他接待了，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的一般问题，我们也帮他处理了。当自认为工作比较得心应手的时候，有时就不再那么谦虚谨慎，甚至有些自以为是的地方。

有一次，一位同志向我开了一句讽刺性的玩笑：“顶数你们办公室忙，也顶数你们办公室的权力大。以后我们各处的工作直接向部长负责，你们不要干涉！”我急脾气成性，怎么能接受这样的批评，以牙还牙地说：“办公室办公，总要做些综合平衡工作嘛，人家快要累死了，你看办公室好办，你来试试看好了！”一面说，一面摔下手里的笔，躲到一个小房间里，关死门，谁叫也不出来。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有的同志只好去找西民同志，他正在收拾文件，准备下班，听到这件事，轻轻地来敲我的门，我听到部长的声音，不得不开门，但一句话也不说。西民同



志可能早知事情的原委，挟着皮包，衣帽整齐地站在我的面前，看到我红红的眼睛，不禁微笑了一下，拍拍我的肩膀。我从来没有省察到他的表情和声音是那样的温和：“又不是小孩子了，怎么还要小孩子脾气！”听了他的话，我反而感到更加委屈，竟然抽泣起来，但也暗暗责怪自己，怎么连这么一点刺激都经受不了！我取出手帕，擦干眼泪，勉强地说：“都怪我不好，耽误了你吃饭。”西民同志笑了，笑得憨厚亲切，他慢悠悠地说：“你不是经常说任劳任怨吗？到了时候怎么就忘啦！我看任劳两个字能给你100分的话，任怨只能给50分。”被他这么一说，我深感内疚，低着头准备走出小房间。开门一看，办公室的两位同志还在门口，我惭愧得无地自容。西民同志挟着皮包出来，又回头向我温和的一笑：“要在实践中去体会任劳任怨的精神，自己有什么缺点，也要自觉地去克服，综合平衡决不是居高临下。”这是多么严肃的批评，又是多么真情的爱护。我根据他这两句话，在年终检查时，写在自己的书面检查上，他在审阅我的检讨时，将一些过头的话作了删改。

西民同志除了全面抓部里的工作，还经常出去作报告，每次报告的时候，我和几位有关的同志几乎都要陪他一起去，做些具体安排和记录等方面的工作。记得有一次他为南京地区党政军的宣传、教育、新闻等部门的同志作关于写作方面的报告时，希望大家对写作要有苦思冥想、探索追求的精神，并引用了一首词：“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西民同志的这次讲演，为宣传工作岗位上的许多同志所称颂，他们见了，总是连声称赞：“你们那位部长，不单是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才子！”我听了这些赞扬，也



感到很荣耀。有一次我找了个机会问他，这首词你是怎么写出来的？他憨然一笑：“这哪里是我写的！是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的名作。我不过借用来说明写作一般就有困惑、追求、成文这么三个阶段而已。”

西民同志也有忙里偷闲的时候，一休息下来，捧着一杯浓茶，和我们聊天。这样的时间很少，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记得一个雨夜，他在办公室里翻出一些由领导同志给他修改过的稿子给我们看，告诫我们，想一次两次就写出一篇好文章是不可能的。“你们看看我这些底稿，有的经过领导同志修改得几乎面目全非了。”他翻出几页被改得很乱了的稿纸，接下去说：“写稿子要有一种不怕修改的决心，才能有好的作品出现。”他还有声有色地告诉我们，写一篇文章，好比盖一幢房子，先要有一张图纸——就是在脑子里先要有打算，要解决什么问题，怎么开头，怎么结尾；然后搭架子，列出一个简要的提纲；再打地基、砌墙、上瓦盖顶；房子盖起来了，还要经过粉刷等修饰布置，才能搬进去住。他一再强调，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大概，真正写作起来，也不一定生搬硬套地去做，特别是文艺作品，作者开始想象的和最后写出来的作品，常常并不完全一样。他向我们简要地举了托尔斯泰写《复活》的例子。单单为了那个女主人公的眼睛和嘴唇，就修改过若干次。我暗自认为，能在这样一位有学识的领导同志手下工作，真是一种幸运。

一天，西民同志出去开会，我搭他的车同时回办公室，路上他突然问我：“听说你出了一本书？”我懵了一下，问：“什么书？”他说：“长篇小说《韩秀贞》，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我不禁愕然，我出了书？自己怎么不知道！西民觉察到我可能还没



有收到样书，告诉我是从上海一位同志那里听说的，可能样书还没有寄到。我脱口而出地说：“我那可是没有经过反复推敲、琢磨修改成的，连个底稿也没留，就乱七八糟地寄到出版社了！”西民同志微笑着。对这突然到来的“喜讯”，我不是感到多么高兴，而是后悔自己太粗枝大叶了！坐在车里默默不语，只觉得面部发烫，心快跳到口里。

这本小说是1949年南下等待分配工作时写的，写的是一个从讨饭女孩到怎样当了模范女区长的事迹（故事是从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上了解的）。刚写完就分配到新华日报社工作，怀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情，匆匆忙忙地连誊抄一遍也没有便寄给出版社。没有想到，上海文艺出版社这么快就出版了。

这本书售得很快——可能那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作品，或者更多的作者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来写作。1953年再版了一次，因为我缺乏写作经验，不清楚真人真事的文艺作品应当怎么写，为了增强感染力，把书中女主人公韩秀贞的妹妹在与敌人斗争中只负了一点伤，写成牺牲了；同时将一个富农写成了地主。1954年春天，这本书便惹出了麻烦，自己也深感不安。在华东的一个文艺刊物上写了一篇《我为什么写〈韩秀贞〉和事实中的某些错误》，才觉得如释重负。当时西民同志已调到中央宣传部任副秘书长，听到这一消息，很快写信来安慰鼓励我，并指出：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多以真人真事为基础进行创作，和写小说有严格区别。我边读信边自愧，在我思想上遇到痛苦折磨的时刻，收到了那样诚挚而坦率的来信！



(三)

1951年底，“三反”运动开始以后，部里派我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蹲点。当时南京分院院长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他虽在南京任职，但经常住在北京。运动初期，谁也不提意见，一旦群众发动起来，就什么意见也提出来。一天，一些人竟然要求将住在北京的李四光叫回来“交待问题”。我一方面希望运动发展得轰轰烈烈，一方面又感到事关重大，应向部长请示报告才行。抽了个空，匆匆忙忙地由鸡鸣寺的山脚下回到部里，向西民同志汇报这一情况。他一听要李四光回来，顿时脸色一沉，带有愠色，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表情那样严肃。他毫不犹豫地问了我一句：“你对这个要求怎么看？”没等到我回答，便带有怒气地对我说：“派你去参加运动，是为了掌握政策的，只能引导群众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能做群众的尾巴！你了解不了解李四光是全国著名的地质专家，请他回来，向他汇报研究情况可以，绝对不能安排他在大会上作什么检讨，向他提出一些捕风捉影没有确凿证据的问题。在科学院这样的单位，专家学者多，你要特别注意出现任何不符合党的政策的事情！”从他的话音里可以听出，他对保护、尊重李四光同志，是多么坚决果断！我连晚饭也没有吃，连夜赶回科学分院，向院党委传达了他的指示。不久李四光虽回到分院一次，但大家不是向他提什么问题，而是向他汇报运动发展情况，征求他的意见。李四光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北京。我为了这件事，曾经捏着一把汗。党的政策就是党的生命，这句话分量有多重啊！

与此同时，科学院的地质研究所发生了另一件事。据汇报



的同志说：一位工程师“证据确凿”地贪污了两只金刚钻，已确定他是“老虎”，他自己也供认不讳。我有了上一次的教训，不论汇报的人说得多么有声有色，有根有据，还是到现场进行核实。事情的过程比较简单，那位工程师刚刚结婚，新家的摆设比较讲究，二居室的房间，卧房里有沙发式的双人床，落地台灯，外间摆着一大两小的沙发，墙上挂着新婚大照片。这种家庭布置，在50年代初期，的确算是相当阔气的。人们先从这位工程师的身上想问题，要他交代野外勘探时是否贪污了金刚钻。为了怕他和他新婚的妻子互相串通，暂时将他隔离到另一间房子里，他爱人去送饭时，还要经过检查。有一次，他爱人在大米饭里夹进一张小纸条：“赶快交待贪污了两只金刚钻的事实。”人们看了以后，又原封不动地将纸条放进米饭之中。这位工程师看了爱人的纸条，便连夜写了一份很详细的认罪书，要求能够将他放出来等待发落。所里的群众虽然将他放了出来，但“老虎”的帽子却戴在他的头上。我去了之后，那里的“打虎队”郑重地说：“他不算老虎谁算老虎！你可别给群众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嘛！”我被他们说懵了，心中虽有些半信半疑，一种说不清的困惑在脑子里盘旋。向部里汇报时，我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西民同志对我，同时也是对参加运动的一些同志说：“所谓的确凿证据，就是要把事情发生、发展的前后经过搞清楚，既不能单纯看表面现象，也不能轻信几句口供。两只金刚钻究竟怎么贪污的，又怎么从金刚钻变成了他自己的财富，这个问题并没有搞清楚，我看还得回去进行调查核实。”

果然不错，那位工程师一被放回家，就完全推翻了他的口供，既否认他贪污两只金刚钻的事实，又说明他家生活阔气一



些,与金刚钻绝无关系,提出要他在上海的老岳母来说明这个事实。我们按照他说的地址,派人到上海将他岳母请来。原来这位工程师的岳母是一位资本家的遗孀,从她去世的丈夫手中继承了一笔遗产,拿出一部分作为她独生女儿的嫁妆。她边哭边说:“都是我害了我的女儿和女婿,我的女儿娇生惯养,我的女婿可是个好人,我看他为人本份,才将独生女儿许配给他!……”。至于工程师的妻子为什么写纸条夹在饭里,要他承认贪污两只金刚钻,只不过抱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想法,达到先放回家以便团聚再说的目的。于是,工程师便编造了一套假口供,换得了夫妻团圆。

西民同志听了这段故事,笑了:“弄个水落石出就好,有错必纠嘛!不要怕丢面子。要知道,战争时期靠我们手拿武器的战士去消灭敌人,现在进城了,更要知识分子头脑里的科学技术去进行新中国的建设!”他向我一挥手说:“到甄别的时候,你带头去和所里的同志们一起向这位工程师赔礼道歉!”

我日夜忐忑不安,再没有比错整了人的事更令人痛苦的了。好歹盼到了那一天,我实心实意地去向那位工程师赔礼道歉,一块沉重的石头才从心中落下。在这次“三反”运动中,西民同志虽然严肃地批评过我两次,但我服服贴贴,心情舒畅,这种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批评是爱护,是教育。真诚而严肃的批评,更是深厚友情的表现。

(四)

西民同志于1954年2月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副秘书长。他虽然不再直接领导我们工作了,但仍经常通信,他的信



里除了教诲,没有任何闲言琐语。有一次,我将在农村了解的一些关于政策方面的问题,在信里向他汇报,他把那封信的内容登在中宣部主办的《宣传通讯》上,还特别加了编者按语,画龙点睛地指出贯彻党在农村政策的重要性。我觉得和他通信,绝不单纯是个人之间的友谊,而是从更高层次得到工作上的指导。

1965年初冬,我调到中央文化部工作,第一位和我谈话的又是石西民同志。他家就住在文化部的后院,我去的时候他正在吃早饭,我在他的书房里等着。又是五年多不见,他依然如故,闲话不说,开头就是:“我们准备叫你到文学出版社工作,去任副总编辑。但去了之后,首先是了解情况,不要抱起一部书稿就两耳不问天下事了。”我听着,记着。一踏进文学出版社的大门,第一个任务就是终审四川作家马识途一部近30万字的《清江壮歌》的急稿,根本没有时间去了解情况。刚把《清江壮歌》看完,又急匆匆地和社里几位同志一起,冒着风雪去河南兰考县采访组织党的好儿子焦裕禄的事迹报道。任务一个接着一个,心里虽然没忘记西民同志的叮嘱,总自慰地想:来日方长,了解情况嘛,可以在工作过程中捎带着去做。光阴就这样倏忽而过了。

乌云压顶,一场不寻常的强烈风暴就要卷来,而我正忙着出版乔木同志主编的《毛泽东诗词十七首》。美编室的同志制好三四个封面给我看,我觉得每一个都很好,自己拿不定主意,带到部里请西民同志审定。他镇定的表情中略微露出些微惆怅,慢腾腾地说:“放在这里,等等再说吧!”因为他常常批评我性子急,这次没有逼着他马上拍板,但是我认为一个封面,何必这样费斟酌。径自回到社里,发动全体同志将毛主席《咏



梅》词中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的“已”字误排成“己”字，一页一页地改过来。出版毛主席的诗词，是全社会最光荣而严肃的任务，不能有丝毫疏忽，同志们各自领取一些页码去埋头改错字。西民同志却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夕，要我们“暂时停印”，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出更多的理由，只是从嘴里迸发出三个字：“等一等”。本着服从组织的原则，我们只好暂时停印。那时候报纸上早已开始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多么惊心动魄的一场斗争，就在我们面前摆着，我却还是那么单纯幼稚。

(五)

空前的大浩劫开始了，文化部于1967年初由造反派夺权。不久，西民同志也被上海来的造反派揪回上海了。炎炎夏日的某天，我从揪斗我的会场出来，看到墙上贴着一幅大标语：“请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西民的嘴脸”，下面有一幅印得很不清楚的照片，一串大铁索链挂在西民同志的脖子上，他弯着腰，面前的地上一摊摊黑糊糊的东西，不知是汗还是血。我顿时毛骨悚然，不忍再视。不久，我也被关进了“牛棚”，失去了自由。

1978年3月，我从陕西调回北京，分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工作。听说西民同志在这场浩劫中，被非法关押达9年之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推翻“四人帮”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我恨不得马上飞到这位尊敬的长者面前。走进原文化部后院一座楼的东头，是西民的住处。三间房有一间被屏风隔了起来，里面放了一张单人床、几个书架



和一张写字台，这就是他获得自由后的小天地。他的爱人吴伟同志一见到我，互相紧紧地拥抱，各自的热泪滴在对方的肩膀上。西民同志却比较镇定，只是惨然一笑。但是他变了，头发全变成一缕缕稀疏的银丝，眼皮耷拉下来，显得有些浮肿，行动上也显得迟缓……。整整九年，这是多么漫长的岁月，我竭力控制住感情，不愿提那些引起他伤心的事。但他却主动问我：“你还好吧，这些年！”“好什么？不过比你轻多了！”我转身扶他坐下。从他的脸色上，可以看出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但不动声色。我实在不愿憋下去，向他叙述起在湖北向阳湖围湖造田时受到体罚虐待的情况。

“听说你在那里得了癌症，到西安才开了刀。”吴伟同志带着感激的语气紧紧地拉着我的手。“现在怎么样了？”西民同志语音徐徐地问我，双眼闪出一种关怀的熠熠之光。

“胃切除了五分之四，当时医生判我一个礼拜死缓。”我兴奋地说：“谁想到又活了五年多，不该死的怎么也死不了！”

“留得青山在嘛！”西民同志有意地鼓励我：“还可以再干10年！”

没有干10年我就离休了，整天和医院打交道。每次住进医院，先围绕着是否癌变全面地进行检查。这时西民同志也已退居二线，搬到离我家较近的木樨地，我们经常来往。他有时由吴伟同志扶着来，有时自己拄着一只拐杖来，有时由司机送了来。话虽不多，但也常常回忆一些往事。有一次，我又因病住院了。那是1984年春节的上午，他突然来到我的病房。我收拾起散落在沙发上的一些稿纸，请他坐下。他问我，生病还写什么东西，我如实地告诉了他，那是1949年3、4月间，我参加全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记，准备把它整理出来。



“想出书吗？”他高兴地问。“再出书，可要接受过去写《韩秀贞》的教训了。”我有些愧色地说：“不但在文字上要通顺，特别是对人名、地名和重要事实一定要核对清楚，可不能再那么粗枝大叶了。”“愿意我作为第一个读者吗？”他的双眼闪出一种谦和征询的光芒。“那太求之不得了！”我兴高采烈起来，恳求地说：“石部长，你真的能够替我预先审查一下吗！”

这年的夏末，我将《春天的日记》初稿送给他审阅。没隔多少时间，他亲自将看过的书稿送到我的家中，再三表示：“我可是认真拜读了，连个别错字都改了过来，比如你将罗迈同志的“迈”写成“曼”了，我就给你改了过来！”他临别时还鼓励我说：“这倒是一本记载重要历史事实的书。”

西民同志走了以后，我看到他为这本书写了一篇朴实动人的读后感，文后还附了一首七律：

秋深夜读漾春风，笔走惊雷一片红。
欢乐绕梁凝血泪，平凡刻骨谱英雄。
卅年今又擂战鼓，四化誓教改旧容。
此册堪酬新一代，暮年之事在松筇。

我看完这诗句之后，不禁泪水盈盈，心潮起伏。西民同志！你在任何一桩小事上都是这么认真对待，可惜我向你学习得实在太少了。

我有病的时候，西民同志的心脏病也连续发作，经常住医院。但病一好，仍不时来我家坐坐。有时江苏省和南京市一些老同志来京，我都陪他们去看望我们这位共同的老部长，有时他身体好，还来我家与他们合影留念。1987年8月25日，西



民同志刚刚出院，又来我家坐了整整一个上午，虽然没有多谈什么，但还是气喘吁吁地坐了一会儿，又多坐一会儿。我发现他脸上有些浮肿，显得衰弱之极。他住院期间，吴伟同志来到我家，两人不约而同地为此凄然泪下。

这年10月17日晚，突然接到西民同志女儿的电话，说爸爸可能不行了！一块石头撞击着我的心头，我与老伴急忙赶到医院，西民同志已移到急救室抢救。为了防止感染，我们不能进去，吴伟同志也因疲劳过度回家休息了。我从急救室的门缝里，只看到他的一只手，一只被吊针扎得青紫斑斑的手！心中怀有一丝希望地想：明天一大早再来看他。谁料18日黎明，一种悲凄的声音在电话听筒里响起：“西民同志于17日零时20分与世长辞！”

我抱着他给我们留下的一部33万字的《时代鸿爪》，从中去寻觅他的足迹，回忆他生前对我深情的教诲，以及在他的后半生遭到的那些残酷的折磨！……久久，久久。有人说，当前人际关系大都是权势与金钱之间的互相利用。我觉得石西民同志对人的坦白与真诚，是和那些世俗的关系无缘的。他对我的教诲与友情，永远使我思念！

（原载《江海激浪》第8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出版）



石西民与新华之友会

刘彦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石西民同志担任了南京新华日报社第一任社长。他那种干革命新闻工作的好传统、好作风,那种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也带到了报社,使南京新华日报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非常重视党的政策的宣传,要求准确无误地对群众宣传,而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和差错。记得1949年5月份,报社为了解答群众关心的各种问题,在报上开辟了“社会服务版”。有一次在《读者信箱》专栏中,我起草了一篇关于婚姻自由问题的“答读者问”,西民同志在审阅小样时,发现有几处提法用词不够准确,含意模糊,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他把我找去,逐句逐段的修改,边改边讲为什么这样改,原来写的缺点在什么地方,讲得有根有据,令人信服。他那种认真推敲、细致入微地宣传党的政策的精神,使我非常感动,深受教育。

西民同志在南京新华日报工作期间,发扬党报的群众路线,继承和发展了重庆新华日报联系人民群众的做法,接受群众的建议,创办了“新华日报读者之友会”(简称新华之友会)。它是原南京大三元酒家经理胡翼文写信给西民同志首先提出来的。西民同志采纳了他的意见,指派报社干部负责组织,吸收胡翼文先生参加干事会,很快建成新华之友会,并立即开展



了政治学习等活动。它是报社在南京刚解放不久,组织南京市人民学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当时,以新华之友会会友为主,吸收教师、学生、工人、家庭妇女等参加读报组活动的市民达数万人。他们散居在全市各个街道。新华之友会成为党报和群众联系的纽带之一,它在党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西民同志不仅经常过问工作的计划、进度,还多次对新华之友会的会友作学习辅导报告和政治形势报告。在西民同志主持和指导下的新华之友会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引起了其他地区报社的注意和重视,纷纷派人来南京取经。

西民同志对利用这种形式建立党与群众的联系,非常重视,经常萦记心怀。直到30年后,他还关心着这件事情。那是1979年4月,我在《新华日报通讯》上写了一篇题为《党报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记解放初期〈新华日报〉的群众工作》的文章,主要内容是记述新华之友会的工作情况。西民同志在北京看了这篇文章后,在来信中谈到:“在〈通讯〉中,我看到刘彦同志的一篇介绍新华日报社在南京解放初期如何做群众工作的文章,引起我的回忆。我想到新华日报社当时办社会服务室,特别是新华之友会,是曾经起过一定作用的,也是报社同志花了一些力气的。我们现在的党报,好像不大采用这种联系群众的办法,而在当时的南京,我认为那种形式是有用处的。”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写道:“我认为这种方式虽然与重庆时代因环境不一样而形式不同,但精神还是一脉相通的,目的是为党争取更多的朋友。近来上演的《报童》是一出好戏,可惜,我认为报童与读者(包括大学教授以及国民党机关中一些较倾向进步的人员)的联系,在广度与深度方面还写得不



够。……如果你们认为可以,我觉得补充一些创办初期与读者联系的情况是有意义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民同志作为一位党的新闻工作者,一位几十年来呕心沥血、战斗不息的老战士,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党报事业的发展。他这种忠诚党的新闻事业的坚韧不拔的思想和风格,是我们党报工作者应时时学习和牢记的。

西民同志离开我们了,但他的可贵的情操和崇高的献身精神,是永不泯灭的。它鼓励着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把党报这面开路先锋的战旗举得更高,更好地发挥它的传播、引导、鼓动作用。

(原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
分会通讯第9期,1988年3月出版)



其人虽已歿 千载有余情

左 克

石西民同志是南京新华日报第一任社长，当时我刚踏上革命新闻工作岗位，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艰苦朴素的领导干部。我和石老接触不多，但有一件事感人肺腑，令我终生难忘。

记述这件事，先要谈谈我的一段经历。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头面人物已纷纷逃往台湾，这时打入中央日报社的我地下党员李廉同志，为了壮大进步力量开展工作，吸收我、刘彦、邵平（现在江苏少儿出版社）、金敏之（现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四人来中央日报南京版采访部工作。据李廉同志事后告诉我们：他吸收我们是征得中共地下市委文委同意的。我们进入中央日报社时，社长马星野、总编辑李荆荪等都早已逃之夭夭。当时中央日报社留下来的员工靠卖报和广告收入维持生活。南京解放，我们又参加了地下党批准办的《解放新闻》的编采工作。《解放新闻》停刊，正式出版南京新华日报，我们又经李廉向石西民同志推荐，转入新华日报社，并穿上了解放军的土布军装，满腔热情地投入革命工作。

这样一段经历应该是肯定的。可是长期以来有人说我是“留用人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才去掉这个不实之词。



写到这里,就不能不思念起石西民同志的感人之处。不久前,当他卧床不起,终日靠输氧气维持生命的时间里,仍怀着对同志负责到底的心情,提笔给有关老同志和报社党组织,证明我们几个人参加革命时是“进步青年”。我了解这件事以后,感动得几个夜晚没有安枕。因为我从来没有为个人琐事找过他,他为我写这封信也没有让我知道。特别是在他临终以前仍如此惦念着他的下级的政治生命和晚年幸福,这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高尚风格,正体现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石老离我们而去了,但我在默默地叨念着两句古诗:

其人虽已歿,千載有余情。

(原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
分会通讯第10期,1988年7月出版)



一件小事

梅延庆

南京解放后，我从部队转业到新华日报社，被分配在秘书室任秘书，开始认识了石西民同志。那时他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社长，有些社务会议叫我参加，做做记录。但我的政治、文化水平很低，深感力不从心。记得有一次会议记录，我记得很不好，未能反映出会议的精神。西民同志看了以后，非但没责备我，还鼓励我，叫我不灰心，实在出我意料之外。更为感人的是，在以后的一次会议之前，为使我做好思想准备，接受上次教训，他亲自写了一份如何做好会议记录的具体意见交给我，叫我记录时，不必把每人说的每句话都记录下来，要记精神和要点，然后加以整理归纳，删繁就简，使之条理化。我为了提高记录的质量和速度，曾想自费去一个私人办的速记学校去学速记，当我把这一想法向石西民同志汇报后，他当即表示称赞，并决定学费由公家出。

石西民同志对同志爱护备至，对党内党外的同志一视同仁，政治上严格要求，生活上给予应有的必要的关怀。在一次社务会议上，他说，编辑部和工厂上夜班的同志很辛苦，经常熬夜是很伤身体的，又是供给制待遇，我们应该给予必要的关心。他提议增加一点夜餐费，在夜餐里加点荤菜。从此以后夜班同志的伙食有了改善。这虽然是小事一桩，但说明石西民同



志关心同志的精神是很感人的，是难能可贵的。

（原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
分会通讯第9期，1988年3月出版）



我们的老社长

顾国政 王智生

1949年南京解放后的几天，石西民同志受党中央委派，来南京创办《新华日报》并任社长。他来到报社初期，头戴一顶草绿色军帽，身着粗布军装，脚穿布袜布鞋，和同志们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在办公室里搁了一张行军帆布床，床上只有一条薄棉被。

那时，我们在排字房做工人，由于工作的关系，天天要和编辑部的同志打交道。当顾国政第一次给编辑部送大样时，有位同志指着石西民同志说：“给石社长审阅。”当时顾国政感到很惊奇，简直不相信这位普通一兵竟是我们的社长。因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社长马星野，高官厚禄，住在公馆，进出汽车，工作上有秘书代劳，生活上有仆人侍奉，轻易不来报社，偶尔来一次，也是随从前呼后拥，很少和工人接触。而我们的这位石社长竟是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经常和我们工人亲切交谈，激发我们的主人翁觉悟，使我们懂得革命工作和过去工作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

最使我们难忘的是南京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那时我们都住在清凉山宿舍。大年初一清早，我们刚刚吃完早饭，突然传来喜讯，说石社长要来向大家拜年。这在旧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事，弄得大家既高兴，又手忙脚乱，不约而同地拥到大门口



去迎接。石社长等领导同志来到大门口，老远就拱起双手，向大家祝福问好。然后，挨家逐户拜年。工人同志像接待亲人一样，忙着泡糖茶，拿糖果、瓜子、苹果、桔子等招待石西民、邓岗、朱文廛等领导同志。快到吃中饭时，石社长才和大家握手告别。石社长走后，宿舍里的工人和家属心情激动异常，议论了好久。

石西民同志在工作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他审阅大样时，不仅标题要一一过目，重要的文章也都一字一句地斟酌、推敲、修改。经他审阅的大样，都要签上“西民”两字，以示负责。有时大样修改太多，我们在改样时遇到困难，特别是增添的文字过多，版子拼不下时，只要向他说明情况，都能不厌其烦地进行删节，从不使工人为难。

石西民同志日以继夜、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高贵品质，深入群众、关心工人的优良作风，给我们以深刻教育。转眼已经过去 38 年，我们至今一直铭记在心坎里。

（原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
分会通讯第 9 期，1988 年 3 月出版）



老社长最后的题辞

邵树文

我们南京新华日报社的老社长，敬爱的石西民同志与世长辞了。当我以极为悲痛的心情悼念我们老社长的时候，不能不想起最后一次同他见面时的情景。他那种忠于党的新闻事业的严肃态度和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感人至深，铭记不忘。

那是1986年9月26日，为了编写《南京新华日报史》，我在北京寓所拜见了西民同志。

上午10时20分，随着铃声出来开门的是石老的夫人吴伟同志。她悄悄地告诉我说：“西民同志昨天才从北京协和医院出院回家休养。医院已确诊为癌症，但还没有告诉他本人”。我深领其意，决定不过多影响他的休息。

此时，石老闻声迎來。看上去比我在同年1月见到他时瘦了些，身体显得虚弱。在他的书房落坐之后，我首先转达了新华日报及《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分会同志们对他的问候。他连说：“谢谢同志们的关怀。”随之，我重点就《南京新华日报史》编写工作的进度情况作了简要汇报。他对南京分会的同志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并希望南京分会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完成《群众周刊史》和华中、南京《新华日报史》的编写工作。



接着，我请求石老谈谈当年党中央决定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的情况。他稍加思索以后说：“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在北京中南海，周恩来同志接见并宴请一大批马上南下的文化、新闻界知名人士。席间，周恩来同志宣布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把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新华日报》的报名放在国民党政治中心的南京；把有光荣历史的《解

努力去学习，勤奋工作，
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新闻
工作者。
石西民
一九四九年
九月廿一日

放日报》的报名放在中国最大最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上海。当时被邀请一起参加这个宴会的还有后来主持上海《解放日报》工作的范长江同志。接见后的第二天，我就和范长江一起从北京



乘车南下。到达淮河大桥北岸时，因桥被敌机炸坏，不通车，就请在蚌埠的华中支前司令部政治委员曹获秋同志派卡车把我们送到了南京。到南京后，先是住在中山东路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里，后来移到了国民党总统府。到达南京第三天，就出版《新华日报》。那时，我家是我一个人先到南京的，家属都是后来才去的。”说到这里，石老又进一步强调说：“中央决定把《新华日报》的报名放在南京是完全正确的。我的记忆相信不会错。事实上，将《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两个报名同时放在南京和上海，这本身就证明，只能是党中央的决定”。

考虑到石老的健康状况，我准备起身告辞，他却急忙拉住我的手说：“不要急着走。你来得正好。我还有一件事，请您回去转告南京的同志。我最近常见有的同志写文章，把重庆《新华日报》说成是南方局的机关报，这并无根据。重庆《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向中国国民党当局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是由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当局商谈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提出，最后经国民党最高当局同意，于1938年1月在汉口公开出版。中共中央还在1938年4月2日专门为《新华日报》的公开出版，向全党发过指示。”说到这里，石老不顾病体，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到书橱前，翻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并指着文件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由于过去党处在长期秘密工作之下，不能发行全国性党报，因此对于党的各项政策只能靠秘密的油印刊物传达，这样就养成同志们不了解党报的作用。在今天新的条件下，党已建立了全国性的党报和杂志……。党报正是反映党的一切政策，今后地方党部必须根据党报、杂志上重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是党的政策和



党的工作方针来研究。在党报上下列几种论文：一、《新华日报》上的社论；二、《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群众》上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的文章，必须在支部及各级委员会讨论和研究……”。至此，石老又进一步强调说：“我引用中央文件，是要说明：重庆《新华日报》是党中央办的党报。尽管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原先的《解放》杂志在延安改为《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是由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当年在国际国内所起的宣传作用，也显然与解放区各中央局的机关报有所不同。”

我听了石老语重心长的一席谈话，对于他那种忠于党的新闻事业，一丝不苟的精神，实事求是的原则性，内心敬佩不已，到底是我党的著名的报刊活动家！

我真该走了。边起身边问：“您老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哦！还有一笔债今天还还清，也作为一件礼物吧！”他和蔼地笑着说。只见他缓步走到桌前，打开墨盒，拿起毛笔，题写了“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新闻工作者”的亲切教言。这不是一般的礼物，而是对所有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同志的殷切希望。

石老与我们永别了，他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我们要永远记住他最后对我们的教诲：“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新闻工作者。”努力办好新的历史时期的党报，不辜负老社长生前对我们的谆谆教导。

（原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
分会通讯第9期，1988年3月出版）



三次见石老

徐中海

我见过石西民同志三次。

第一次，是1953年5月，我在淮阴地区三河闸工地上采访，见来了几辆小汽车，有一个穿着对襟小褂子的人下了车，他就是石西民同志。

石西民当时刚刚40出头，可是看上去显得老成，人虽瘦却很精神。他一下车，就走上工地，和挖河的民工在一起。他亲自动手，帮助民工挖土、抬土，往两旁高地方送去。来回往返若干回合后，乘民工工间休息时，了解民工生活，做了一些有趣的问答。

“能吃饱饭吗？”他笑嘻嘻地向民工提问。

“能！”民工们一致答道。

“还有油吃吗？”石西民又发问。

“有啊！”民工们接着石西民的话茬说：“有豆油，有花生油，还有芝麻油呀！”

“芝麻开花节节高啊！”石老看着步步登高的地方，笑逐颜开地说：“步步登高，力气差一点上不去！”

石老访问结束后，走上工地指挥部，进入临时会场。这时，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的管文蔚和水利、农林等厅局负责人已到会就席。石西民同志坐在管老左侧的椅子上，还有新华社、人民



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社派来的记者。这时，管老提出讨论题目，农林、水利厅局长争先恐后的发言。发言要点是：一要打好拦河坝（拦住淮河上中游下来的水），力争在汛期到来之前建好闸。二要等水栽秧，打了拦河坝，就要影响里下河八县水稻收成。农林厅长、水利厅长激烈争论，各执一端。西民同志仔细听了双方意见，权衡利弊后说：“拦河坝要打，要抢在汛期前打好，才能建好闸排洪。秧苗也要栽，先用地下水，千方百计保苗成活，待排洪后，大水、大肥秧苗旺，治水保丰收两全其美。”大家听后认为有道理，管老最后下结论时，基本上按照西民同志意见，当场拍板。结果，拦河坝按时完成，三河闸按时建好，秧苗及时栽好、保活，做到治水、生产两不误。

第二次，是1979年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在新华日报三楼会客室，又见到了石西民同志。

在王淮冰、姚北桦同志介绍下，石老立刻转来和我合坐在长沙发上，用他的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问我别后的情况。我怕过多的劳累他，不敢多说，只简单地谈了一些自己抵制浮夸风，受到一些不公道的待遇。原来，他受“四人帮”长期迫害，受苦比我深多了，但他未对我讲，只是劝解我说：“我们都有一本苦经，都是一些领导者‘左’的思想导致的结果，‘左’倾者得时，实事求是者遭殃。三中全会后好了，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我们又见面了。过去不愉快的事，我们把它丢到脑后，集中精力，拼命干，争取把过去损失掉的时间补偿回来。”

我在电灯光下，仔细地看了石老面孔，是高兴而愉快的。但又显得苍老，两鬓白发占多，额角上的皱纹一条比一条深。我请问他高寿，他打着手势，说他已70虚岁了。老人，晚上不宜太兴奋，又不宜熬得太晚。吴镇、樊发源、高斯等同志都很关



心石老，向我打招呼，起身送石老去休息。我手挽着石老的一条胳膊，走下三楼到一楼，沿着台阶往下走。石老边走边说：“这地方，1949年4月下旬，我来南京办新华日报时，一天走几遍，不觉得阶梯陡，也不感到上楼地势高。现在，不但感到高，而且感到陡，老是觉得高一脚，低一脚，走的步伐很不自然。”就这样边走边说，到了门前平地大院，把石老送上车后，他向我们招招手，走了。

第三次，那是1985年6月上旬，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分会成立大会上，我再次见到了石西民同志。

石老坐在主席台上，我见他的身体，不如第二次见面。我呆看他那憔悴的脸色，有些浮肿，却打着精神，给大家作报告。

他说：“我认为，南京分会今天成立，可以说今天是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甚至也可以说是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历史上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又说：“总会号召抢救活资料。”“希望南京分会成立以后，能够在探讨周恩来同志的办报思想，发挥新华日报的光荣传统方面多做些工作。这里完全有条件，因为有很多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南京分会也不光是江苏南京的，还有上海，还有华东各省的很多同志……希望这次会议以后，我们这个史学会能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石老在南京分会成立大会上，系统地介绍了重庆新华日报五个方面的经验。他的重要讲话，后来刊载在南京分会通讯第一期上。重新阅读，感人肺腑，意义深远。我只见过石老三次面，以后再也见不到了。只能面对遗像，用泪水悼念石西民同志。

（原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
分会通讯第9期，1988年3月出版）



石西民与《解放日报》

王 维

在纪念上海《解放日报》创刊 40 周年的时候，报社的许多老同志都很怀念石西民同志。他从 1955 年到 1964 年，在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的 10 年中，一直关怀和领导《解放日报》的工作，他为《解放日报》的成长，花了许多心血。我在他领导下工作，得到他许多指点和帮助。他的好作风，他出的好主意，直到今天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

西民同志的领导作风比较民主。他和我们谈工作，除了正式传达党中央或市委的决定以外，一般都是抱商量的态度，还常常先听听我们的意见，然后讲他的意见，他讲过以后，再问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困难。我们发表意见，他边听边思索，不像有些人那样似听非听。讲话的人觉得自己受到尊重，发表什么意见也相当认真。他平易近人，我们和他相处，并不怎么觉得他是“顶头上司”。他比较随和，我们在他面前发表意见，也不用担心他会抓你辫子，上纲上线地批你。他以平等态度对待下级，被领导的人也易于心情舒畅地接受他的领导。



他领导我们工作，有时也要我们帮他参谋参谋。1962年春广州会议之后，有一天晚上他约我到影片发行公司看电影，看《情长谊深》和《洞箫横吹》。被邀的还有陈虞孙同志。放映之前，他没有讲什么，看完了，他问我们觉得这两部影片怎么样？我是初看，觉得不错，问他什么意思。他说，过去有人认为这两部片子有严重问题，不准放映，现在根据广州会议精神，该不该平反。虞孙和我都赞成平反。这时，他才说，《情长谊深》还是表现了党的思想工作的。党委书记和所长过去是好朋友，解放后在一起工作，书记做所长思想工作，讲一点过去的友谊，有什么不好呢？有的人说这是以感情代替思想工作，甚至说是要取消党的领导。太过分了。

西民同志做领导工作，有一种不耻下问的精神。他在一些非工作的场合（如剧场休息时）遇到我，也常要问问下面有些什么情况，或提一些问题要我讲讲看法，也有时间问问我在想什么事情，有哪些打算。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他深知上海各方面情况复杂，自己分管的工作，摊子大，影响广，生怕自己因不了解情况而下错了决心。

为了能从多种渠道获得信息，西民同志从60年代初开始，常与上海新闻界负责人开务虚会。名义上叫务虚会，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开会形式的聚会。那时，经过了1957年的反右派扩大化，1959年的党内反右倾斗争，加上国际上与苏共论战，国内则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人们心里的弦，绷得紧紧的。他觉得除了在正式开会的时候鼓励大家讲话以外，最好还有一种比较轻松、比较随便的形式，约一些同志无拘无束地说说心里话。取名务虚会，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这样的聚会，不谈具体工作，没有议题，不作决定。我当时是市记协副主席兼秘



书长，西民同志委托我代为通知。一般是两周一次，星期一傍晚在和平饭店碰头。参加的是解放、文汇、晚报、广播电台、新华分社的党员负责干部，金仲华、赵超构两位党外负责人也应邀参加。西民同志常常先到，来了一二个人就谈，也不必等所有的人到齐。没有发言次序，谁想讲什么就讲，可长可短，还互相插话。我们谈的大多是社会思想动向，西民同志则把国内外重大事件给我们吹吹风，让我们心中有数。西民同志常请金仲华、赵超构发表意见。两位党外人士受到尊重，也能畅所欲言。谈话时清茶一杯，到了吃晚饭时，就在和平饭店吃便饭。那时旅游者不多，物价也低，饭店收成本，我们每人付两元钱，就吃得蛮好了。吃饭的时候边吃边谈，饭后还继续谈。一般不超过晚上九时，以免影响报社夜班工作。这样的聚会，大体能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相互通气，都有得益，不仅有助于工作，还增进了友谊。可惜，这种务虚会在西民同志调北京后，就慢慢变了样子，新的主持人嫌在饭店聚会不严肃，吃饭怕被人说搞特殊化。于是地点改在解放日报社，两位党外负责同志也不再邀请。务虚会的内容变了，气氛也变了，务虚会名存实亡了。

二

西民同志早在抗战以前就在《申报》馆当编辑。抗战期间，他是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负责人。解放战争时期，是新华社总社的领导成员。对于新闻工作，他是内行，他是我们的老前辈，但他从不倚老卖老。在领导我们工作的时候，除了代表组织向我们传达或交代宣传任务以外，他常常是以建议的形式，商量的口吻，提出一些意见，但怎样做，则由我们自己来定。



三年困难时期，报纸宣传比较困难，1962年春节前后，我们发动回乡探亲的职工写“回乡见闻”，讲农村形势开始好转。我们才登了几篇，西民同志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登“回乡见闻”的用意是好的，但这样的稿子登多了，会不会有另一方面的反响，既然形势好了，就不必动员一部分职工分挑国家困难，回乡种田了。他这样一提，我们作了研究，决定收缩这个专栏的宣传规模，在适当宣传农村形势开始好转的同时，也讲整个经济形势仍然困难，还要继续艰苦奋斗。

1959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了《聂耳》，我们报纸像往常那样，只发了条消息。这部故事片在北京受到很高的评价，认为她是中国电影界放了一个卫星。西民同志向我传达北京的反映，说了句“我们上海不识货”。这是对我们报纸没有重视的批评，也包含着他没有及时提醒的自我批评。他要我们研究一下这部电影的成就，可否写个头条新闻并配发社论？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限于当时安排版面的传统习惯，这一套稿子被挤到第二版刊出。

1961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十万个为什么》问世，受到各方的好评。西民同志向我们提出，能不能像宣传《聂耳》那样，发社论，登头条新闻。他说，我们在“大跃进”中犯的许多错误，如报道白水可以变酒那样的假消息，新华社发了，许多报纸也就刊登，不就是缺乏常识的缘故吗？《十万个为什么》不但适合少年儿童阅读，让我们干部看看，也有好处，我们太缺少常识了。我们觉得他讲得在理，就照办了。

1964年秋，上海工人业余大学第一批学员毕业的前夕，西民同志打电话来问我们的宣传打算。我说，我们准备在第一版用通栏大标题刊登这条新闻，还参照少奇同志有关两种教



育制度讲话精神，写了社论。他表示赞许。他提出，工业生产上造出重要的新产品，报纸套红，现在培养出一大批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报纸可不可以套红呢？我说可以套红，应该套红。

我举这些例子，大多是属于西民同志分管的事情。是不是他对自己管的事都要报纸突出宣传呢？不能得出这样的印象。西民同志是很谦虚的。有时他抓的工作要见报，在版面安排上与别的书记、常委分管工作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就要宣传文教方面的稿子让路。我所以举以上例子，也因为“文革”中，《解放日报》上述宣传大多遭到批判，说宣传《聂耳》是为错误路线唱赞歌，宣传业余工大，是吹捧刘少奇。今日重提，以正视听。

西民同志对新闻工作有许多好的见解，有些意见是在闲谈时说的。他称赞《新民晚报》办得好。有的人不服气，说晚报是人家蹲马桶时看的。他说，一张报纸办得能让人家坐在马桶上看看也好嘛。他赞扬晚报是指她办得比较接近生活，表现形式也为群众喜闻乐见。他的意思是报纸要办得叫人爱看，人家看了，才能接受你的影响，如果老是板起面孔训人，人家不看，你什么目的也达不到。有几次他对广播电台的同志提意见。说他自己常在深夜回到家里，打开收音机想听听音乐，听到的还是进行曲。他说，都三更半夜了，可不可以放点轻音乐，让听众轻松一下？白天播放进行曲，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劳动热情，而夜晚，特别是深夜，广播一些轻音乐，有助于人们的休息。

《解放日报》有一次宣传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受到西民同志的批评。他说，现在大家口粮很紧，许多青年人叫吃不饱。在这个时候你们提倡开展消耗体力大的体育活动，我看不大合适。你们这样提倡，会加剧缺粮的矛盾。他说，群众体育还是



要宣传的，当前可以提倡棋类等消耗体力少的活动。

深夜宜放轻音乐，缺粮不提倡大运动量的业余体育活动，都是说宣传工作要从实际出发，讲求实际效果。

三年困难时期，内忧外患，领导上要报纸在开展批评方面谨慎小心，以免为敌对势力所利用。我们生怕这方面犯错误，一个时期报纸的批评很少很少。西民同志对这种状况颇为不满，他对我们说，社会主义好，好到连一粒痲子都不生啦？他说，登一件批评稿要看他的正作用大还是副作用大，如正作用大，还是要登。不能因为怕被敌人利用就什么批评稿都不登了。你不登他也会造谣，总不能因噎废食吧！他的这些意见，对我们好犯片面性的毛病，可说是一帖良药。

三

西民同志重视办报人才。50年代的中期，我一度在《新闻日报》工作，当工作需要调我回《解放日报》的时候，西民同志找我谈话。他说，郑拾风和冯英子有在国统区办报的经验，你最好能把他们两人弄到《解放日报》去，加强你们报社的力量。我赞成，请他以市委宣传部的名义调。他要我和《新闻日报》领导商量。结果没有办成。过了三年，《新闻日报》和《解放日报》合并，在人事安排的时候，西民同志主张郑拾风留在《解放日报》。拾风不是共产党员，在市委机关报不适宜担任领导职务。西民同志提出，拾风可担任评论员，继续享受他在《新闻日报》时的副总编辑的待遇。他的意见为市委所采纳。从此，《解放日报》有了专职的评论员。

西民同志不止一次关照我，要我们注意培养名记者。给一



些同志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某个方面的发言人,遇到什么为群众所关心的问题,由这些记者出面写文章。只要他立论正确,取得广大读者的信任,久而久之,他就是公认的名记者。西民同志还说,不要把能力强的记者都提起来做部、组领导,可以让一些同志一直做记者,当然他的待遇可以提高。他举例说,要办好大学,当然要有胜任的校长和系主任,但更要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大学里有名教授,不一定有名系主任。我们觉得西民同志的意见很有道理,也打算照他说的办。但对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做起来决心不大,措施也不得力,加上客观条件的限制,西民同志的愿望大都没有实现。

西民同志也很关心和爱护干部,他常在关键时刻,从政治上帮助我们。1957年全党开门整风,大鸣大放,他召集几个主要新闻单位的党员负责干部,口头传达中央指示。这段时间中央先后发来三份绝密电报,密级很高,他为了让这些主持舆论工作的干部心中有数,特地把党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和部署告诉我们,帮助我们认清政治方向,不要犯大的错误。他这样事先给我们打招呼,是对干部的莫大爱护。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特别是1958年市委扩大会议整风补课期间,在市委领导核心讨论给新闻单位几个负责干部定性的时候,他冒着一定的风险为当时《劳动报》总编辑马达同志讲话。西民同志说,马达对上海总工会党组领导有不够尊重的地方,但他要求市委宣传部加强对《劳动报》的领导,恐怕不能说他是反对党的领导吧。话虽不多,却起了大作用。主持会议的市委负责人说,这几个同志主要是缺乏经验,犯了错误,可以给他们党纪处分,让他们换个地方工作。又说,右派划多了影响不好。经这么一说,就把新闻单位的几个负责人的性质定下了。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对这几位同志中不应有的处分都平反了。处于当时那种政治气候,市委领导对新闻单位几个负责人作这样的结论,宣传部长石西民是从旁起了重要作用的。

西民同志不是完人,在工作中也难免有失误。1964年错把一位同志当作反革命分子,他是有责任的。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奉调进京,即将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到报社辞行,还问起这位同志在狱中的情况。他说,我在上海处理了许多事情,对这件事我心里不踏实。虽然当时他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件错案,也没有提出要进行复查,但他心中有疑惑,不放心,提出来,仍不失一位领导干部对自己处理问题的一种责任感。

西民同志在领导《解放日报》的十年中,有许多事情值得追忆,值得继承。我这里写的只是印象深的、现实意义强的几件往事。

西民同志是一位好领导,《解放日报》的成长,和他的关心与帮助分不开。他对我们报纸怀有深厚的感情,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不领导我们了,对《解放日报》的工作仍然十分关心,多方帮助。西民同志的深情厚意,值得我们解放报人永远怀念。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创刊40周年纪念文集》)



石西民和《新民报》

束纫秋

1929年创刊的《新民报——新民晚报》现在已有67岁“高龄”了。报社有关人员在整理和写作报史过程中，在涉及《新民报》曾在那里出版过的重庆、南京、上海等地的史料中，时常发现石西民同志和新民报交往的材料，在采访和搜集报史的过程中，在一些“新民报老报人”的口中，也往往会提到石西民的名字以及他对新民报的支持、帮助、领导和友情。

石西民并不是新民报的同仁，但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以及解放后的上海，又都有较多的机会和新民报发生联系。在重庆时期，他是《新华日报》的采访主任，新民报是当时当地一张有影响有特色的民间报，这一“同行”关系，两者自然也容易产生密切的联系。在上海时期，石西民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文教宣传工作，更是上海新民报（晚刊）的“顶头上司”，领导了新民报的工作和宣传。为此，这就必然会在新民报的历史过程中，留下了重要的史迹。特别是因为石西民的新闻专业水平高，政治领导强，工作作风、个人作风都好，所以对于新民报的同人说来，更是赢得尊敬和信任，在他领导下，工作也很愉快，由此也格外令人忆念。



“《新民报》是《新华日报》的友军”

说起石西民，人们首先总要想起他在重庆时期和新民报的交往关系。

《新民报》可说是一张有特点也有点“特别”的报纸。它的创办和主持人是国民党员陈铭德、邓季惺，初创于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西迁重庆。但主持人又是坚持抗日，崇尚民主，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日主张抱有深切的同情，所以它又不和国民党反动派一鼻孔出气，而是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抗日民主力量站在一起，这就形成了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采访主任石西民和新民报主持人、编辑部之间加强交往的思想基础。

在石西民看来，《新民报》是《新华日报》的“友军”。新民报当时有一位年青的记者名张林岚，他是浙江浦江人，和石西民是同乡。为追求抗日和进步，张林岚历经辛苦辗转来到重庆，进入新民报工作。他进入新闻界虽然如愿以偿，但还总感不足，认为新民报只是一张“民间报”，不如新华日报政治上强。于是向石西民提出想通过“同乡关系”调入新华日报工作。石西民没有同意，他对张说：你还是在新民报好，因为这张报纸是新华日报的“友军”，新华日报孤军作战是不行的，要有友军。新民报内有许多好朋友，赵超构、浦熙修……等都是，他们都是进步的，是友军，所以你还是在新民报工作为好。他还向张林岚阐述了为什么要做好“友军”报纸工作的道理。他说：有些话，新华日报不好讲、不好登；倒是让新民报去讲、去登，要方便有效得多。有些消息，新华日报根本登不出来，由其他报来登，就比新华日报登为方便。这一席话，坦率而简明地说明



了石西民对新民报的估价和共同作战的相互关系。因此，张林岚也就从此全心全意地在新民报工作了半个多世纪。

石西民对待新民报是如此说的，也是如此做的。

比如在重庆国共和谈时，忽然发生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主任李少石（廖梦醒同志的爱人）被冷枪枪击致死的事件，这个消息就是由石西民送到新民报用社会新闻形式发表的。为什么新华日报不发这一重要新闻？乃是考虑到这一冷枪是敌方故意打的还是偶然发生的，一时查不清；而且时值国共和谈时期，对未弄清的事件由新华日报发新闻，不适当。但中共办事处人员于此时被枪击致死，又是个重大事件，报纸不可无反映，政治上也不应无反应，于是由新民报用社会新闻形式发表，就比较适当，“立此存照”，进退都主动。这是一种全面思考下运用的新闻斗争形式和方法。后来查明，这是件偶发事件，不影响和谈大局，但对这一事件及时透露并为历史作一记录，却又是必要的。

又如著名的进步文化工作者沈兹九（胡愈之夫人）深夜回家，巷子里有人向她开黑枪。这也不能不反映以揭露和警告坏人。这一新闻，也是由石西民交给新民报刊登的。这些事都不算“大”，但政治意义却是重要的，斗争策略的运用也是高超的，都具体地说明了新华、新民两报在当时配合作战的关系。

“公统战，私品酒”，浦熙修家中座上客

可惜不少有关人员都相继去世了，否则肯定还有更多的旧事可以忆念。当时新民报的采访主任是名记者浦熙修，新民报的主笔赵超构又是和石具有私交的朋友，他们常有相叙机



会,比如上小酒店共酌一番,谈谈心。其实这也该视为是一种加强联系的形式,报社同人也都体会其中的友谊性质,概括地戏称他们为“公统战,私品酒”,恐怕这也适合当时的工作环境的。浦熙修家中更是客人多,特别是进步记者多,有人讲她家中等于茶座,新闻文化界的“沙龙”,当然茶座离不开新闻交流,石西民也是常客。由此也可知新华日报、新民报采访上的协调情况。

1946年2月1日上午,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新民报晚刊当天就报道这一消息,揭露国民党特务打手的暴行,第二天出版的日刊,更以大量事实和篇幅进行揭露。但国民党中央社却炮制一篇新闻,为打手撑腰。这篇颠倒是非的“奇文”,激起了重庆新闻界所有正直人士的义愤,先由石西民、浦熙修等42人联名发表《重庆各报记者为较场口事件致中央社的公开信》,批驳该社的这一报道。新民报以刊登启事的方式(免费)在广告版头条位置发表。中央社不服,也搞了一封《公开信》进行答辩,由中央日报发表。石西民、浦熙修等42位记者又写了《重庆各报记者对中央社复函之答复》,在新民报上照前次的方式刊出。

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新华日报对新民报是十分关照的。如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时,中央社发了歪曲事实的消息。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即和采访主任石西民等到新民报编辑部,向报社同人悲愤地叙述了事变的真实情况,使在场的人都明白事实,深表愤慨,从而对国民党的宣传有所警惕和抵制。

在新华日报和新民报报际的联系上,新华日报对新民报的基本看法是“友军”。在对新民报人的看法上,据说有人认为新民报的一些知识分子有“改良主义”思想,而石西民则认为



是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是可以转变的，是可以和共产党共事的。

喜相逢，青老两代巧沟通

抗战胜利后，新民报又在上海创办了《新民报(晚刊)》，主持人就是重庆新民报来的主笔赵超构。全国解放后，1955年，石西民又调来上海任市委宣传部长，书记处书记，领导上海的宣传工作。新民报当然直接受到他的领导，石西民和赵超构等重庆时期的一些老友，又以新的关系“喜相逢”了。1956年期间，新民报积极探索如何办好一张社会主义晚报的问题，并从各方面多作试验。报社同人在版面设计、稿件安排上容易产生不同观点，有时对事对人也会发生一些分歧，如在稿件处理上一部分青年编辑、记者就曾与“老报人”发生过争执，影响报纸编辑工作上的正常探索。石西民十分关心报社的情况，一再派干部到报社加强工作，并对新民报的工作多次作出具体指示。

他认为报社主要的负责人(以赵超构为代表)不但是办报的行家，也是党的可以信赖的朋友，所以报纸的编辑工作应信任他们负责主持。在编辑方法上的探讨、试验，应该多多尊重报社负责人的意见。为此他曾亲自和年轻同志进行座谈、讲话，说明这一观点。同时，也亲自对老同志做工作进行解释，指出青年人如有偏激之处，应是可以谅解的。他说：“我们不也是从青年过来的？”从而说服和解决了青老两代人间的暂时误解。许多年过去了，迄今许多同志都还念念不忘石西民对这些“风波”的正确处理和说服教育工作。

其实，石西民对于新民报的老报人们，也是爱护备至的。



他一方面尊重老同志，一方面也很严肃地进行保护式的帮助。比如，他十分赞赏林放（赵超构）的文章，但也不忽视它的论点偶有片面和过激之处。如看到林放有篇因小汽车溅水使得路人受害而发表的文章中有过激言辞时，石即请朋友带信给赵，请赵注意不要过分以“布衣”自居。

报社一位记者，在1957年“鸣放”时，因领会领导上的讲话精神有误，去杭州采访报道了该地文艺界“鸣放”的情况，石西民得知后，即严肃责问他：“谁叫你去管他们的事？”表示了对此举的担心，因为这时已是“反右”前夕。

林放说：“我们同尝过新闻工作的甘苦”

对于晚报打算搞批评性的报道，他告诫要重视两条原则：一、群众需要的；二、政府有可能办得到的。对报纸在批评稿的掌握上，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6年冬新民报社内事情较多，经赵超构向石一再要求，市委宣传部曾多次派干部进入新民报工作，我也是于此时被决定调入的一个。当时我在市委文艺工作部工作，由于从未有过报纸工作的经验，听到“调令”后颇感紧张，曾表示不想前往。石西民即找我去谈话，指出搞好宣传工作和搞好新民报这张报纸的意义。我申述我缺少报纸工作经验。他却说：“搞搞就会了”。那时政治空气很严峻，我坦率地说：“我这个人很容易偏‘右’”，想提醒他不要让我去一个民间报社工作。他却坦率地说，“自己知道就行了”。我的两条“理由”都无法改变他的主意，为此再也难以“申辩”了。就这样，我于1957年6月进入新民报以迄于今。



新民报历史较长,应该说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但解放以后,一切都是新的,需要探索新的办报方法,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所以一再作各种试验和探索。1956年前后,报社内的思想和改版试验都比较活跃一些,有不少创新和收获。这一时期,对于创造新民报新的形式和内容是个重要的时刻。对于发扬赵超构同志的办好社会主义晚报的想法,也是个重要阶段。他的一些办好晚报的原则,也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和试行的。后来赵超构同志回忆说:“正因为石西民同志政治上强,又是办报行家和思想宽松,所以在新民报摸索办报道路中,我们思路也比较宽松。”这恐怕是以赵超构同志为代表的新民报人,对他的最深沉的记忆。

石西民同志和新民报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不平常:同行、朋友,又是战友以至领导,这都在他和赵超构的交往和友谊中体现出来。石西民生前曾选编出版了一本文集《时代鸿爪》,他请为此书作序的就是林放(赵超构)。林放序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够见到西民同志把他从事新闻作品的作品编辑出版,在我是非常高兴的事情,高兴是因为我们是同行同业,都尝过新闻工作的甘苦。”说明他们是以通常的同行朋友之情进行交往的,而后又进入战友的境界。按一般习惯讲来,石西民是个“地位”不低的人,他的文集却愿意请老朋友林放写序,也可见他对友情的重视,情意是真挚的。通过赵超构,我们又能体会到石西民对新民报的真挚情义,怪不得新民报人也会如此以真挚的感情忆念着他。

(原载上海《新闻记者》1996年第5期)



“简易谦和”石西民

蒋文杰

石西民的文集《时代鸿爪》中有林放写的序。林放说石西民是一个“简易谦和”的人。这是一句言简而义丰的话。

1956年是言论活跃的时期。林放的随笔写得有个性、有见解、有锋芒、有文采、有风趣，很惹读者喜爱。也引起一些人注意。连笔名也有人在琢磨。有一次，石西民问我：何以取名林放？我说：林放的出处来自《论语》。《论语》中的林放是个知礼的人，别无深意存焉。

最让石西民操心的是这件事：他听到的一些意见，要不要传达给林放？怎样传达给林放。他反复考虑，觉得通气的好处大，可以防止林放兴头高，纵笔写，闯出祸来。不过，由他出面约林放来谈话，一是不及时，二是气氛总不免有点严肃。于是，我到晚报走走时，常常顺便约林放上湖心亭饮茶，或到一家小饭馆吃一顿。茶余酒后，东拉西扯之中，用自己的语言讲他人的意见。我掌握一条原则，只说具体的意见，不传上纲上线的话。我记得那句“不要以江南布衣自居”的话就没有讲。

石西民保护林放，不仅仅是一个关照老朋友的问题。他同我讲“私房话”时说过，《新民报》中，浦熙修、赵超构只是组织上没有入党而已，听党的话，和党员一样。我们要帮一把，做几



个老知识分子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标本出来。

老子说：“上善若水”。石西民其水乎？

（原载上海《新民晚报》1996年5月11日）



他为知识分子尽了心

——悼石西民同志

荆位祜

石西民同志在1987年10月17日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就在几个月前，我有机会去他北京寓所探望，当谈到当年他在上海工作中是如何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时，他的精神顿然兴奋起来，似乎已经没有重病在身。他自豪地说，当年他和知识分子之间，总的可以说是“心心相印”的。那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不想这竟是永别了。

谈起石西民同志，上海宣传文教界相当多的同志都流露出深切怀念之情。石西民同志的夫人吴伟同志告诉我，上海党内外的同志给她家发去的唁电唁函数字居各地之首，许多函电感情真挚，催人泪下。这不仅因为他在上海主持宣传文教工作期间事业建树卓著，特别是他在这十年间在尊重人才、爱护知识分子方面花了最大的心血。当党的路线正确、社会气氛良好时，他尽心尽力使知识分子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而当“左”的思潮抬头、政治空气紧张时，他又想方设法保护一批身处逆境的知名之士。他深深懂得，上海宣传文教事业的繁荣发展，是离不开广大知识分子的。

石西民同志是1955年调到上海工作的。开始担任市委宣



传部部长，以后任市委候补书记、书记，还兼了一段华东局宣传部长。正是在他来上海这一年的冬天，中央提出了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充分动员和发挥他们作用的方针。接着，于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全国性的大型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周恩来同志就知识分子问题作了系统的报告。会后，作为上海知识分子问题领导小组实际负责人的石西民在市委领导下，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结合上海实际贯彻中央会议精神，做了扎扎实实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对于中央所强调的，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必须对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和信任，给以应得的支持和帮助，石西民同志是有深切体会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石西民作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的领导成员之一，在与反对抗日、反对民主的敌特势力的斗争中，就团结了一批知识界的朋友。在解放初期南京工作的几年中，他又以真诚的、与人为善的态度，团结、教育、争取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知名人士，提高了觉悟，热爱新中国，心情舒畅地向党靠拢。石西民和这些上层人物既是朋友之间的交往，又有政治上思想上的帮助引导；而他们对石西民既在政治上尊重，又愿意谈平时不轻易表露的“知心话”。有位上层知识分子甚至把她年轻时的恋爱经历也无拘无束地对石西民同志谈了。石西民同志到上海工作不久，又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了一批能真诚相处的知识界朋友。事实证明，中央对知识分子进步状况的估价、认为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可是，各个单位还有不少干部没有看到这种变化，也看不到知识分子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愈益重要，因而没有主动地积极



地去密切和知识分子的联系,加强和改善这方面的领导。

针对这种状况,石西民同志强调提出,贯彻中央的精神,一定要加强党内的思想工作,统一全党的认识。而要学习中央精神,提高认识,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因此,石西民同志一开始就着重要求全市各系统的领导部门下去调查,不仅作面上的调查,而且作专题和典型调查。他分系统地听汇报,并且多次召开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从另一侧面直接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大量的调查使各有关方面对本市、本系统、本单位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生活状况,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以及党员、干部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和问题,有了具体的了解,对周恩来同志的报告有了比较实在的体会,从而上下之间增加了共同的语言。尤其是大家从调查中听到、看到了令人警觉的问题:广大知识分子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可是有些党员、干部却把知识分子看作外人,有了科研、技术革新成果,只归功于工人,而技术人员则似乎无份。有些细小的具体问题,会被不加分析地上纲为政治问题,如认为某工程师“留学外国七年无人证明”,就不管现实表现如何不信任;甚至某人曾留过仁丹胡子,某人曾用英文写信,也作为“政治问题”怀疑。有的认为,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不符合工农路线”而不加考虑。社会上民间剧团有五六千演员,有两三年时间竟没有发展过一个党员,其中上千人要求入团,也只吸收了寥寥数人。国家剧团发展党员也极少。其他单位也有类似情况。某高校一位知识分子政治上靠拢党,工作上埋头苦干,只因为开会发言中心不突出,口辞不大清楚,就不考虑发展。甚至毛泽东同志请上影厂一位演员吃饭,周围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总之,对知识分子看缺点多,看优点少;挑毛病多,看



成绩少,存在隔阂。另外,有一批知识分子用非所长,浪费人才。如有位曾担任教授五年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却在银行催办到期贷款;有位天文学家在点钞票;某高校有几十位教授、讲师无课可开,闲着无事,等等。调查中也听到党内外知识分子对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是非常关心、深受鼓舞的。通过调查,许多党员、干部受到了比较深刻的教育,看到我们国家今天的兴旺发展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今后的建设更加需要知识和人才,同时检查自己的保守落后思想和宗派情绪。有的说,自己参加革命多年了,总以为打日本用的是土炮,1949年渡江用的是木船,发挥不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无所谓,对尊重知识分子、照顾他们的生活,思想不通,这种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有些工农出身的同志,形容过去和知识分子共同工作是“工作愁煞,星期日闷煞,接触知识分子怕煞”,现在表示要振作精神,提高文化水平。在这样的教育、发动的基础上,市委召开万人大会传达贯彻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石西民同志等并且提出,组织一批原来知识分子工作做得好的单位和原来认识不足后来有了较大转变的同志,在会上交流经验,现身说法;然后组织小组讨论,使党内同志的认识水平进一步提高。

党内思想问题的初步解决,还需要通过工作实践来巩固。石西民同志在市委的重视和关心下,组织动员多方面的力量,解决了大量的实际问题。比如,一批用非所长的知识分子调整到了比较适当的岗位,有些是基本上闲散的教师、医生以至有专长的工商界人士也得到了适当安排,有的甚至被越级提拔担任比较重要的领导工作。又如,一批专家学者适当减少了兼职、频繁重复的会议和行政事务的负担,有了较多的时间精力



用于业务工作和研究工作,有的并且配备了助手。又如,相当一批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其中有一些是石西民同志亲自提名,由所在单位党组织考察后进行发展的,这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又如,在各方面努力下,有关单位修改了保密制度和规定,像有些船舶设计工程师不能到造船厂去检查察看按自己的设计所制造的船舶,或者要去也需要有人事干部带着本人档案材料陪同,有些科学研究人员不能到图书馆去查阅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外文资料之类的怪现象就大大减少了。为自然科学研究服务的科学仪器公司和为文艺界提供学术交流、增进友谊活动场所的“文艺会堂”,也在石西民同志的支持和倡议下新建和创办了起来。与此同时,在全市排出了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正副主任医师、高级工程师、著名作家艺术家等数百名高级知识分子的名单并动员全市各部门要关心他们。当时,市的房管部门第一次就挤出60处较好的住房,改善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的居住条件;卫生部门为这批高级知识分子提供了较好的医疗条件;商业部门还在副食品供应上为他们提供优先服务。通过这许多实际工作,以及以后继续进行的工作,不仅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党内的认识水平也有了大的进步。

从1955年底起的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工作可以说是热气腾腾的,而石西民对此却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说,这一段虽然做了不少工作,报纸上也宣传了,似乎都很好,其实这方面工作才刚刚开始,已经解决的还只是浮在面上的问题,仍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如果我们满足于轰一阵就过去,那么不久就会大体恢复到原来的状况。所以,要继续抓紧贯彻,不能松下来。事实上,石西民同志此后在上海工作的岁月里,也就是



这样身体力行的。有关知识分子的工作，他既有长远设想，又有近期目标；既有开创精神，又有扎实措施。比如，在他的关心和领导下，一些作家、艺术家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影片、戏剧、音乐、舞蹈等作品，在建国十周年前后五彩缤纷地呈现在人民面前。其中如京剧《杨门女将》、昆剧《琼花》等，都是他直接关心，多次参加讨论修改后演出的，曾饮誉海内外。他十分重视文艺队伍的建设和艺术人才的培养。为创办上海舞蹈学校、电影专科学校和积极支持上海戏曲学校，他有时亲自参与筹建班子、物色教员、争取上级拨款以至选校址等具体工作。这些学校后来为上海和华东文艺团体输送了大批骨干，培养出大批著名艺术家。又如，1957年毛泽东同志把重新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上海，市委指定石西民主管这项工作。为编纂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书，需要调动全国各地几千名专家学者，工作十分浩繁，他领导大家克服困难，使《辞海》（未定稿）在较短时间内得以问世。

在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过程中，当然不会是没有曲折的。1957年以后，“左”的思想逐渐抬头，而石西民同志仍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努力正确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反右派运动中，他反对在演员中划右派，他说，把演员打成右派，叫他（她）以后还怎样上台演戏、拍电影？与其说他们政治上有问题，还不如说有个人主义，有个人主义教育帮助就是了。对于新闻界的一些言论，他反对简单地地下结论，他说，新闻界的一些人，不要只看他一时一言一行，要看看他一贯的表现，更要看看他现在的态度是否已经转变。总之，他千方百计保护了一些人。某个学校原来要划较多的右派，主管同志感到为难，来找石西民同志。石毅然向市委领导面陈意见，得到采



纳,使一批知识分子免遭打击。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党内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如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那就是对抗性矛盾了,石西民同志又尽力使一些同志问题的分量降下来,使矛盾性质不要“转化”。

当然,那个年头,“左”的东西一点也不执行是很困难的。对有的知识分子尽管石西民想保护,也未必都能保得住。特别是“文革”时期,他自己也挨了沉重的打击,被关长达九年。对当年在他领导下受过委屈的同志,他深感内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初次来上海治病,就急不可待地到这些同志家里去,表示歉意,并且胸怀坦荡地谈自己的教训,使这些同志深受感动。有一位在1957年受过委屈的老报人,原来对石西民同志很有意见,以为是他整了自己。“四人帮”倒台后遇到石西民,却自己作说明道,“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什么老底都翻出来了,是谁要批判的,又是谁充当了“黑保护伞”,清清楚楚,这才知道事实非原来所想,你(指石西民同志)并不是那种人,现在对你一点意见也没有了。

石西民同志的一生,是和知识分子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本来,他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久经锻炼后成为一名成熟的党的领导干部,所以最善于以一片诚心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引导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就是大家特别怀念他的缘故吧!如今,党和国家已经把知识分子问题摆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已逐渐蔚然成风,这是可以告慰石西民同志于九泉之下的。

(本文在《解放日报》1987年11月22日
发表时曾有删节。现据作者原稿排印)



石西民同志在上海

吴云溥

斗换星移，日月不居。石西民同志谢世匆匆一周年了，虽然如此，他的面影总是在我的脑际徘徊，好像他并不曾离去似的。

1955年，他奉调上海，主持宣教工作，历时10年。我在他领导之下工作，就在这个时期。随着岁月的流逝，说实在话，他在我的心目中，作为领导者的形象已经逐渐淡化，而作为一位可以与之倾心相谈的师长形象则逐渐增大了。到了他的暮年，我每次晋京去探望他，总要被留住喝上两盅，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往往微醺而归。“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是时也，这一类“谬托知己”的妄念也会在心头涌起，历久不息。

西民同志30年代就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了。一次在随他出差的列车上，我曾听他娓娓地说及青年时代在上海所过的穷困生活。那时，他每日三餐差不多都是在小摊头上吃的。花上几个铜板，吃一碗盖浇饭，就是美味了。他后来到《申报周刊》工作，也是事出偶然。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有关中国交通运输事业的文章，投寄《申报周刊》，为主编俞颂华先生所赏识，就被聘当了编辑。那次车厢夜话，他对在上海从事的地下革命活动，只字未提。及至1987年10月他去世不久，我正好去京，向他的夫人吴伟同志慰问，他女儿石晓华拿出了一张照片，才



使我大吃一惊：原来在一二九运动以前，他早就是一位青年共产党人了。“一二九”以后，他站在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上的人群中，激昂慷慨地发表演说，号召民众抗日救亡。一个人的生平有这一类的业迹，是足以炫耀的。可是西民同志生前，从未在人面前提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尽管如此，西民同志一生风范，特别是解放以后他在上海的岁月，在上海知识界已有口皆碑了。

保护“四大总编辑”

西民同志在上海的10年，是左风日炽的10年。同其他人一样，他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这是不能苛求的。也许是知识分子的气质使然，我总感到，他从心底里非常爱护知识分子。最令人感奋的一件事是，在“反右”扩大化的颠狂浪峰中，他竟敢于挺身而出，“保”下了上海“四大总编辑”。他们是《文汇报》党组书记兼副总编辑钦本立、副总编辑唐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冯岗，《劳动报》总编辑马达。按照当时的“规格”，把他们统统打成“右派”，好像也是“天经地义”。但是，他们还是被“保”下来了——当然不是西民同志一个人的作用，但作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他个人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也许是为了交差，当时对这“四大总编辑”在党内分别给予一定处分了事。现在看来，这类处分也是错误的，但在那种环境下，这样做已是很不容易了。“四大总编辑”受处分以后，情绪之低沉，完全可以想见。西民同志并未忘怀他们，曾多次要我同他们保持联系。不久，《解放》杂志筹备创刊，西民同志兼任总编辑，他对我说，想把这四位同志调至《解放》杂志工作，让他们换一个环境。要



我先同他们商谈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如果同意,他将亲自找他们谈话。当我向“四大总编辑”转告西民同志的想法以后,他们一时瞠目不知所答,楞了一会才连连表示同意。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他们那种始而惊讶、继而喜悦的面部表情。“在上海历任宣传部长中,比较了解知识分子的,西民同志当是其中突出的一位。”这是两年前,上海一家报纸的老总对我说的,它反映了上海知识界对西民同志的评价。

哀民生之多艰

我常常这样想:中国的知识分子,许多人都受到过儒家或者老庄的影响,但受到屈原影响的,也有不少。他们爱国爱民,执着追求,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思想有了升华,那种“哀民生之多艰”、“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品格更其坚定了。在西民同志身上,我常常想到屈原的为人。

1958年,各地处在所谓“大跃进”的热潮中。西民同志和许多人一样,也是想诚心诚意歌颂“大跃进”的。当时他决定到浙江、广东去考察,临行前还关照我,好好采访一下,回上海后写些通讯,歌颂“大跃进”。可是,去到这些地方一看,却是一片生产萎缩、供应紧张、民有饥色的景象。回沪的路上,我问他:这次浙江、广东之行要写吗?他双眉紧锁,对我说,还是由他向市委口头汇报为好,公开报道很难写,不要写了。我知道他的意思,如果作违心之论,还不如不写的好。这真使我如释重负。

1961年,为了克服三年严重困难,决定精简一批城市职工,动员他们回乡投亲靠友。当时大批职工响应党的召唤,回到了农村。但并不是每一个人有亲可投,有友可靠的。西民同



志当时已是市委书记处的候补书记，他知道以后，感慨地说，现在每户人家口粮都是定量供应，投亲靠友，说说容易，米缸里没有米，怎么投靠？不久，上海开始每年动员一批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建设。一大批上海青年，经过 20 多年的磨炼，今天已经扎根边疆，茁壮成长了。可是在当时，他们奔赴新疆的前夜，是既有烈烈轰轰的口号，也有忧心忡忡的困惑的。每年的动员报告，差不多都要西民同志去做。记得是 1964 年，他又要做报告了。正当同我谈起报告内容之际，忽然间，他口中冒出了林则徐发配新疆后写的两句诗：“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这是《送麟筠赐环东归》中的两句，我当时不解其意，直觉上感到的是他对上海青年去这么遥远的地方，思想上有些困惑是可以理解的，不应该在报告中责难他们。后来，回想起来，当时“阶级斗争为纲”正甚嚣尘上，他口中冒出这两句诗，也许还有更深一层的忧国忧民的思虑在吧。

（原载《上海滩》1988 年第 10 期）



一张40年前照片引起的思念

——石西民同志二三事

丁景唐

四月的一天，我到瑞金宾馆看望来自远方的朋友，约定翌日找几位半个世纪前的老友叙谈后，我就告辞了。我没有走出大门，而弯到北边瑞园的大草坪。40年前，瑞园与宾馆之间有堵围墙隔着，虽有小门可通，我们在瑞园办事的机关干部是不过围墙的。园中静寂，四周无人。我伫立在一泓池水的小木桥边，望着北边修缮一新的四层主楼和西侧的三层辅屋，我沉思着。

多么熟悉，却又是陌生。这是40年前，我们机关的办公楼宇。跑近前去，我们以前办公楼的大门前竖立了一方商行的牌碑，表明它已租赁出去做了办公楼。

人间正道是沧桑。

回家，我好不容易从杂乱的零星照片中，找出40年前我们几位机关干部和石西民同志在瑞园大草坪合影的小照。照片小小的，35mm，但蕴藏着重重的情谊。照片上自左而右，为小罗、小陶、丁景唐、石西民、蒋文杰、周天、杨瑾琮。今天重睹昔日风貌，音容宛在。虽然，照片中西民同志与瑾琮同志已离开人间，小陶是我们新闻出版处的小秘书，她在60年代初随



夫君调安徽工作，小罗(女)后来调书店工作，也已退休。而老蒋、周天和我还时有见面。赵超构(林放)同志在为石西民同志论著《时代鸿爪》的序文中，甚赞“西民同志为人简易谦和”，老蒋(虞丹)即以“简易谦和”为题，写了纪念文章。这张摄于1956年春天瑞园的留影，也很能再现西民同志为人简易谦和的形象，而受到我们这些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机关干部的爱敬。他在工作上是我们的领导同志，在日常生活中是我们的兄长，是可以在工作之外随便谈谈的。这一点，对我这个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感触尤深。我长期在地下工作中，在党内同志之间总有一种同志加兄弟(姐妹)的崇高的亲密感情，而在机关日子久了，就感到有些干部并非如此。我在一篇回忆夏衍同志的文章中，曾写到我们在机关中与领导同志都是工作之间的关系，没有工作以外的交往。而不在一个机关工作之后，也只有夏衍、石西民同志与我有一些书信来往。我在同一个机关工作了11年，也只同石西民同志1956年春留下了唯一的一张照片。当然，这张照片也是束纫秋同志要为我们几个人择大草坪留影，碰巧西民同志也踱到大草坪上活动体肢，我们邀他合影，而并非事先到办公室去请他下楼特地拍摄的。照片上人物形象都很自然，衣着朴素，精神饱满，西民同志穿着绒线衫，随和得很。机关上午在中间有一点休息时间，我们新闻出版处的干部是陆续下楼走到大草坪来活动的。尚有许鲁野、周珂同志下来较迟，我们在甬道边的丛树前留下一影。还有吴云溥和徐哨同志可能仍在办公或外出工作，没有入照。

1956年充满春天的阳光与温暖。

一月，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门会议，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首次



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明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任务要求。毛泽东同志也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全国出现“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四月,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重大方针。五月,陆定一同志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会上,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

在石西民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机关干部围绕知识分子工作和“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各就分工范围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参与议论,民主风气大为发扬。早两年,从档案中,机关干部为我复印了一份资料,这是 1956 年上半年石西民同志嘱我与应为同志到傅雷先生寓所,听取他对知识分子工作问题和“双百”方针意见后写的汇报材料。西民同志对傅雷的意见很为重视,曾将汇报材料印发大家参考。1956 年这一年,西民同志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工作和“双百”方针做了许多工作。根据荆位祐同志帮我提供的 1956 年 3 月 11 日《解放日报》关于市委召开全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由市委领导传达,并部署贯彻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接着由石西民同志作了专题报告。现在,我回忆不起报告的具体内容,但报告上留下的要点,包括上海知识分子工作的基本情况,关于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充分发挥工作潜力的问题,以及根据知识分子特点来进行工作的问题等等,都是西民同志和其他同志结合中央精神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经过他本人深思熟虑后归纳成文的。西民同志与上海一些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时有交往。30 年代,抗战时期,解放战争初期,



他在上海《申报》、武汉、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采访部主任、社委，与新闻界、文化界人士有广泛的联系。他调上海工作之后，除以市委宣传部名义召开党内外社长、总编会议之外，还用社会活动方式，由《解放日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等轮流作东，与更多的新闻界人士交谈，了解情况，吸取意见，传达意图，推动工作，大家心情比较舒畅，办报较活泼有生气，版面上也反映出“双百”方针的贯彻。西民同志同样十分关心出版工作。他经常亲自布置我与许鲁野同志集中力量，审读上海的主要出版物，写出综合材料，分析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也是在1956年，他在年初部务会议上又提出召开上海市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的要求，让我们深入上海几家出版社与社长、总编谈话，研究选题计划，召开编辑座谈会，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向他与陈冰、白彦同志汇报，然后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明确会议的任务、规模、内容要点，就放手让分工这项工作的干部起草报告和文件。上海市第一次出版会议，自1956年3月底至4月初，开了五天，出席大会的不仅有各出版社、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还有其他系统党委和区委宣传部、群众团体、文教系统的代表，共1344人。会议讨论了石西民同志的报告和上海十家出版社的方针、专业范围、改进工作的具体办法（草稿）。经过集中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了改进办法，4月20日再由石西民同志作会议总结，明确上海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改善与加强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以及改进与作者关系，培养干部，改善编辑、校对、发行工作等具体规划。由石西民同志亲自主持的上海市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对改进上海出版工作起了重要的、长远的作用。而西民同志这种善于将党的方针政策密切结合实际加以贯彻的领导思



想,善于发动大家深入下层,集中群众智慧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使我们这些在他领导下的干部深受教育和鼓舞。

我是在石西民同志直接与间接领导下近 10 年的一个老兵,现在只先从一张 40 年前的照片引起对当年情景的思念,写下这些对西民同志的敬意和怀念之情。西民同志活在我们心中,正如我们从 40 年前这张在大草坪上的合影,见到他微笑着,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下,和我们平等、亲密地站在一起……



记石西民一事

曾彦修

参加石西民同志的遗体告别会，鞠躬时，我忍不住流了泪。这是为一个抗着左倾恶浪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而工作的可敬的人流的泪。这要从编辑《辞海》一书说起。

《辞海》是解放后撰写的第一部大中型百科全书（当时名为修订，实为重编）。此书如果没有石西民同志的具体领导，在那个左倾恶浪淹没一切的空气中编出来的书，不知会是什么样子。

我于1960年9月由京到上海辞海编辑所报到，此后即在那里做一名“不管部”编辑。初到时，正碰上刚刚出版的大量油印辞条稿。经过询问，才知道这是用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群众大会战”方式由各大学的一些同学急急忙忙写出的“新事物”。我翻了一下，不禁暗暗叫苦：我的天！这一大堆东西如何处理呢？这些东西能印出来吗？记得我只敢同该所副总编辑陈落等二三同志表示过看法，因为他们与我同感，所以才敢谈谈。

这部稿子，除了单字的解释一开始就是由傅东华先生包干并有较好的基础之外，其余大多是用入海战术打速决战（例如“连战七天七夜”之类）的方式弄出来的。编写的指导方针是一位教授建议的，大约叫做“知识性、群众性、革命性”吧。既然强调了群众性与革命性，那么知识性便不能不受到严重冲击



了。油印初稿中，穿靴、戴帽、大批判、插标签、少知识等极左的毛病，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部分的辞条中特别明显，成了这部草稿的致命伤。当然这些死症是当时的时代背景造成的，不能由某一个人或某些人负责。

这种情况汇报到石西民同志那里，当然他也翻阅了一些稿件，作为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具体负责领导重编辞海的人看来，他是毅然否定了这些用人海战术制造出来的成吨的产品的，也否定了上述那三条指导原则。他在1961年春集中二三百位专家修改辞海草稿（实为重写）时，十分正确地重新提出撰写辞海释文的三项原则，它们是：知识性、正面性、稳定性；并同时强调释文的内容和文字都要注意“四至”分明，不要“越界筑路”。

毫无疑问，他提出的这套指导方针是十分正确的，至少可以适用于编写一切辞书和工具书。石西民同志并不是一位辞书专家（但他抗日战争前在上海参加编纂过《中国经济年报》、《申报年鉴》等书，也是主要靠材料说话的），在那长时期左倾气氛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能抗住狂风暴雨而提出这一套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很强的辞书编写方针来，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反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尚品质，从而表现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操持。这既要有反对左倾狂潮的勇气，又要有相当高的思想与理论水平才能提出这一系列高度概括而又正确的方针来。“知识性”一点当然谁也不敢公开排斥，但“正面性、稳定性”，同当时的极左空气却极不协调，而且是尖锐对立的。所以，石西民的勇气是可敬的。这个所谓“后三性”的提出，并不是一个技术性或仅仅关系一本书的编辑方针的问题，而是沙漠中的绿洲，狂热中的清醒和左倾压力下的一个公然的反



抗。如果看不到这些，我们就很难了解石西民同志优秀品质中最优秀的东西。编出辞海固然是一个不小的成绩，但我觉得更值得纪念的是石西民提出的这些编写原则，它们是一切著书立说、写文章以至为人处事都应该遵守的原则。当然，一切辞书与工具书的撰写与编辑工作者更不应该忘记这位老革命家的金玉良言。一个马克思主义没有学通的人，是提不出这些合情合理而又没有什么漂亮唬人词句的意见的。

至于他为人敦厚诚恳、平易近人，是有口皆碑的，我不多说。他是老党员领导干部中善于尊重、团结、使用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我曾从大公报、新民晚报的一些同志的口中听到过对他在重庆新华日报任采访部主任时的赞美，都说他善于团结、教育和提高其他报刊的记者，和蔼可亲，是他们中的老大哥，无形中成了进步和中间报纸中的“记者头”，唯他马首是瞻，并说：“党通过这样的人来接近我们，自然而然就起了领导作用”。60年代后我在上海时，就听说过一些有才干的知识分子就是通过石西民的手从青海和北大荒的劳改场所调回上海工作的。

上海党内的知识分子是永远不会减轻对张春桥这样的假革命真反革命的人物的仇恨和鄙视的；同样，他们也会为石西民同志的逝世而感到悲痛和永远的怀念。正是张春桥这类反革命分子却使石西民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坐了九年监狱。这类惨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志不忘。

（原载《瞭望》周刊第51期，1987年12月21日出版）



俯仰之间

——关于石西民同志的片段回忆

柯 灵

石西民同志谢世后，吴伟同志曾问我能否写点悼念文字。吴伟是热心人，我和她在电影岗位上共事有年，很理解她的悲痛心情，但一直迁延未能动笔，对她很觉歉然。忙，是个原因，还有个极大的心理障碍：我近年来很有些畏避写悼念名人的文章。古人谀墓，是借自己的名声地位卖钱，并非对墓中人有什么公谊私交；今人写悼文，有的志在高攀以自重，不是真要寄托哀思，现在竟有在悼念文章中发泄私怨，含沙射影，诋攻别人的！更是旷古绝今的大发明，对已逝者是最大的亵渎和不敬，也是其本人无意中的一次人格展览。

西民同志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和文教书记，他和我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往来不多，很难谬托知己，说有什么相知之情；但在有限的接触中，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足以看出他为人的宽厚与正直。

“反右”这一场人为的政治脱轨，给知识分子带来罕见的灾难，傅雷也不能幸免。当时宣传部分管文艺的周而复同志，和我是熟人，运动初期，傅雷的挚友、名画家庞薰琴先在北京遭批判；傅雷受到牵连，指他写给庞薰琴的一封信是“煽风点



火”。一时人心惶惶，唯恐惹火烧身，谁也不敢对这类是非轻易表态。而复却对我断然表示，这个指责不能成立，傅雷没有问题。由此可知，宣传部没有把傅雷划为问题人物。但后来傅雷终于在劫难逃。几次批判会之后，傅雷思想不通，声明听候处理，自此拒绝出席。运动来势凶猛，有如野火燎原，雷霆压顶，敢于这样公然表示反抗的，只有一个傅雷。按照当时的形势，这种以卵击石的尝试，完全可以招致斗争升级，对他实行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看来傅雷是横了心的，当局却似乎对他特别表示宽容，因此形成的僵局，拖延半年有余，运动已成尾声，死结还没有解开。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石西民、周而复两位在暗中保他。他们本身的处境也很困难，因为他们的顶头上司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这位“好学生”倚为左右手的是张春桥。以西民同志所处的地位，不便公开出面，他通过周而复和我私下商量，明确说明，他们要保傅雷过关，央我劝说傅雷作一检查，了此一重公案。检查的原则是分析思想错误而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但结果傅雷还是戴上了“右派”帽子。我是局外人，无法知道其中的细情曲折，但石、周回天无力，终于没有保住傅雷，则是不移的事实。

1961年冬，我和陈荒煤、郑君里两位到岭南潮汕一带走了一圈，和君里同车回上海，已经是12月30日了。那正是“大跃进”之后的急景凋年，民生疲惫，濒于饥馑，我们沿路采购了些鱿鱼干之类的海产，聊以卒岁。不想经卧车里的暖气一烘，腥气弥漫，如入鲍鱼之肆。无巧不巧，石西民这位文教书记在同一趟车上。君里和我都心怀惴惴，唯恐被他发见秘密。因为在“左”气冲天的年月，知识分子已经是“精神贵族”的同义词，这正好是“生活特殊”，不能和群众共渡难关的证据。而西民同



志终于找来了。他仿佛没有闻到触鼻的腥味,只顾和我们谈天。不知怎么,一下就谈到了傅雷,有几句话我记得很清楚,“这样的翻译家应当珍惜!”他赞叹地说:“他翻译的书,拿起来就放不下手;很多人的翻译,就是读不下去,这没有办法!”他说话不是那么豪爽,显然还有些话没有说。当时我很想问他,把傅雷终于打成“右派”(1959年已经“摘帽”),到底是怎么回事?话到口边,又咽下去了。我和他不够熟悉,不便推心置腹。

我们在火车上迎来了元旦。车过钱塘江大桥,君里望着矗立江边的六和塔,忽然牵动记忆,指着高塔笑说:“阿丹他们就是在这儿结婚的。”1936年,赵丹和叶露茜,唐纳和蓝苹——也就是后来的江青,顾而已和杜小鹃,三鹃对六和,在六和塔下同时结婚,是轰动一时的艺坛珍闻。君里和他们谊属知交,触景生情,是很自然的。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五年以后,这段过去的友情,竟成为江青灭口的契机,使君里死于非命。世事竟是这样的不可究诘!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是“大批判开路”,《不夜城》受到了全国性批判。当全国工商业公私合营进入高潮,大事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时候,中央统战部和文化部给了我《不夜城》的创作任务,待影片拍摄完成,局势就像夏季善变的天气,说变就变,霎时间刮起了“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反右”风暴。我因此也就成了“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的大罪人。西民同志以上海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身份,给文化部打电话,说“《不夜城》是敲锣打鼓的时候写的,不要批了罢!”

这句话没有起作用,但我一直衷心感激。也决不可低估了这句话的分量。在昏天黑地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说一句公道话,是需要足够的正气和勇气的。文艺领域一贯强调党的领



导，作家凡有所作，莫非是领导同志麾下的出品。但领导成则居功，败则诿过，出了问题，首先站出来批判，表示立场正确，而毫不感觉于心有愧，已成惯例。肯代作者分担一点风险的，真可以算得凤毛麟角。而西民同志到底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包庇大毒草《不夜城》。

1967年，一个夏天的晚上，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10万人的斗争大会。我平生碌碌，竟荣幸地成为这次隆重大会的主角。那时我已是监狱里的囚徒，由武装法警押解到会。按照造反派精心编排的戏剧化程序，是先到后台待命，要等到前台唱够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大会提调高呼一声“押上来”，才在雷鸣般的“打倒”声中，低垂脑袋，反剪双手，由威风凛凛的造反小将簇拥登台受审。我到后台时，用眼角一瞥，只见本已调到北京当文化部副部长的西民同志，已被揪回上海，静坐一角，等候陪斗。我心里略感微温，同时不免负疚，“我虽不杀伯仁”，他总是受了我的连累。但我们彼此视若无睹。在政治运动中，人海苍茫，不论冤亲恩仇，一概视同陌路，是普遍的现象。接着永安百货公司的老板郭琳爽也押来了。因为他被乱点鸳鸯，硬派作我作品中的人物原型，每次《不夜城》批斗会，他都和我一起躬与其盛。缅想当年，庆祝对资改造的联欢会上，郭琳爽粉墨登场，现身说法，表示自己已经脱胎换骨，兴高采烈；新闻媒体也大肆张扬，奉他为资产阶级中勇于改造的英雄人物，谁知今天竟落得这个下场（可惜他现已去世，看不到“全民皆商”的盛世风光了）。我感到十分意外的是，西民同志看见郭老板，居然和颜悦色，点头打招呼。在这种场合，批斗对象大都神情麻木，表情功能萎缩，而感觉神经特别敏锐。西民同志的雍容，一



直鲜明地保留在我的记忆库存里。我当时想：他大概在这样的狼狈处境中，也没有忘记自己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身份，和对统战对象应有的礼貌，而没有顾及这个危险动作，完全有可能使他罪上加罪。

在批斗会上，轮到他在如吼的口号声中作交代，也只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他的确说过《不夜城》是敲锣打鼓的时候写的，建议不要批判。既不抵赖，也不加解释，没有诚惶诚恐表示悔罪——这是同样需要一点正气和勇气的。

根据经典的革命理论，阶级是以经济地位划分的，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划分就不那么山青水绿，界限分明了；改以政治划线，分为整人和挨整两大阶级，而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代号，倒也名正言顺，简单明了，切合实际需要。虽然这两大阶级常常互相转化，使人眼花缭乱，莫明其妙。每一次政治运动，对两大阶级都是灵魂的拷问，有如《西厢记》里的“拷红”。西民同志曾厕身于整人阶级，也一度沦为挨整阶级，都经住了严峻的考验。在人的世界里，无论把人群怎样分切，毕竟还有个公认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从这个标准来衡量，西民同志是可以俯仰无愧的。

1988年11月28日于北京旅次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1988年12月15日）



知音何在

——关于《傅雷致石西民书》

姚北桦

1988年夏秋之交，应石西民夫人吴伟之邀，赴京协助编辑《石西民新闻文集》一书，在西民同志生前工作的书室里，无意中发现了一封傅雷致石西民书。信，是用娟秀的字迹，端端正正地写在几张素笺上的。其时，这位57岁的著名文学翻译家，由于劳累过度，已经双目昏花，不得不口述，由他的夫人朱梅馥女士代笔。

这是一封诉苦的信；当然，也是一封求援的信。

现今的年轻人恐怕已经很难理解：像巴尔扎克这样的世界大文豪的作品，又是出自傅雷这样的名家译笔，何以在偌大的中国竟无处出版呢？即或一时不能出版，像傅雷这样著作等身、译著累累的知名学者，在60年代的新中国，怎么会“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了呢？难道他每月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么？要弄清这些问题并不难，只需重温一下历史。

写信日期是1965年10月26日。信发出后15天，《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出笼，10年“文革”的序幕正式揭开了。那时的中国大地，阴霾密布，妖风四起，姚文元之流磨刀霍霍，知识分子朝不保夕，人人自危。当时江青有句著名的口



号,叫作“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统统在被“打倒”之列。为傅雷所钟爱的巴尔扎克位列“封资修”榜首,自然难逃此厄运。试想,此情此景之下,又有哪一家出版社,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出版傅雷的译著呢?

初读此信时我也不解:像傅雷这样鼎鼎大名的专业作家,在上海作协能够没有一份较优厚的工资么?后来向傅先生的次子傅敏一打听,才知道确实分文无有。原来傅雷于解放初期由昆明回到上海时,婉言谢绝了组织上给他的“铁饭碗”,他决心自食其力,靠手中的一支笔,自己养活自己。开初那几年,稿酬较高,他又笔耕不辍,全家生活尚可维持。60年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稿酬愈降愈低,出版部门甚至取消了印数稿酬,于是傅雷入不敷出,全家生活陷入困境。特别严重的是,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几乎到了无法工作的地步;而费时数载翻译出来的作品(如《皮罗多》、《幻灭》等)又不能问世,这就彻底断绝了这位靠笔耕糊口的大翻译家的生活来源。贫病交加的傅雷,“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这才不得不向石西民伸出求援的手。据傅雷的挚友们介绍,傅雷是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柯灵在《怀傅雷》一文中曾这样形容他的亡友:“他身材颇长,神情又很严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另一位友人杨绛在回忆文章中也有类似的描写。那么,一只高傲、狷介的“云中鹤”,何以竟向当时位居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石西民发出了“哀鸣”呢?

我想,原因不外有二。一是确实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绝境。即使是“云中鹤”吧,也是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的。二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然也出于对石西民同志个人的



信任(他是把石西民当作党的代表看待的)。这后一点,也许是更为重要的。

从1955年至1965年,石西民在上海担任文教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达10年之久。在这10年之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他也和当时许多领导人一样,不可能完全不犯“左”的错误。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在平时能够和知识分子平等相处,以诚待人,因而在文学、艺术、新闻、教育各界结识了不少朋友;而且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关键时刻,他总是尽可能地保护一些可能保护下来的朋友,至少设法减轻一些对他们的伤害。石西民本人就是一个既有高度文化素养,又秉承中国人做人道德的知识分子,为人正直,待人宽厚。全国解放前,他曾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国统区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石西民深知:一个政党也和一个人一样,不能没有朋友,在野的时候需要朋友,成为执政党后更不能忘记朋友。晚年,他在一篇追述重庆时期《新华日报》艰苦斗争的文章中说:“我常常想,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才认识朋友的可贵,而当他忘记了朋友时,他实际上也就忘记了革命。”在上海工作期间,石西民也是这样对待傅雷的;所以傅雷在遇到严重困难时,才想到要向这位值得信赖的党的领导同志,发出呼救信号。

石、傅之间,谈不上有什么私交。石西民是到上海工作之后,才认识这位翻译家的。通过工作的接触,他不但高度评价傅雷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而且肯定傅雷是一个爱国的、逐步靠拢党的知识分子,因此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根本不相信傅雷会是什么“反党分子”,而尽力设法保护他过关。石西民曾请傅的一位老友去劝说傅雷,只要他承认“错



误”，检讨一番，即可免戴帽子。然而在做人上一丝不苟的傅雷，却宁可戴上“右派”帽子，也决不作言不由衷的所谓“深刻检讨”。此后，又相继发生了傅雷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由波兰出走英国事件，石西民顶住巨大压力，再次保护陷于更大困境的傅雷一家，免遭累卵之厄。石西民这种拔人于水火之中，敢于担戴是非的风骨，是爱憎分明的傅雷没齿难忘的。

石西民没有辜负朋友的信任。尽管此时他已调离上海，远在北京工作，在接到傅雷的来信后，他还是立即和上海联系，吁请有关方面，照顾傅雷一家的生活。在当时的情况下，自身亦岌岌可危的石西民，也只能做这么一点“相濡以沫”的事情。

直到晚年，石西民仍常常谈起傅雷，而且充满歉疚之情。1983年9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他深情地说：“我的错误多得很，比如把上海作协的傅雷同志打成右派。当时，他不肯检讨。我想，奇怪了，检讨两句，也不要花钱。我后来才懂得，知识分子没有廉价的检讨！他不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是不能硬让他检讨的。”又说：“过去我长期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天天与知识分子打交道，但实际上是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的。”与会同志听了西民同志的发言，无不动容，认为只有知识分子的“知音”，才能发出这番肺腑之言。

西民同志已辞世四载，展读这封《傅雷致石西民书》，不能不令人发出知音何在的浩叹！

（原载《上海滩》1992年第5期）



附：

傅雷致石西民书

西民部长座右：

近来文艺翻译困难重重，巴尔扎克作品除已译者外，其余大半与我国国情及读者需要多所抵触，而对马列主义毫无掌握，无法运用正确批评之人，缮写译序时，对读者所负责任更大；在此文化革命形势之下顾虑又愈多。且鄙见批评当以调查研究为第一步。巴尔扎克既为思想极复杂、面目众多、矛盾百出的作家，尤不能不先作一番掌握资料功夫；西方研究巴尔扎克之文献（40年来共2000余种）虽观点不正确，内容仍富有参考价值，颇有择优介绍（作为内部出版）之必要。故拟暂停翻译巴尔扎克小说，先介绍几种重要的研究资料（以比较完整的巴尔扎克传记为首）^①。奈出版社对此不予同意，亦未说明理由。按一年来人文（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者）来信，似乎对西洋名作介绍，尚无明确方针及办法（1958年春交稿之《皮罗多》，1961年校样改讫后，迄未付印；1964年8月交稿之《幻灭》三部曲，约50万字，至今亦无消息；更可见出版社也拿不定主意）。同时人文只根据所谓巴尔扎克“名著”建议选题，而对于译者根据原作内容，认为不宜翻译之理由，甚少考虑。去冬虽同意雷译一中篇集作为过渡，但根本问题依属悬而未决。按停止翻译作品，仅仅从事



巴尔扎克研究，亦可作为终身事业；所恨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即使撇开选题问题不谈，贱躯未老先衰，脑力迟钝，日甚一日，不仅工作质量日感不满，进度亦只及10年前三分之一。再加印数稿酬废止，收入骤减（即印数稿酬未取消时以雷工作迟缓，每年亦不能收支相抵），种种条件，以后生活亦甚难维持。^②以上情形，曾于去年12月函托唐弢兄转陈周扬部长。

最近半年个人情况又大有变化，除多年宿疾（如关节炎、偏头疼、过敏性鼻炎等）轮流作祟外，6月下旬又每晚头脑发热如焚，思考能力几等于零，医生坚嘱立即休息，不料8月下旬恢复工作后甫及一月，忽双目昏花，非特无法翻译，即读书看报亦不可能，因每分钟眼前皆有薄雾飘过。（故此信只能由雷口述，囑内子笔录。）眼科医生认为眼神经使用过度，急剧衰退，倘不长期休息，日后恐有失明之虞。^③且此病迄无对证之药。但休息并无期限，不知何日方能恢复。即恢复亦不能如过去每日工作九十小时，脑力退化亦是极大限制。而雷不比在大学任教之人，长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给可支。万一日后残废，亦不能如教授一般，可获退休待遇。故虽停止工作，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难安心静养。将来必要时，国外小儿傅聪固然还能维持雷一部分生活，但从各方面考虑，觉得亦有不妥之处。因念吾公历年关怀、爱护备至，用敢据实上述。私衷期望，无非能早日恢复目力，以后即或半日工作，亦尚可为西洋文学研究略尽绵薄。目前如何渡过难关，想吾公及各方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解放以后，出版事业突飞猛进，作译者并蒙党及政府多方照顾，唯雷心长力绌，极少贡献，尤不能以马列主



义观点分析作品，为读者作一番消毒工作，为愧怍无穷耳。

崑此敬候

公绥

傅雷拜上

(一九六五年)十月廿六日

家人代笔

上海江苏路 284 弄 5 号

自注：

①附 1964 年致人文郑效洵同志函底稿二件，以供参考。

②过去 10 年中，平明出版社将《约翰·克利斯朵夫》、《高老头》、《贝姨》、《邦斯》、《欧也妮·葛朗台》、《夏倍》、《于絮尔》、《嘉尔曼》、《高龙巴》、《老实人》等归人文出版时，曾多得一笔稿费，故能维持至今，但积存即将告罄。从 60 年代起因身体不支，逐年减产，且是累进的减产。以 60 年代至今的工作进度为例，每年只能完成 11—12 万字（改稿四五道，每道返工数倍于初稿，其慢可想），收入约 1100—1200 元。自印数稿酬取消后，雷个人译作收入平均减去三分之一左右。去年 8 月交稿，而翻译历时将近四载之《幻灭》（约 50 万字），曾陆续预支 3000 元，但亦不便常向人文要求多支。

③1959 年每晚工作完毕即双目流泪不止，动辄达半小时以上。1960 年初曾遵医嘱休息三月，唯恢复工作后流泪如故，至今已成为日常现象。1964 年 3 月华东医院普查时又发现水晶体浑浊。



石西民与上海剧改工作

李大成

石西民同志与世长辞已两个月了。我为失去一位敬爱的老领导、先辈和师长而感到万分悲痛。

五六十年代，石西民同志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和市委书记，对文艺工作一直非常重视和支持。

1958年有一股“左”的思潮影响到舞台，一度是清一色的现代剧目。西民同志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果敢地提出了要很好地贯彻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并举”的方针，舞台面貌很快得到了改变。1959年上半年戏剧会演时，上海戏剧界形势很好，舞台丰富多采，实践证明他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对新编历史剧他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支持周信芳的《海瑞上疏》编导小组到青岛去修改加工，决定把它作为国庆10周年的重点献礼剧目。1959年到1963年期间上海舞台上出现了一批新编历史剧，如《淝水之战》、《武则天》、《唐赛儿》、《黄巢》、《海瑞》、《李秀成》、《林则徐》等，沪剧锡剧也编演了现代剧目如《星星之火》、《黄浦怒潮》、《六里桥》等。

1960年，张春桥借口要跟上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的新浪潮，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文艺工作者都赶到所谓生活中去，反映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人新事，又一次把上海舞台推上了清一色现代戏质量不高的冷清局面。西民同志提出了要



继续挖掘传统剧目，并具体指导组织了传统剧目大会串的演出，戏校的《墙头马上》，淮剧团的《女审》、《三女抢板》，都得到了他的支持。

为了推动现代戏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石西民同志支持了1963—1964年的现代剧会演。在1964年初举行的华东话剧现代戏会演，他对上海的《一家人》、《小足球队》，亲自过问并组织力量修改加工，使剧目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1964年昆剧现代戏《琼花》的改编创作演出获得成功，也是在他的直接关怀帮助下取得的。

1963年四季度，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当时我们认为加工童芷苓同志演过的《赵一曼》较为有基础，石西民同志也同意这个意见。后来那个自己跳出来要帮助上海搞几个重点剧目的江青坚持要加工《智取威虎山》，西民同志顾全大局说服我，并积极组织力量贯彻执行。而江青不仅把工作的成果窃为己有，而且不断地向西民同志和我们施加压力。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临去北京参加观摩演出之前不久，江青与张春桥勾结起来排斥西民同志。

西民同志对文艺队伍是爱护的，对专家是尊重的，对干部是关怀与支持的。对于一些专家知识分子的入党问题他备加关怀，1959年曾专门提到市委会上作了研究，并积极支持宣传文化系统和基层党组织作好对专家知识分子的教育发展工作。

反右派斗争中，宣传文化系统在“大气候”的影响下，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西民同志对少数专家和知名人士，在自己可能的条件下给予保护。对少数大艺术家，为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仍然维持了他们的高薪，并征得了周总理首肯。这种从实



际出发不搞平均主义、不做群众尾巴的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西民同志对艺术人材的培养教育非常重视。他对筹建舞蹈学校，对青年京昆剧团的创立成长，对戏剧院团学馆的建立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上海现在舞台上的中青年骨干大都是在他主持宣传文化系统工作时培养起来的。西民同志的辛劳是没有白费的。

“文革”中，“四人帮”把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贯彻“三并举”的措施，说成是让封资修长期占领舞台为复辟服务；把西民同志对文艺队伍的看法，对专家、青年、干部的爱护关怀，诬称为美化文艺黑线队伍，是招降纳叛包庇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网罗走资派黑干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是毒化青年培养黑线的接班人，为封、资、修黑线服务。用造反派的话来讲，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这种对西民同志精神上的迫害，肉体上的摧残，给西民同志身心的健康带来了巨大损伤，想起来就叫人心酸，叫人气愤！

石西民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对上海的文化艺术工作仍然是关怀的。在北京、在上海我们探望他时，他总是问长问短，关怀文化艺术工作的恢复与发展，关怀他熟悉的专家、干部的生活与事业，也坦率地议论过去工作实践中的长短曲直与教训，给人以很好的启示和教育，使人感到亲切。他那可亲可敬的领导与师长的形象，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原载《上海文化艺术报》1987年12月25日）



精心培育昆曲新秀的石部长

蔡正仁· 华文漪 蔡瑶铣

每当我们想起在戏校时的学艺生涯，想起在青年京昆剧团时的排练、演出……想起我们心目中尊敬的长者，我们的脑海之中不时地浮现出一个难以忘怀的名字：石西民同志。

记得那是在50年代后期的一天，我们刚上完排戏课，同学们都涌向操场进行课余活动，发现教学大楼前站着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人正在和校长谈话，一边谈一边又用手指向我们。不知是谁说了句：“石部长来看大家了！”一下子我们便将石部长围起来了。

那时，肩负着上海文化艺术最高领导职责的石西民常常不顾工作的辛劳，亲自过问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我们成长过程中的每个关键时刻都浸透着石部长的关怀和教诲。

1960年，我们快要毕业的前夕，石部长要求我们排出一批有特色的优秀传统剧来迎接毕业，学校为此提出“攻尖端、练绝技”的口号。可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饭都吃不饱，还能攻什么“尖端”，练什么“绝技”？是石部长与有关部门商量：要保证戏校学生的营养，每人一天两个鸡蛋。不管是炎夏酷暑还是隆冬腊月，石部长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排练房和练功房，为我们攻尖端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一天，蔡正仁收到了一封信，拆开一看竟是石部长的亲笔



信。一位市委领导给一个尚未毕业的学生写信，使我们极为感动，信中只有一个内容：鼓励我们谈谈怎样更好地继承昆曲，用优异的成绩迎接毕业，希望我们提些具体建议和谈谈自己的想法。这件事在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我们决心拿出好成绩来向市委领导、学校领导和上海市人民汇报。后来在石部长亲自关怀下，我们排出了《活捉王魁》、《昭君出塞》等高质量的戏，为我们毕业献上了一份“礼物”。

1961年8月1日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日子，经过八年的学习生活，我们毕业了。这一天既是毕业典礼，又是青年京昆剧团建团之日。双喜临门，石部长兴高采烈地来祝贺我们，至今我们还清楚地记得：石部长手拿一把大蒲扇，亲切地和大家一起交谈，他的音容笑貌，对于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来说，已不再是陌生的了。建团后，他经常来看我们演出，亲自关心团里的剧目建设工作，每次我们只要听到“石部长来了”，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迎上去，仿佛此时站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书记、部长，而是慈父、老师。

1961年冬，青年京昆剧团赴香港演出，石部长鼓励我们要有信心，要把这次演出搞好，为上海争光。他从上海一直把我们送到深圳的罗湖桥口。

1962年秋，上海一些大的院团都在准备排现代戏，而作为古老的昆曲应该怎么办？正在迷惘之时，石部长找我们来了。“听说你们很着急，不要紧，我前一阵在忙着抓京剧《智取威虎山》，现在已基本搞好，我就可以腾出时间来抓一抓你们的事了，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昆曲。”果然不多久，石部长把他的办公地点挪到了上海戏校校长室，亲自抓大型昆曲现代戏《琼花》的创作与排练。剧本中每一段唱词和唱腔，他都反复推



敲、研究。在他的直接关怀下,《琼花》像一朵茁壮的鲜花在上海舞台上怒放了,演了三个月,连满100多场,开创了昆剧演出的最高卖座率。

1964年深秋,石部长又带着我们的《琼花》赴广州、深圳演出,叶剑英元帅连看三场,大为赞赏。

不久石部长被调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送行那天,我们这些既是学生又是部下的人心情最为复杂,不知是喜还是忧?没多久,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降临了,在那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我们日夜思念着这位处境令人担忧的老领导。后来尽管在“批斗”大会上相逢了,可相对却无言。使我们最难受的是他平昔对我们的关怀和教诲,那时却被说成是“毒害青年的罪证”,为此他被无休止地批斗、打骂。我们只能默默地祝愿他平安无事,身体健康。

长夜终于熬过。1980年的一天,我们正在剧场演出,忽然走廊上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啊!是石部长来看大家了。”尽管他已不再是书记、部长,但大家还是习惯地这样称呼他,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石部长见了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还这么年轻,我最思念的就是能看到你们重上昆曲舞台。”(“四人帮”扼杀了昆曲,我们当时都改演京剧了)那时,蔡瑶铣已调到北方昆曲剧院,排出了全部《牡丹亭》,石部长听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在看完蔡瑶铣的演出后,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首诗表示祝贺:“清歌一阙颂青春,九死钟情梦里人。愿倩名优描伟业,而今豪杰正扬尘。”多么热情的鼓励和殷切的期望啊!

1982年和1986年上海昆剧团两次进京演出,石部长高兴异常,那时他身体情况已开始起了变化,但仍然来看我们演出,还邀请我们去他家作客,特地从天津买了十几斤南方人爱



吃的大螃蟹来招待我们。他还是那样殷切地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成为一个在艺术上有成就的人民演员。

1987年春正仁和文漪赴京参加“梅花奖”颁奖大会,匆匆赶去看望他老人家。那天他家里有几个人在一起谈工作,石部长说:“下次我们再好好谈谈”。谁能料到这次匆匆一晤竟成了诀别。

我们这些演员不会忘记哺育我们成长的老师们,但这位没有教过我们一出戏的石部长,我们却也常常怀念着他,怀念他对我们的殷切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原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
分会通讯第12期。1989年6月20日出版)



石西民与上海青年京昆剧团

汉文

老部长石西民同志逝世已经一年多了，但是郁积在我胸中的怀念之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不得不重新提笔，写完未竟的篇章。

在我几10年的革命经历中，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领导者，石西民同志便是其中之一。我认识老部长是在1956年的夏天，那时我在市文化局工作。一天，他去某艺术单位作报告，当时我正在该单位帮助搞“肃反”运动，这样就见了面。那天，他穿一套米色的凡立丁西装，足登半新的白皮鞋，握手介绍之际，使我直觉地感到他是一位“文化人”。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接触多起来了，从而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他对上海文化艺术事业接班人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他在日常繁重的政务之余，经常挤时间看上海市戏曲学校京、昆第一班学生的实习演出。他了解到这些学生要坚持每天练功、吊嗓，又要排戏、实习演出，按照一般的中专生实习待遇，营养不足。乃向市委作了汇报，并要市文化局提出报告，将学生实习期间的待遇提高10元。按当时的副食品价格，这是一笔不小的营养补助。再如在这批青年演员转正定级时，按有关规定，中专毕业生最高只能定在行政23级。但他考虑到京、昆学生的学制长（8年），戏曲艺术工作者的脑力劳动、体力劳



动强度大等因素，他提出并经有关教育、劳动、文化部门同意，一般定到 22 级、23 级，少数冒尖的演员可以定到 21 级，即相当于大专学生的级别，从而大大地激励了这批青年演员艺术创造的积极性。

1964 年 5 月 12 日下午，他通知我们青年京昆剧团的几个领导干部到康平路他的办公室去谈工作。我们到了那里后，老部长一面来回踱步，一面带着深沉的感情说：青年京昆剧团成立后，到香港演出《杨门女将》、《白蛇传》是一炮打响的。上海文艺界和观众也是肯定的。但是这两年没有搞出影响比较大的新戏出来。总不能老是演这两台戏啊！京、昆有一批有光采的青年尖子演员，文艺界和观众的评价不错。但如不能连续搞出几台好戏，这批冒尖演员就不能在观众中站住脚。你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前几天在北京开会，我向文化部为你们要了一个任务，让你们参加秋季广交会演出。但是带什么剧目去？《杨门女将》、《白蛇传》还可以演出，但只能作为预备剧目带去，重点是要搞出两台新的剧目，尤其是现代题材的剧目。然后他要我们提候选剧目。对我们建议改编的剧目逐个作了分析，要我们回团后再研究决定。16 日下午又把我们找去，最后确定昆曲改编电影《红色娘子军》，因为该剧有不少场面可以发挥昆曲载歌载舞的艺术特点，昆曲的主要演员又比较适合演该剧的主要人物。京剧在那天未选定合适的题材（后来确定改编海政话剧团创作的《海防线上》，改名为《飒爽英姿》）。昆曲《琼花》从剧本改编到排练班子的组成、主要演员阵容的选择等各个创作环节，他都极为关心，并调来得力的艺术干部，加强创作力量，如从上海歌剧院调来李世仪同志担任导演，调文化局艺术一处处长冯少白同志参加剧本改编，邀请郑拾风



同志对剧本进行润色。对重点场次还亲自动笔,修改唱词、对白。在音乐创作上提出了既要保持昆曲特色,又要从剧情、人物出发,尝试革新的指导思想。昆曲音乐的特点之一是曲牌体,《琼花》作曲辛清华同志提出,要在剧中人红莲的重点场次,试用保留昆腔韵味的板腔体。石西民同志表示积极支持,同时,又要辛清华征求京昆表演艺术家俞振飞的意见:“如果俞老同意,就试验。”对舞台布景、服装和武打设计等都多次提出很好的意见。《琼花》排出来后,他要我们先在中国大戏院试演了八场,征求市领导、文化界、新闻界等各方人士和观众的意见,然后去广州参加秋季交易会演出,最后又到深圳演了数场。香港著名人士费彝民、著名电影演员夏梦等来看了演出,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还发表了热情肯定的评价文章。同年12月下旬,在劳动剧场(即天蟾舞台)演出,上海的许多报纸都连续刊登消息、文章、照片、速写,宣传昆曲革新,宣传《琼花》。在劳动剧场连续演出三个多月,场场客满,从而使许多从未看过昆曲的人,对昆曲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有的观众正是因为看了《琼花》而产生了对昆曲的喜恋之情。老部长对《琼花》所倾注的心力,是大家一致肯定的。因此,当《琼花》剧本出版时,编剧写了一个前言,其中提到了老部长在《琼花》诞生中的功绩。他知道后坚决表示一定要将他的名字划掉,并说:“我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编剧感到在前言中不提他是不公允的,只好将整篇前言拿掉。

老部长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对我党从50年代中期逐步滋长的“左”倾错误,在认识所及、权力所许的范围内作了一些抵制,从而减轻了一些损失。例如1957年秋,上海文化系统的“反右”已进入高潮。在基层上报材料中,有一个是著名的京、



昆两栖演员。同意还是不同意将该演员批判、戴帽？老部长迟迟未予表态。不久，周恩来总理路过上海，老部长将此情况作了汇报，总理指示：“反右派”运动在知识界震动很大，可以不划的就不必再划。如果群众对她意见大，可以开一个小会，让大家提提意见，帮助帮助就行了（大意）。文化局党委在传达了这一精神后，使一批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免遭厄运。可以想见，如果当时老部长不是采取审慎的态度，批准将该著名演员划为“右派”进行“批斗”，那么肯定要有一批著名文艺工作者被“升级戴帽”，文艺界在那场运动中的损失必然更大。

1964年底中央决定调他到文化部主持日常工作，次年元旦后数日，我与青年京昆剧团的一位主要演员去康平路他的家中送行。当时他正在整理行装，在聊天中他指着一堆木刻水印中国画说：你们如果喜欢，自己挑两幅，送给你们。我们各挑了两幅。在继续交谈中，我提出了一个疑问：“田汉是一个有几10年党龄的老党员，全国解放也已有十多年，经过了多次政治运动，怎么在文件里说他是叛徒和反党分子呢？”他沉思了片刻，然后感喟地说了一句话。他的回答很简单，却使我感到很新鲜，与文件中讲的不同，而且从他未尽之意中我朦胧地感觉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这种“左”倾政治的压力，在老部长的思想上是很沉重的。我想起了另外两件事：

在昆曲《琼花》去广交会演出期间，由野心家江青亲自抓的现代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也参加了广交会的演出。一次，他对我们说：“《琼花》在广州演出，省委领导、文艺界和观众的评价很高，报纸上宣传的份量很重，你们听了一定很高兴。但是我听了还有一种沉重的心情，如果对《琼花》的宣传口径，超过



了对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宣传，那就不好办了。”到了1965年春的某一日，文化局李局长对我说：昨天石部长在电话中说，将《琼花》中主角琼花的名字改为吴清华（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中主角的名字）。我说：“《琼花》已演出了一百多场，观众20多万，影响很大，为什么还要将剧中的主要人物改名呢？”李说：石部长顾虑的是怕被“客人”（当时都以“客人”称江青）说成是唱对台戏吧！事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兼任青年京昆剧团团长、也是《琼花》主要编剧的周玗璋同志，我们两人都产生了一个隐忧：石部长为了扶持青年京昆剧团，关心昆曲革新，花了那么多心血搞出了《琼花》，如果因为这件事而遭到江青的非难，我们太对不起他了。

“文化大革命”以其急风暴雨的形式，使左倾路线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全国陷于一片混乱。1967年初，我被作为“走资派”打入牛棚，编入“扫帚拖畚集团”，过着“挨批天天有，挨斗三六九”的生活。炎夏的某一天，造反派将老部长非法拘押到青年京昆剧团的批斗会场里，我与剧团的其他几个领导人陪斗，造反派“揭发”、“批斗”的重点是昆曲问题。他们采用割断历史、颠倒时间的手法，要我们“交代”搞昆曲《琼花》是为了抵制毛主席关于昆曲的指示，是跟江青搞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对着干的“滔天罪行”。老部长沉着而有力地回答说：“搞昆曲《琼花》是我的主意，要说有错误，由我承担，不要为难基层干部。”在残酷斗争的会场里，被批斗者随时都要挨造反派的巴掌、拳头、皮鞭，老部长这种勇于为基层干部承担责任的高尚品质，使我潸然泪下。

粉碎“四人帮”后，多么希望见到这位令人崇敬的老部长啊！但是天不从人愿，老部长竟溘然病逝了。想不到1967年



在“批斗”场上的见面，竟成了永别。回想至此，怎不沧然！

石西民同志作为一个党在文化部门的领导者，以他的水平、能力、作风、实绩，给我们基层干部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使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党的干部，一定要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为党为人民谋利益，那么，在他活着的时候，受到人们的尊敬，在他死后，也受到人们的怀念。反之，言行相悖，以权谋私，那末，不管他的地位多高，人们对他如何评价，是可想而知的。

（原载《上海文化史志通讯》第1期，1988年9月出版）



石西民与艺术家的友谊

沈柔坚

石西民同志辞世一年多，一位正直朴实的长者和挚友的形象，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引发着我的怀念。1987年7月底我在北京时，到他家探望，只见他出医院不久，双脚无力，神色憔悴，室内也显得有些零乱。比起年前我到他家时，一进门便见到他伏案疾书（当时正在审读《郭沫若全集》的注释），精神气爽，说起话来话声朗朗的情景，我的心不禁抽紧。但是在交谈中我感到他的思维清晰，反应敏锐，心中又宽慰些。却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永别！

西民同志与我原是工作关系，由于我们之间对一些事物和对艺术的看法相近，他又很喜爱美术，使我们之间的友谊逐步发展成为知交。西民同志为人敦笃，爱才惜才，尊重知识的美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曾记得1957年“反右”运动时，上海美协党内对刘海粟、吴湖帆等是否划为右派，意见分歧，相持不下。西民同志得悉后，十分关心两位老画家的命运，亲自参加美协党组会议，并对刘的问题说：“艺术上的问题可以允许有不同的见解。刘海粟不喜欢苏联的绘画风格，不等于就是反共嘛。”西民的一席话说服了大家，一致同意不给刘、吴戴“右派”帽子。但海粟老人在劫难逃，虽闯过了一个关卡，后来却又被江苏卡住了，终



于戴上了帽子。不久，西民在上海经过一番努力，征得江苏同意，给海老脱了帽。他还通过海老，劝傅雷写“自我批评”，争取早日脱“右派”帽子。西民对傅雷的学说才华甚为称羨。有一次他在华山饭店请傅雷吃维扬点心，我作陪时，便听到他鼓励傅雷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全部译出。每谈到文学、绘画，他总是神采飞扬，津津乐道。傅雷被划为“右派”后，西民多次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设法约傅雷继续译书。在“左”的潮流压制下，西民对处于困境的知识分子不是冷落漠视，避而远之，而是怀着一颗同情的心，热情相助，尽可能保护过关。他的言行当时便感动了我，现在想来更为动容。

林风眠先生解放初被杭州美术学院辞退，寓居上海。有一段时间，生活上、工作上困难重重；也多亏西民的多方支持，设法为之安排与张罗。当听到社会上对林吹些阴风时，西民经过分析，明确表示：“只能姑妄听之，林风眠是个单纯的艺术家。”后来，林的处境逐步改善，是与石的同情和关心分不开的。

1959年我在文汇报上发表画论《不似之似》，是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之机，如实地说出了自己的艺术观和美学观，在“政治统帅一切”的口号甚嚣尘上之时，心里难免有不安全感。有的朋友出于好心，提醒我要注意多谈政治，少谈艺术上的具体问题。没有想到西民同志看到后表示赞同并鼓励我再写。1961年春，市委筹备召开文教会议时，他要我写篇带学术性的谈美术创作的书面发言。市委宣传部在讨论我的初稿时，西民同志亲自参加。在崇尚政治空谈的浊浪中，他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求实的精神，多么难能可贵。

建国10周年时，上海的美术创作特别活跃，优秀创作盛极一时，这与当时提出贯彻双百方针有关，西民同志经常关心



与支持也起了很大作用。西民观看市美展作品之后，要上海博物馆组成一个评选机构，精选一些高质量的作品由博物馆收藏。因此，油画佳作《配电工》、国画《棉粮图》以及版画和雕塑都有优秀作品进了博物馆。出版方面在西民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画集》、《永乐宫壁画集》以及《上海》大画册等有份量的画册。这些画册当时在国内外影响极大。有的还在国际上得奖。1962年，江苏山水画家万里写生之后在北京举行“江苏山水画展”，别具匠心，轰动画坛。西民同志便和我们一起研究，上海画坛如何显示创作优势，大家认为上海花鸟画画家的力量较强，可以突破出新。经过半年多的创作准备与实践，1963年在上海与北京先后举行了《上海花鸟画作品展》，博得普遍好评，影响全国。在美术教育方面，华东体制撤销之后，华东美术学院[杭州与华东艺专(无锡)]分别划浙江与江苏，而上海没有美术院校。西民同志十分关心培育上海的美术队伍，他一直主张上海应有一所较具规模的高级美术院校，并于1959年创办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先后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如陈逸飞、魏景心、夏葆元、杨出新等，都是该校毕业的学生。

在那些年代，空谈、浮夸、教条、棍子盛行之时，作为市委书记的西民同志能够与艺术家赤诚相待，尊重知识和以求实精神热心文化艺术事业的建树，这在当时谈何容易。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就愈加深切地怀念西民同志。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1988年10月9日)



回忆西民同志在文化部的日子

金冲及

石西民同志的名字，我虽然早已知道；但见到他，还是在1955年他调到上海先后担任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兼华东局宣传部长以后。那时，我在复旦大学工作，见到他的机会不算很多；有时是在一些会议上，有时是参加起草市委的一些文件。他给我的印象还是一介书生，诚挚，坦率，平易近人，在他面前说什么话也没有拘束，不像有些领导干部那样让人产生敬而远之的感觉。说到起草文件，西民同志也没有有些人那种依赖秘书代劳的习惯。记得1960年有一次吴云溥、唐海两同志和我曾给他起草在上海文教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他事先把报告的要点讲得很清楚，写出稿子后又自己作了仔细的修改。我至今还记得他添写的话中有这样一句：“清新刚健的民歌，是我们时代的新国风。”所以能记住，因为它当时使我很惊奇，觉得西民同志不但有很高的领导水平，而且文字功底也很好，这在我平时接触到的领导同志中并不多。

同西民同志接触得更多的，是随他到文化部工作的那一段时间。在1964年毛主席作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后，就听到说西民同志要调到文化部去工作。有一天，他把我找去，说准备调我随同他一起去。这本来只需要把决定通知我，但他用的完全是商量的口气：“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愿不愿



意到北京去工作啊？”我没有思想准备，而且原来在复旦大学学习和工作了18年，对学校很有感情，对文化部的的工作完全是陌生的；但又觉得既然市委书记亲自找你谈，自然应该服从，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就说：“我自己没有什么意见，问题是合适不合适。”西民同志说：“合适不合适是指什么？如果是指家庭出身，那主要还得看本人的表现；如果是指对文化工作不熟悉，那可以慢慢熟悉起来。”这样一说，我便不好再说别的什么了。

回头来看，西民同志自己对到文化部去工作，也是很犹豫的，也许是感到苦恼的。文化工作历来难做。在毛主席作了那两个批示以后，文化部正在开展“整风”，周扬同志当工作组长，要西民同志去当副组长。毛主席的批示中已经讲到“跌到修正主义边缘”和“裴多菲俱乐部”那些十分厉害的话。文化部的“整风”，火药味很浓。有位领导同志说过：“这是我们在解放后第二次接管文化部”。这话连我当时听了也感到吃惊。西民同志接到调令后，拖了很长时间才走，中间还到广东去了一趟。他从广东回来时对我们讲到，有的同志劝他：工作顺利的时候就多做些，困难的时候就少做些。这话的含意，我当时并不懂。现在看来，他已意识到面对的将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局面。当他在1965年1月初到北京时，文化部的“整风”已进入尾声，齐燕铭、夏衍、陈荒煤等同志正在作最后一次大会“检查”，运动到了快收场的时候了。

对这场“整风”将要导向哪里？西民同志看来也感到迷惘。受到批判的夏衍同志同他很熟悉，以前在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等地方都共过事。高层定下的调子，他不敢怀疑，似乎还在努力想通它，但内心又不觉得问题有那么严重，而且颇有点



“物伤其类”之感。刚到北京时，他给我的感觉是心情沉重，没有一点兴奋的样子。他对我们说：“到文化部这个地方可要注意。像夏衍这些同志，你说他就要反对毛主席，也不一定；但世界观未改造好，喜欢一些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处在文化工作的领导地位，就不知不觉走到那条路上去了。”这些话，听起来都是他想要努力提醒自己的内心独白。讲到他自己，他也感到惶惑。这以后一些时间，他曾对我们说：“每次运动，领导干部总要垮一批，希望这次不垮。中央提到保持晚节的问题，我自己没有信心，没有把握。‘30年代阴魂不散’，我们很多人都是从30年代走过来的人，要大胆地想想自己的问题。”这些话，很能反映出他内心的烦闷和不安。

文化部的“整风”这时虽已进入尾声，但并没有结束。有些人还对一些领导人揪住不放。我们到西民同志那里去时，他常常发一些议论：“‘整风’时间不要拉太长了。还是要到下面去，要把工作抓起来。有些问题光开会也不能解决，要结合以后的工作一步一步地解决。”在小会上，他对那些老想把领导干部揪住不放的人说：“就是对你们，如果要我，每人也可以找出一百条问题，然后串起来，都上纲，这怎么行？”这些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当时那种气氛下，敢这样讲是不容易的。他还谈到当时文化部的一些局长：“周巍峙年轻，有能力，能把艺术局的工作抓起来”；“吴雪在大的方面是好的”；“王益业务上是熟悉的”。要大家让他们能把工作重新抓起来。

不久，中央对文化部进行改组，由陆定一同志兼部长，新任的副部长中有萧望东（原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石西民、赵辛初（原湖北省委书记）、颜金生（原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号称“两个将军、两个书记”；还有林默涵、刘白羽等。部党组改为部



党委，萧望东担任党委书记，石西民任副书记。其他新任命的副部长隔了大约半年才到任，所以在一段时间内，部里就由西民同志和李琦同志两个人支持。文化部的工作在“整风”期间久已陷于停顿，西民同志很着急，想把工作抓起来，重新走上轨道。他说：“电影方面，从去年11月以来开了一系列会议，如故事片厂长会议、科教片会议、电影发行会议、摄影会议等，比较完整一些了，转到为工农兵服务的轨道上来了。”艺术方面，他在五一节时批准了重新上演几出传统戏，如《赤桑镇》等。他还要求文化工作“面向农村”，要求文艺工作者组成文化工作队，上山下乡，还在12月间到山东曲阜去看望在那里的文化工作队。

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了。一切全被打乱。社会生活中充满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席地卷起。西民同志原来设想的“把工作抓起来”，已根本谈不上。刚刚经过改组的文化部党委，在风雨飘摇中勉强支持了不长的时间。到1966年底，西民同志就被上海来的造反派揪走。我听到过一些他在上海被大会批斗时的情况，说是凡涉及别人的事，他总把责任由自己担起来，从来不曾往别人身上推，这是符合他的性格的。接着，就是长达七年多的秦城监狱生活。他在文化部工作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回想起来，这真是一场令人痛心的悲剧。



晚年余晖

——忆石西民同志在郭著编委会

雷仲平

石西民同志光辉一生的晚年，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名誉所长、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以下简称“郭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的岗位上度过的。当时虽已属退居二线，而且年近古稀、心肾有病，但在郭著编委会他却依然工作在第一线，放射着“夕阳无限好”的光辉。

我真后悔为何不晚离病房一小时

西民同志是我的领导、先辈、师长，我也是他生前最后一个与之交谈、聆听教诲的被领导者。

那是1987年10月16日下午4时，我去协和医院高干病房探望，带去同志们的问候。西民同志正在输液，夫人吴伟同志在旁陪伴。我刚踏进病房门尚未开口问好，西民同志就问：“近日有什么新闻？”并且示意我坐下。他明知我孤陋寡闻，我也深知他时刻关心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大事，特别是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所以即使知之甚少，也愿点滴相告。他则仔细倾听，插话提问，并间或发点感慨。问过新闻后，就要我谈郭著



编委会的工作情况，并不时作些指点。如果不是在病房输着液，你真不会相信西民同志已是心肾疾病并发、患有癌症的重病号。我怕他劳累，乘护士送晚饭时起身告辞，当时大概是下午5时，想不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聆听西民同志的教诲。

约莫八个小时之后的子夜，接到社科院值班室的电话：西民同志因抢救无效已于零时20分病逝，要我速去医院。

当我乘坐派来的汽车在途中沉思时，西民同志神采奕奕的形象不断在我脑中涌现。1961年春，我作为临时抽调编写农村教材的人员随西民同志赴江阴县作农村调查，他那平易近人的形象；1963年、1964年，我多次参加西民同志主持召开的理论文章阅读会，他那认真钻研、不断提问促人深思时的情景；1965年、1966年在中央文化部工作时的艰难处境。……一幕幕电影似地在我脑海中浮沉，特别是在郭著编委会时的形象。

赶到医院时，西民同志的遗体已被送进太平间。社科院办公厅主任、西民同志在新闻所培养的研究生杨润时已先期到达。吴伟同志沉痛地告诉我最后抢救的情景。当我听到在我离开病房不到一小时，西民同志病情发作，吴伟同志一人跑进跑出呼唤医生护士抢救时，我悲痛极了，后悔极了，后悔我为何不晚走一小时，如果我晚走一小时，或许能帮吴伟同志一点忙，或许……。我后悔，我真后悔！

他把最后的心血都倾注在郭沫若
著作的编辑出版和研究事业上

西民同志是1981年4、5月间由社科院报请中宣部批准



增补为郭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并兼管筹备郭沫若纪念馆(或故居)。主任委员周扬同志从此有了得力助手,并把组织领导工作全盘委托给他,后来又把《郭沫若全集》的终审工作也交给西民同志。

西民同志在对文学、历史、考古三编编辑工作深入调查的同时,又系统地阅读了郭沫若的大量著作,走访了多位德高望重的郭老生前战友、编委,会见了郭老生前的秘书,加强了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以及新闻出版署的联系,得到社科院党委支持调整充实了编辑和干部力量。在此基础上,周扬同志于年底主持召开了郭著编委会自1978年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委员会议,西民同志在会上作工作汇报。这次会议总结了经验,规划了编辑出版进度,商讨了筹备郭老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等事宜。西民同志又在调研、审读已编、将编的郭沫若著作,并与各编负责人商谈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形势,亲自草拟了一份关于《郭沫若全集》中具有极强政治性问题的编辑标准等几点处理意见,经周扬同志审阅后,于1982年10月报请中宣部批准。

这次会议和这个请示报告推动和促进了《郭沫若全集》编辑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1982年11月郭老90周年诞辰前夕,《郭沫若全集》终于问世,经西民同志终审的“文学编”发稿4卷出版2卷,历史编出版3卷,考古编发稿3卷出版2卷。

与此同时,郭沫若故居的筹备工作也有了相应进展。1982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同意把郭沫若同志的住地搞成故居”;8月,经国务院批准郭沫若故居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月,西民同志专程去大连拜访郭老的日裔夫人郭安娜及其长子,并将安娜晚年的状况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了



专题报告。10月，周扬、西民同志和部分编委与于立群夫人的子女共同商讨郭沫若故居筹备和开放事宜。并且组织人员在故居协助子女清理郭老遗物，派人到四川、上海征集文物、收集资料、拍摄图片，故居内也进行了局部整修。于是，在郭老诞辰90周年纪念当天上午，郭沫若故居举行了揭幕仪式，石西民主持，方毅揭幕，郭老生前战友、亲朋，著名学者、教授百余人参加，在短短的半个月内有组织地接待学者与敬仰者达万余人次。

在西民同志筹划与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文联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联合召开了郭老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社科院有关研究所和有关部门还分别召开了史学和文学学术报告会。在报纸刊物上发表的诸多学术文章和纪念文章中，西民同志撰写的《纪念郭老、学习郭老——郭沫若同志诞辰90周年感怀》和《郭老与〈十批判书〉》两篇文章，对郭老的治学态度、学风，郭老的为人及其著作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明眼人一看，这是对前一时期有几位给郭老及其著作发出的噪音作了正面的回答。文章中重申《甲申三百年祭》是抗战后期郭老在重庆撰写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同志给郭沫若同志的信中曾高度评价；文章指出：1930年出版的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始，而《十批判书》与《青铜时代》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研究的深入。并且提出：“今天，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拂去《十批判书》在10年动乱中蒙上的灰尘，使它重新现出原有的光彩。”西民同志的文章，在学术界与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纪念郭老诞辰90周年各项活动的基础上，石西民在周扬支持下，又筹划成立了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1983年5月，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与社科院的文学、历史、考古三个研究所和中国文联于北京联合召开了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学者、教授、编辑、记者 150 余人参加。会议由石西民主持并作了《学习郭沫若，研究郭沫若》的主题报告，周扬、李一氓、夏衍等同志分别作了《尊重历史、给历史人物以应有评价》、《正确评价郭沫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郭沫若》等重要讲话。诸多学者、教授均先后宣读论文或即席发言，交流了研究成果。会议经选举成立了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

这次会议之后，在西民同志领导下，郭著编委会、郭沫若故居与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紧密配合，协同工作。《郭沫若研究》陆续出版。1984 年 3 月，石西民抱病主持了“郭沫若爱国主义思想”学术讨论会。1985 年 4 月，根据西民同志的意见，邀请文、史双方学者参加的“郭沫若历史剧学术讨论会”，共同探讨了如何使文史结合联合进行郭沫若研究。1985 年 10 月，“郭沫若在重庆”学术讨论会在重庆举行，西民同志主持并作了“总结历史经验，深化郭沫若研究”的开幕词，强调指出：“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的新文化运动，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是‘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而这个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就是郭沫若同志。”至于《郭沫若全集》的出版，至 1986 年已达 21 卷，即历史编 8 卷于 1983 年出齐，文学编共出 10 卷，考古编共出 3 卷。

随着工作的进展，西民同志的身体日益衰弱甚至趋向恶化，1986 年 9 月确诊患有癌症。即使如此，他仍一直关心着由他一手促成并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研究学者代表团



出访日本，原定西民同志为团长，后因病未能带团前往。12月，当我从日本回来前去探望西民同志并作简要汇报时，西民同志希望郭编办公室派名资料员帮他整理登记自己的藏书，当时未言明原委，后来才说是要将自己的藏书赠送给家乡图书馆。嗜书如命的学者竟要把自己心爱的藏书全部送走，这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样的心情？即使如此，在这前后，西民同志仍在终审着《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16、17卷。回想起来真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西民同志用行动书写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品德高尚、光华照人

西民同志去世后，郭著编委会、纪念馆、学会和有关出版社的学者、编辑、工作人员，时常怀念他，常常谈起他为人品德与风格。

时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马良春同志有一次与我闲谈，说他在1982年春接替别人开始主持全集“文学编”工作时，对西民同志曾一度有所误解，错认他从政多年定会耍权术，后来的接触才感到西民同志品德高尚，严于律己，待人宽厚，既是领导者又是学者，通情达理。

在我被借调半年并于1983年2月正式调到郭著编委会工作不久，就听说这样一件事。就任郭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的西民同志，有一次出席“文学编”的编辑工作会议，听取情况汇报。中间，他向从文学所借调来的几位编辑问及他们每周有多少时间投入“文学编”的工作，一位为人耿直的文学编辑一听之下，十分激动，把手中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顿，高声说：“这



个问题要讲清楚！我们在文学所还有研究工作，不是专门来编全集的！”西民同志听后却不以为忤，平静、诚恳地说，“对不起，我不了解情况，请你原谅。”此事后来有人传颂，并说西民同志谦和平易，可敬可亲，他当过“大官”，身上却不留“官气”。我多次听西民同志嘱咐要关心编辑同志的辛劳，也曾要单位出信反映他们工作状况以促进在原单位的职称评定，西民同志还亲笔附言。

西民同志在终审书稿时的认真细致是有口皆碑的。有一次在终审某卷经过多人看过的“文学编”注释稿时，竟然还发现对一人生卒年的注释前后相距才几年，他就在边上打个问号，注明要核对，并对前去取稿的编辑同志说：“这个注释错了”。有些必要的注释又难于从现成书本上找到依据，西民同志就赞同编辑同志外出实地调查。西民同志明确规定在《郭沫若全集》中对人的注释一律不作政治性评语。编辑人员曾说：西民同志的终审认真、实在，不是装装样子、划个圈子、署个名字的。但是当西民同志拿到终审者应得的审稿费时，还觉得过意不去，特意用稿费宴请有关同志。

西民同志本人不是历史学家或文学家，又要从事郭沫若著作的编辑和研究的领导工作，还亲自撰写研究文章，终审又那样认真、出色，这不仅因为他具有渊博学识的深厚根基，还因为有勤奋学习的良好学风与不耻下问的谦逊态度。负责主持全集“历史编”的编辑、校勘、注释工作的黄烈同志，至今还在谈起西民同志撰写《郭老与〈十批判书〉》时与他探讨商谈的动人情景。石西民同志曾要黄烈兼管全集“考古编”的工作，黄烈推托说他自己不懂考古，而西民同志则说：你总比我懂一点！西民同志这样谦逊，大大出乎黄烈的意料。



正因为西民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又为人正直、肝胆相照，因此即使在具体工作中个别问题上对人有所误会，也能倾听意见，反躬自问，冰释如初。此后还在我们面前谈起，以示对别人的歉意。这些或许正是西民同志善于团结人的奥秘吧！

1996年3月26日



您的英名永在

——悼念石西民伯伯

张小曼

1983年冬,在徐盈伯伯的热诚帮助下,我有幸参加了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的一次聚会。散会后恰与您同乘电梯下楼,交谈中您得知我是张西曼的女儿,立刻兴奋地说:“非常高兴认识你,我与你父亲西曼先生是非常熟识的老朋友。”您的话真使我喜出望外。要知道在父亲去世35年后,再想找到一个当年熟悉父亲的老朋友,是多么不容易啊!从此,我与西民伯伯就成了忘年交。

西民伯伯不愧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没有一点官架子,总是那样平易近人,热情真诚。为了搜集父亲生前的史料,我曾多次登门拜访,每次伯伯都是那么和蔼可亲地与我交谈,诚心诚意地帮我出主意想办法。伯母吴伟与伯伯是一样的热心肠,她无保留地向我提供有关的人名线索,使我迅速扩大了联系面,对我的史料搜集工作是极大的支持和有力的推动。

记得是在1984年春,一次我到伯伯家中探望,西民伯伯沉思良久,忽然对我说:“你父亲是我们党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位好朋友,对于这样的好朋友,我们永远尊重,也永远不会忘记。可



是多年来没有纪念过他，应该为你父亲开个纪念会。”伯伯的话恰如一石激起千重浪，使我心中久久难以平静。虽然我知道我的父亲张西曼教授是一位坚强的民主战士，也是国民党统治区中屈指可数的敢于“公开地亲苏亲共”（夏衍同志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父亲的话）的国民党人，但如果不是伯伯提出这个建议，作为家属的我们是不敢有这样的“奢望”的。父亲从1908年加入同盟会，毕生为革命事业奋斗，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终于积劳成疾，在1949年7月就被肺癌夺去了他年仅54岁的生命。是敬爱的周总理亲笔为父亲题写墓碑，遗体安葬在西山万安公墓。1950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徐冰和齐燕铭同志曾以中苏友协的名义，组织过一次小型的“张西曼教授逝世周年纪念会”，此后的30多年来，却没有再开过。西民伯伯的话使我深受感动，从他的身上我认识到，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决不会因为自己地位的改变而忘记共过患难的老朋友的。

但问题是父亲当年创办的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组织，如中苏文化协会、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等今天已不复存在了，应该由哪个单位发起呢？我正在绞脑汁，西民伯伯却已经开始行动了。他自告奋勇去找住在他家楼下的某个党派负责同志，建议由他们发起组织这次纪念会，因为我父亲曾是这个组织的主要发起人和第一届理事……。

要召开这个纪念会需要得到党中央的批准，可是过去熟悉了解父亲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如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和熊瑾玎等老前辈都已先后辞世，而新一代却不清楚，甚至没有听说过父亲的名字，因而虽有阳翰笙、夏衍、胡绳、钱俊瑞、丁玲、许德珩等70多位老共产党人和知名人士的共同发起，纪念会仍然险些流产。这时，又是石西民、于刚等伯伯和



民革中央的屈武、王昆仑、朱学范、贾亦斌、沈求我等诸位有胆有识的老同志和老共产党人给我以热情的支持，鼓励我排除万难，争取成功。

在习仲勋等同志的支持下，1985年6月29日在全国政协礼堂由民革中央组织召开了“张西曼教授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赵朴初、张友渔、屈武、廖静文、杜建时等许多父亲的生前友好和学生纷纷出席了座谈会，王昆仑伯伯也抱病从医院里赶来参加。会议由朱学范副委员长主持，并介绍了父亲的生平，石西民伯伯与姜椿芳、孙晓村、潘菽、林亨元等伯伯也都先后做了热情洋溢、感人肺腑的发言，从新华日报、对苏关系、救国会、九三学社、法律等不同的方面介绍了父亲在历史上的贡献。陶大镛伯伯虽然远在江苏开会，也及时寄来了书面发言稿，由他的夫人牛平青阿姨在会上宣读，寄托了他真切的怀念。总之，这次纪念会开得非常成功。散会时，代表中央统战部出席会议的李定副部长握着我的手，转达了习仲勋副总理深情的叮嘱：“希望你把老一辈的材料整理出来，以教育后代。”西民伯伯，这次纪念会的胜利召开，是在您的积极倡导和全力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的，我终生也不会忘记！

在西民伯伯的遗体告别式上，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拖着沉重的脚步，久久地在灵堂外徘徊。我见到廖沫沙、熊复等许多老同志的挽诗、挽联。廖沫沙伯伯在诗中写道：“自从西民逝去后，从此失去谈心人。”是的，人生难得几知己，我对此也深有同感。西民伯伯，您知道吗，我们都真切地怀念着您。您的英名永远刻在我们心中！

（原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
分会通讯第12期，1989年6月20日）



应是飞鸿踏雪泥

——石西民《时代鸿爪》序

林放

能够见到石西民同志把他从事新闻作品的作品编集出版,在我是非常高兴的事情。高兴,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同行同业,都尝过新闻工作的甘苦。平时总觉得:比起我国文化其他领域的作品来,新闻领域的作品是常被冷落的。在某些正统派的评论家看来,新闻体裁的通讯、特写、评论、札记等作品,终究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就是我们当了几十年的新闻记者,也很少想到自己的作品可以编集成书,以文会友。现在西民同志破了这个成见,出了这本书,为我们新闻圈增添了热闹和活泼的气氛,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

这本书取名《时代鸿爪》,也是很有意思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拿苏轼的名句来概括这本集子的内容,是说在这些文章里留下了时代的痕迹,就像飞鸿在雪泥上印下指爪一样。这可能是

• 《时代鸿爪》为石西民近50年间作品的自选集,收有经济研究、新闻通讯、日本研究、政论、回忆、新闻研究等102篇。新华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



作者取名的原意吧。但是我却更其喜欢另一种“题解”，也不妨把这些文章看作是作者在各个不同时期和不同年代留下的梦痕和脚印。究竟是时代这个飞鸿留在作者笔下的指爪痕迹呢，还是作者这个飞鸿留在各个时代的指爪痕迹呢？倒有点像“庄周梦蝶”的寓言：“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我看两者都说得通，而且都合乎实际。

着眼于时代的痕迹来看待“鸿爪”，我们从本书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抗日战争前后，解放战争期间和建国时期的世态和国风。这是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从黎明前的黑暗到“明朗的天”。它包括着三座大山的崩坍，两个中国命运的搏斗。风云变幻，惊心动魄。这就是印在这本书里的“时代鸿爪”。

倘若着眼于作者在各个时期留下的梦痕脚印来看待“鸿爪”，我们从这本书的篇章中仿佛看到一个作者的面影：是那么一个旧时常见的文弱书生，他是怎样搭上了时代的脉搏，一步一步地从纯真的爱国主义走向美好的共产主义。他又像一个弄潮儿驾一叶扁舟，在那狂风骤雨的黑夜，冲破汹涌澎湃的波涛，执拗地朝着远处一闪一闪发光的灯塔航行。

不论是时代在作者笔下留下的鸿爪，或是作者在各个时期留下的鸿爪，现在都已成陈迹了，有的已经恍如隔世了。然而，“六经皆史也”，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都是值得今人回顾和后人追念的。它决不像苏轼原诗所说那样只是偶然地留下了指爪；也不会像苏轼所感叹的那样留下指爪之后就“鸿飞冥冥”，“不计东西”。应该说，时代的指爪是理有固然，有它的因果缘分的。而作为这个时代的人，也得对他所经历的时代负责，对他自己印下的指爪负责。从这点意思开开，编印这本文集而名之曰《时代鸿爪》，那意义是颇为严峻的。



西民同志为人简易谦和，他的谈吐文风亦如他的为人。我们相识 40 多年了，平时见面机会却不多。抗战期间同在重庆，即使偶然同坐冷酒摊摆龙门阵，也很少听到他说起自己的经历和笔墨生涯。所以本书中有许多事情是我以前未曾知道的，这也增加了我对这本书的兴趣。他那时在《新华日报》工作。在蒋介石的大本营办革命报纸，有如踏虎尾，捋虎须，工作条件十分险恶。那时当记者，出门就干采访，回报社就当编辑，写通讯，撰评论，举凡古今中外，国计民生，社会现象，什么都写。这样的记者生涯，正如这本书所收文章体裁的既广又杂，还是值得我们回味的。而且那时办《新华日报》，不止要从事笔耕，实际上是在白区做党的工作，做统一战线工作。这些都是属于时代的“鸿爪”，值得介绍给如今青年一代的同行知道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花开花落，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现时彼此都已年逾古稀，白发盈颠，难得再有巴山夜话、浦江雅集的意兴和机缘了。所喜见到这本《时代鸿爪》，有如晤对老友，想象作者生平，也可以略抒故旧情怀。出版之际，作者特意让我写点闲话，附在书里。这是我的荣幸，自然是很愉快地写了这么一些感想，表示高兴，并以之请教于作者和读者。

1984 年 6 月



赞《时代鸿爪》

陈虞孙

偶于5月21日《人民日报》第八版上读到林放的《应似飞鸿踏雪泥》一文，连读了两三遍，觉得此文写来放得开。而且透过文字，让你看见了人。文内提到巴山夜话、浦江雅集，就映出了人。却又不是把几十年前的陈谷子、烂芝麻带着一股霉气倾倒出来。而是时代的“鸿爪”，值得介绍给如今青年一代的同行知道。

然而，这里所谈的“鸿爪”却又不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古老话。

林放此文，是为西民同志的结集而写的，取名《时代鸿爪》。这是一位老记者的多年工作的留痕。以寓飞鸿在雪泥上印下爪痕之意。这样的留痕结集，正是老记者的特色。在这些结集里，既有他走过的时代的痕迹，又转而成为他工作的痕迹。正当老记者白发盈颠的时候，将多年结集整理出来，公诸当年战斗在同一壕塹的战友，既是历史的回顾，又是友情的重温。如百年佳酿，久而弥香。西民同志找林放为其结集写这篇文章，题目与作者都找对了。这是新闻界的韵事。林放说，“平时总觉得：比起我国文化其他领域的作品来，新闻领域的作品是常被冷落的。在某些正统派的评论家看来，新闻体裁的通讯、特写、评论、札记等作品，终究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这真



是，“牢骚太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我看，量一量，新闻战线上的作品，并不会令人气短的。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眼前林放这篇文章就是个例子。

久不为副刊作短文了。每日见到晚报，就好像债主上门讨债，不免惶恐。今天看了人民日报第八版那篇林放的好文章，便按捺不住，非写不可，似乎师出有名，理直气壮起来。于是一挥而就，并以就正于西民同志。

（原载上海《新民晚报》1985年6月1日）



《报人生活杂忆》序*

张友渔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石西民同志记述他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斗争实践,和他晚年对开展近代新闻史的研究、对建设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思考和探索。

石西民同志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中,有在各种环境下从事新闻工作的斗争实践。1930年,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被派担任秘密出版的党报《红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可说是和新闻工作开始结缘。1936年,他被聘担任具有爱国民主倾向的《申报周刊》编辑,正式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了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从1937年冬《新华日报》在武汉筹备出版,石西民同志就参加了党报工作,以后又担任编辑主任、采访主任等领导职务。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直到1946年11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被迫撤回延安的9年中,西民同志一直在情况十分复杂,斗争十分严峻的形势下,为党的新闻事业坚持战斗。石西民同志不仅有在国民

* 《报人生活杂忆》为石西民同志的新闻文集。由姚北桦、王淮冰编辑,重庆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



党统治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也有在解放区从事新闻工作的实践。1938年6月，他作为《新华日报》战地记者到前线和敌后采访，在到达新四军总部后，就被委派参加《抗敌报》的筹建工作，并在新四军总部的教导队创办了新闻训练班，为新四军建设新闻工作队伍作出了贡献。1946年冬，他被迫从南京撤返回延安后，又参加了新华通讯社和《解放日报》的领导工作，继续在新闻战线上作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1949年4月南京解放，西民同志被任为南京《新华日报》社长、新华通讯社南京分社社长、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从而又取得了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建设人民新闻事业的宝贵经验。正因为西民同志有在各种不同环境和条件下从事新闻工作的斗争实践，通过研究、比较，使他能够全面、清醒和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工作中的成就和失误，给今天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以启迪。在《报人生活杂忆》一文中，回顾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时，他在充分肯定党报团结人民、鼓舞人民的伟大作用的同时，虚心、坦诚地检查当年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指出：“那时王明顶着共产国际吓人的头衔，又是长江局的领导人，他在武汉颐指气使，推行一套右倾投降的政策。”由于王明的干扰和影响，因而使“《新华日报》在武汉时期确实宣传了一些右倾错误观点，影响很坏，成为我们终身难忘的教训。”在承认这种干扰的同时，他又实事求是地指出：“王明的干扰毕竟就是那么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报馆同志还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抵制和斗争。综观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宣传报道的主要方面是好的。我们不能因为有王明的干扰就简单地否认了这一时期报纸的全部工作。”联系王明对党报宣传的干扰，西民同志以共产党人的坦白襟怀，记述了党报一次宣传失误的教训：“抗战初期，王明、康生



从苏联一回来,就通过作报告、写文章,声色俱厉地指斥陈独秀是领取日本津贴、破坏抗战的汉奸。”《新华日报》宣称陈独秀是“汉奸”后,引起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的疑惑与不安。石西民同志在实事求是地评价了陈独秀在近代革命的历史功过后,严正地指出,王明、康生的指斥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诬蔑不实之词。“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材料证明陈独秀是一个降敌叛国的汉奸。”由此,“我深深感到,我们的报纸一定不能在充分事实根据的情况下,武断地做出政治结论;如果我们的意见不符合事实,一定要允许讨论。否则,我们的报纸就担当不起人民大众的耳目、喉舌这一光荣的称号。”

石西民同志根据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对我国近代新闻史的研究,对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提出过许多真知灼见。他希望报刊史料的搜集,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认真注意“我们历史上有许多为推动国家改革而作出重大贡献的报刊和著名的报人,他们的光辉业绩和经验教训,很值得今天新闻界同人学习和效法。他们所写文章对当时人民思想影响的强烈,对推动社会历史所具有的理论威力,就值得在改革声中的今天报刊同人深思。”新闻史的研究,“在史料的发掘、整理的工作中,要更加重视真实性原则。资料要求立准、立确,因为这是研究的基础。”“客观材料,特别是事实要立准确,绝不能无中生有,小大由之。”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上,他热情呼吁加强抗战时期新闻史的研究,他指出:“伟大的抗日战争年代是中国新闻界大团结的时代,是中国新闻事业向祖国纵深地区大发展的时代,是中国新闻事业破天荒与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士兵、工人、农民发生血肉联系的时代。……也是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



和新闻研究空前发展的年代。”延安《解放日报》整风改版后，“提出以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为中心内容的办报思想，和重庆《新华日报》根据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报纸的党性就是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等办报思想，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总结出来的我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重要内容，它丰富了我国新闻学的宝库。”

对于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站在时代前列、推动时代前进的报刊和新闻人物，西民同志都充分肯定他们在发展我国新闻事业上的贡献。他高度评价史量才先生的爱国热情、民主追求和《申报》对中国文化学术的重大贡献。对为中国进步文化事业默默奉献一生的俞颂华先生，表示了深切的追怀和敬意。在祝贺《文汇报》创刊50周年时，他认为《文汇报》能对人民事业作出贡献，是因为“经常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紧紧地依靠读者，尊重读者，因而赢得了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尊重。”“《文汇报》的工作效率、革新精神、艰苦奋斗和培养干部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仿效称道的地方。”

我和西民同志相识将近半个世纪，在党的新闻战线上曾经风雨同舟，并肩战斗。抗日战争期间，当我参加《新华日报》工作时，他是报社的采访部主任，在重庆新闻界已经有相当知名度的记者。工作中他不畏艰难险阻，勇挑重担。抗战爆发后，他两度担任战地记者，深入前线 and 敌后，以他敏锐的观察、犀利的笔触，报道前线和敌后将士浴血奋斗的英雄事迹，激励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受到新闻界同行的称赞。西民同志勤奋好学、知识面广，在党报、党刊上，他经常撰写日本问题、经济问题和文化思想方面的文章，在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上恪尽一个新闻战士的职责。西民同志为人胸怀坦荡，平易近人，生



活俭朴，不矫饰，不矜持，党报的年轻同志都把他看作可以信赖的兄长。在采访工作中，他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重庆各报的进步记者为核心，团结一切爱国和有民主要求的新闻同业，在新闻界逐步建立起宣传报道上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关系。1945年重庆的胡世合事件、1946年较场口事件中，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共同目标下，重庆新闻界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斗争的规模和深度都有了空前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的法西斯气焰。40年后，他追怀往事，仍然满怀激情地说：“为了推进抗战的胜利而广泛开展民主运动时，进步新闻战士之间的肝胆相照、团结战斗，在抗战以前的中国新闻界很难有这样的规模和深度。这种在民族解放民主建国的共同目标下的大团结，实在是中国新闻界破天荒的事。”

1953年后，西民同志被调离新闻工作岗位，改做宣传、文化方面的工作，但仍然以极大热情关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10年浩劫期间，他被非法囚禁9年多，身心遭到极大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成立，我和西民同志被战友们推选为会长和副会长。此后，西民同志为撰写党报、党刊史倾注了很大的心力，使《新华日报史》和一批有关的史料得以陆续出版。

西民同志勤勤恳恳为党工作50余年，他诚恳正直，才识卓越，在建设人民的新闻事业上作出过可贵的贡献。《报人生活杂忆》既是风云变幻时代的雪泥鸿爪，也是一个革命的新闻战士为崇高理想而不惜奋斗终生的献身精神的记录。我想，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史学工作者从本书作者对新闻史的研究，对建设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思考和探索中，是能够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和教益的。



西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展读遗篇，40多年前
艰危与共的战斗岁月有如昨日。写此短文，也是抒发我对老战
友的怀念！

1989年4月



读石西民书感往

何满子

《报人生活杂忆——石西民新闻文集》的编者姚北桦、王淮冰同志在寄给我此书的同时，附函道：“你既是老报人，又是石西民同志的知音，应该有义务读此书写点读后感的。”“老报人”和“知音”谈不上，但对石西民其人其书，确实有其不能已于言的理由。

石西民在“文革”中受难的“罪状”之一就与我有关，大字报上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打了×一同出现，指控他包庇了“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我。对他的这一连累使我长时期深深负疚，直到1984年他途经上海，解放前几个新闻界老同仁在南京路扬州饭店宴请他的聚会上，才有机会向他表示歉疚之意。他却宽容地笑道：“不关你事，我罪孽深重，有你没你一样。”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如果要上纲上线，说他包庇过我确不是无因的。1963年我在宁夏拉了几年板车，患重病不堪劳动，濒于绝境时，以“病笃乱投医”的惶迫之情，写了一封凄苦求告的长信给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专管文教工作的石西民同志。我和他其实没有特殊关系，除了解放前曾给重庆《新华日报》和上海《群众》周刊写稿的这点渊源以外，只于1946年做记者时经范长江介绍，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见过一次，估计不会给他留下什



么印象。真没想到呼吁信发出几天以后，立即收到了他的电报，要我立即回上海向出版局报到。事后我才知道他曾特地到出版局关照，立即将我宁夏调回安排。如果没有他的援救，我多半是死在腾格里沙漠中了。回上海后，我打电话要求他约见，向他面申感激之意，他说：“不必感谢我，我是为党做知识分子工作，感谢党好了。”我想也是：他和我谈不上私交，要说“包庇”，那是党“包庇”了我，使我能存活下来，好歹给社会做点事。

1958年从上海分到宁夏、青海两地的文教宣传系统的人有好几百，据我所知，在那个严峻的年代被明令调回上海的，只有尚丁和我两人，可说是“异数”。尚丁是民主党派的活跃人物，和北京民主党派的高层人士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的被调回有统战政策上的意义；而我，则是一个小人物，只是他任市委宣传部长和市委书记领导下的单位中的一名小卒，如上所说也谈不上有什么私交。他在本书中追述在重庆《新华日报》时的艰辛斗争时感慨地道：“我常常想：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才认识朋友的可贵，而当他忘记了朋友时，他实际上也就忘记了革命。”他显然是以这样的怀抱和心情才给我以无私的援助的。在60年代初期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这样紧的时候，先前我的出事都在他任宣传部长时期，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倒霉的身份，向我伸出援手，从他本人来说，是有害无益的，诚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不是以革命者的坦荡无私的胸怀，一个共产党员的物与民胞的风义，他就不会如此关心我的命运。这种高尚的情操是私心甚重的“文革”好汉和庸人们所无法理解的，就理所当然地被上纲为“包庇”罪，要分辩也无从分辩起，没有共同语言和讨论基础。



我在窘急中之所以向他投书，不仅因为他是市委书记，更因为他是民主革命时期长期在蒋管区工作的新闻工作者，和范长江、孟秋江等有数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一样，社会联系很广，很能理解旧社会环境中的知识分子，不像一些对当时的情况隔膜的干部那样，对旧社会过来的文人怀有定见。再则，知道石西民是正直、热情、知情达理而善于为他人设想的热心人。最后，我也依仗着相信他大概还记得起我，因为解放初期我曾打算写电影文学本《冼星海传》，此意告诉了在南京的一个朋友，那时石西民还在南京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南京的朋友在闲谈时偶而向他提起此事，他说他还记得1945年冬我曾在《新华日报》发表过一曲《冼星海悼歌》的事。

他的记忆力也真不平常，《报人生活杂忆》所收的都是他晚年回顾一生新闻工作历程的文字，所记的历历往事都能勾起读者对过去年代的追忆，真挚、朴素、不求华美而自然，文采斐然，完全可以当作抒情散文诗。这里面有他当年所接触的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伟人的风采，有对新闻界、文化界不少知名文化人的缅怀。更多的是他本人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在解放前蒋管区艰苦复杂的环境下许多事件的曲折遭遇。他以一个历史见证人和参与者的身份，既概括又形象地娓娓叙述着历史，有生动的描叙，有经过反思的评价，也有深长的感慨。他以他的经历照亮了时代生活的许多方面，绝不仅仅是报人生活的回忆，各界读者都将对本书感到兴味而且获益。

石西民曾在我十分危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但我却并非以这层关系的感激心情评述此书，而只是以一个诚实的读者的眼光，读了这本《报人生活杂忆》，感受到益处，才说了上面这番话。倘若只是由于受惠的私情而讲些虚美之词，那就对不起



读者,也更对不起施援于我时也是毫不由于私情的石西民同志了。记得 1984 年最后一次见面后我曾寄他一诗,中有一联云:“我自经危仍故我,君谢党莫言怀君”。故人的佳言,区区此心,当中心藏之,何敢一日忘之?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1991 年 10 月 6 日)



雪泥鸿爪启人思

——《报人生活杂忆》读后

姚江屏

一代名记者石西民新闻文集《报人生活杂忆》，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是继他的早年新闻作品自选集《时代鸿爪》一书之后，由老报人姚北桦、王淮冰两同志精心选编的又一本风云变幻时代的雪泥鸿爪，都是这位饱经沧桑、阅历壮阔的老报人晚年以回忆形式撰写的精采遗篇。作者通过深情回顾，总结自己在党的新闻战线上走过的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记述武汉和重庆时期《新华日报》的战斗历程；对新闻界前辈人士和亲密战友的缅怀和悼念。既有真情，又有实感，志深笔长，诚启人思。《报人生活杂忆》还附录了《石西民诗抄》和《石西民年表》。这本集子，应该说是一个革命的新闻战士为崇高理想而不惜流血牺牲献身精神的记录，它的出版，给年轻的一代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益。

石西民同志自1937年参加《新华日报》工作，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多次深入前线采访，经受过血与火的考验，走遍了大江南北，不仅有在国统区从事新闻工作的丰富经验，也有在解放区从事新闻工作的亲身体会。南京解放后，担任南京《新华日报》社长、新华通讯社南京分社社长、南京人民广播



电台台长,从而又取得了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建设人民新闻事业的宝贵经验。张友渔同志为这个集子写的序言中说,“正因西民同志在各种不同环境和条件下从事新闻工作的斗争实践,通过研究、比较,使他能够全面、清醒和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工作中的成就和失误,给今天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以启迪。”他晚年对开展近代新闻史的研究、对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思考和探讨,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更值得在改革声中的今天活跃在新闻战线的报刊同人深思。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党报。人民群众是要通过这张报纸的工作人员的具体表现来认识中国共产党,来衡量《新华日报》的新闻、言论的价值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西民同志在《报人生活杂忆》中,有很精辟的忆述。作为一张党和人民的报纸,它的工作人员必须注意自己的榜样作用,凡是报上宣传要人民群众去办的,自己就应首先做到,“这是我们宣传工作乃至整个党的形象的命脉问题。品德情操,言行一致,始终保持共产党人光明磊落,艰苦奋斗的本色,不做出榜样,全部报纸工作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使党报蒙受污点。报纸不受欢迎,又怎么能够很好地宣传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把马列主义的真理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教育人民群众呢?”党的新闻工作者应作为人民的一员来工作,新闻记者不是“官”,不是站在高于人民的地位,自封领导,摆一副领导架子。“党的一切工作包括宣传工作,都要做到使广大群众不感觉我们党在领导而实现党的真正领导。”“只有当人民群众把我们的报纸看作是代表他们讲话,讲他们要讲、想讲的话的时候,才真正起到党的喉舌、人民向导的作用,党报的工作也自然做好了,党性也加强了。”增强党性,深入群



众,事实第一,新闻必须真实,决不轻着一字,不容有丝毫假借,来不得半点抽象,每一个新闻记者任何时候都要警惕片面性作怪,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党的总政策就会迷失方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任务,是用文字来反映伟大的现实生活,通过自己的笔很好地来报道与指导人民的斗争。西民同志的这些切身体会,由衷之言,使我获益良多。

西民同志治学谨严,《报人生活杂忆》中他的关于新闻工作、新闻写作、怎样才能做好新闻工作,从反思的角度有较多篇幅深刻的论述,很值得年轻一代新闻工作者学习借鉴。在这本文集中,斗争的实践,宝贵的经验,虚实结合,情文并茂。诚如编者所说,它的出版,无疑是对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的最好纪念。

(原载四川《新闻界》1992年第1期)



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

——读石西民新闻文集的启示

刘 峥

读了老报人姚北桦、王淮冰合编的《报人生活杂忆——石西民新闻文集》(以下简称《杂忆》),深受教育。石西民同志是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闻名全国的新闻界前辈,新闻工作实践极为丰富,而且取得卓越的成就。读了这本文集,使我思绪万千,获得很多启示。

启示之一:要在深入观察、辨别、 研究问题上下功夫

石西民同志从事新闻工作,成功的奥秘在于深入。他的体会是:“要做一个名记者,这个名是必须由人民来批准的。这当然很不容易,但只要专心致志下苦功,工作总是会逐渐做好的。”又写道:“我们新闻工作者最容易犯的毛病之一是不深入,有的应该说是深入了,但感不到新鲜事物,发现不到什么材料,深入宝山,还是两手空空,生活在那里久了,觉得平淡,一般化。这是缺少对新鲜事物感觉力,自己思想就像枯井,这样写东西无论如何是不会生动的。”石西民同志从涉足新闻界



开始,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之中,自1937年冬参加《新华日报》在武汉筹备出版,直到1946年11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被迫撤退延安的9年中,一直在情况十分复杂、斗争十分严峻的形势下为党的新闻事业坚持战斗,并曾两度深入前线和敌后担任战地记者。

石西民同志认为“作为一名战地记者,经常要往火线上跑,越是战事激烈的地方越是要去。”在赣北战场上,日寇进攻金轮峰时,他闻讯立即赶到战地指挥所,随国民党某师长奔赴前线。我新四军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在江南夜袭日寇时,他也是行军队伍中的一员。由于深入前线,写出了当时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赣北战地见闻》、《金轮峰歼敌记》、《一年来的新四军》、《越过江南封锁线》等报道。他自己在一次采访归途中险些儿献出了生命。

石西民同志的深入还在于对观察、辨别、研究问题下了很多功夫。他采访人和事,总是全方位地进行观察,辨清真伪和是非,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找出事物的本质和其新闻价值。他写出的作品既有宏观的气势,又有微观的分析;笔下的人物既有音容笑貌,又有内心世界,人们读了如身临其境,深受感染。《杂忆》里有一段描述1939年春周恩来陪同北伐名将叶挺赴皖南就任新四军军长的情景,有这样几句:“我十分注意叶挺军长的讲话。在他讲话时,态度恳切,感情真挚,但又使人感到似乎有些沉郁,令人担忧领导层的合作。”这50多字点出了“皖南事变”我军蒙受重大损失的内在原因,是很有力度的,可以看出石西民在观察问题方面所下的功夫。抗日战争历时八年,斗争极其复杂、尖锐,《杂忆》中记述这段历史的文字,给人留下清晰而深刻的印象。《赣北战场》一节既写下了日寇1938



年疯狂肆虐我大好河山的嚣张气焰，也记录了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士努力作战的功绩。《一次没有成功的夜袭》一节既显示了我新四军越战越强的英雄气概，也表现了日寇在新四军频繁打击下陷入困境闻风而逃的狼狈相。这段文字还引用了日军俘虏对这场侵略战争的控诉，说明战争不但害了中国人民，也害了日本人民。深刻地揭示了这场战争的本质和日本侵略者必败、中国人民必胜的规律。

启示之二：增强党性，正确宣传党的政策

1983年《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出版后，石西民同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将通过学习这本书而吸取无限的智慧和力量，增强品德修养和才干。如果学习是联系自己的实践的，经过反复探索和体会，收获一定会更大一些。”并且明确提出这本文选的中心思想就是“增强党性，反映群众”八个大字，这就是“党的新闻工作者最重要最关键的东西”。

石西民同志正是紧紧围绕这一中心，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探索和研究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对增强党性问题、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办报的群众路线问题等诸多方面，都具有真知灼见。在增强党性问题上，他总结了在“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干扰下所犯的错误后指出：“党性这个词，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释，增强党性也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可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努力去正确宣传党的政策，使广大群众都知道，做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的来做’（见《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这不就是党性的最突出的表现吗？”“正确宣传党的政策是新闻工作者面临的一大课题，半点不能掉以轻心。”回想某些时候新闻媒介在舆论导向上所犯过的错误，正是偏离了党的正确政策，宣传了错误的政策所造成的。对于如何才能正确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石西民同志认为：“除了学习理论之外，我看还是必须像毛泽东同志一再教诲的那样：深入群众，参加实践斗争。不能了解群众的真实心情、意见，任何高明的记者也无法防止倾向性错误。”这些精辟的观点，石西民同志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一直是身体力行的。

启示之三：重视思想品德的修养

《杂忆》中有多篇回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我党我军领袖人物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石西民同志非常重视学习领袖人物崇高的思想品德。他在《缅怀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的日子》一文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到重庆，是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党中央所采取的最重大的政治决策。毛泽东同志为反对内战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而冒险前往重庆，与国民党当局面对面进行政治斗争的实践，至今仍然是每一个革命同志学习的丰富宝藏。”他对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共产党人和党报工作者必须言行一致的观点和陈毅同志水晶一样的人格非常赞扬和敬佩。在《周恩来同志与〈新华日报〉》一文中写道：“周恩来同志十分强调党报工作者的言行一致，凡是报上宣传要群众去办的，自己就应首先做到。这是我们的宣传工作乃至整个党的形象的命脉问题。”

石西民同志还写过多篇回忆老同志、老战友的文章。他对



“大布是其衣、一生只服务”的潘梓年，“双膝未展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的华岗，“腰缠万贯、只取薄薪”的熊瑾玎，“不以物移、不为己忧”的恽逸群，“正直无私、勇担责任”的刘述周等同志满怀思念和敬佩之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石西民同志是很注重思想品德修养的。石西民同志从1929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到1987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在近6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革命坚贞不渝，对同志满腔热情，对朋友肝胆相照。当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一位即将离渝的编辑所作壮行诗《赠别》中写道：“夜正黑，但长虹在手，壮志不灭。看中华儿女斩荆棘，热血头颅抛掷处，旭日东升急。”对革命形势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文化大革命”期间，自己受“四人帮”迫害，被非法囚禁七年零两个月，在狱中受尽折磨，仍然“方思秋壑开红叶，定卜春郊遍绿茵”，对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深情似醉”。临终前一年，石西民同志读完中宣部所赠《中外古今年轻有为政治人物选辑》和《外国一些政治要人退休后的社会活动》两书后手题一诗：“京华咫尺久相疏，喜得南铖两册书，知止求真须自励，悬鱼不羨淡清居。”悬鱼是指东汉庐江太守羊续拒下属送鱼，将鱼高悬屋檐，直到晒干发臭，以示廉洁自守。这四句诗，可以说是石西民同志终身自律的写照。

江泽民同志1991年11月4日视察新华社时，对新闻工作人员提出了两点希望：学习、学习、再学习，深入、深入、再深入。石西民同志堪称学习和深入的典范，他的《报人生活杂忆》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

（原载南京《新闻通讯》1992年第2期）



悠悠故乡情

支德裕

1980年冬至1981年春，我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中国新闻史。上午听课，下午有时间拜访一些老报人。大约是1981年1月的一天下午，我去木樨地看望《新华日报》的老前辈石西民同志。

西民同志在他寓所的客厅里接待了我。客厅是宽敞的。一边并排放着几只书橱，一边是沙发，靠南是书桌。我原先知道王禹斌同志住在他家，因此没带介绍信之类。当时禹斌同志有事外出了，我只好自我介绍一下。他知道我是南京《新华日报》来的，好像一下子缩短了距离。虽是初次相识，我觉得西民同志待人态度谦和，平易近人，听他谈话，如同家人晤对，十分亲切。

西民同志说着，随手把他刚写完的一篇稿件递给我看，说：“给提提意见，这是我刚写完的一篇稿件。”我当即把那篇文章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内容是对故乡的一点期望。西民同志是浙江浦江人。文中提到：1956年秋天，他到杭州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殷切地向到会同志谈了编辑出版乡土教材的重要意义，希望西民同志等能把浙江省的乡土教材搞出来。西民同志在文中写道：“惭愧的是20多年过去了，我对此毫无建树。”他当时对我讲，他心中一直惦记着



这件事，老人家交给他的任务没有完成，心中感到内疚。他说，这件事只好靠浙江人民自己来完成了。因此，他在文中语重心长地写道：“今天学校里，对乡土教材大概也是不够重视吧！我想，如果所有的浙江人或每一县的人（全国各地也一样），都知道本省、本县的历史，了解故土的科学文化、物产、人物，从而激发人们热爱故乡，热爱祖国，积极投身四化建设，这该多好！”他接着写道：“我的这种心情，最近一再被偶然的情景所触动。前不久，偶然看到一本台湾翻印的我县的县志。翻印的底本是光绪年间我县最后一次修订的县志。翻印本里还印有几十个出钱翻印的同乡人的姓名，其中也有我的本家后辈。他们这样做，不是怀念乡土的真挚表现吗？说来惭愧，我自幼离家，第一次读县志，却是台湾翻印的，时间是1980年，转眼我已70岁了。”文末，他提出了殷切的希望：“爱祖国，爱故乡，这是美德，这是力量。今天的新中国，应该发扬编纂地方史志的好传统”，“我祝愿浙江省主管宣传、文教的领导同志，科研单位、学者、有志人士，来发扬这个传统吧！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这件工作开展起来。这是建设强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需要，也是创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读完这篇稿件，我为西民同志严肃认真的精神所感动，为文内真挚的感情、犀利的文笔所感动，我更为他那种虚怀若谷的态度所感动。你看，一个一辈子从事新闻宣传、文化工作享有盛名的老前辈，自己写的文稿，一见面就拿出来给我这个无名小卒看，征求意见，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5月24日《浙江日报》的“寄语故乡”专栏内。



如今，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著名报刊活动家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热爱故乡的精神却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原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
分会通讯第9期，1988年3月1日出版）



石西民倡议为邵飘萍烈士塑像

任贵银

石西民同志辞世的噩耗，使我们震惊，使我们悲痛，我们为失去新闻界的一位革命前辈而哭泣，而惋惜。悲痛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往事不禁在我们的心头萦回！

石老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对我国著名新闻战士邵飘萍怀有深厚的感情。1984年，他首先倡议为邵飘萍烈士建立铜像。他的倡议，得到了《人民日报》、《文汇报》等18家新闻单位的响应。在筹建过程中，他不顾年迈多病，多次用电话与首都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联系，为铜像筹措资金。在他的敦促下，筹建工作进展顺利。当我们第二次赶到北京向他汇报筹备情况时，他热情地接待我们，问这问那。当他得知铜像需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题词时，思考了片刻，郑重地说：“我去请陆定一同志写。”不久，果然寄来了陆定一同志的题词：“邵飘萍烈士永垂不朽！”

当我们再次赶到北京，请他审查邵飘萍铜像小样时，他是那么兴奋，从卧室快步走到会客室，连连说：“好，好，你们抓得真紧呀！比我预料的要快。”他一边让坐，一边给我们端来了水果，一定要我们吃。在审查小样时，他是多么认真呀，站在远处看，又走到跟前瞧；然后端在手上正面看，侧面看，还不住地说：“不错，不错，很有神采，像个新闻战士，这要感谢雕塑家



啦！”说得在场的铜像设计者章永浩副教授不好意思起来，忙说：“石老过奖了。”那一天，他和我们谈了很久，详细询问了建造中的各个环节。当我们告辞出来，他还一再叮嘱，有什么困难只管来信。

去年7月，邵飘萍铜像终于在金华婺州公园落成了，我们给他发去了请柬。这时，他重病在身，医生叮嘱他不能远行。无奈，他从北京发来了贺电：“对邵飘萍铜像的落成表示衷心的祝贺！我因身体欠佳，不能前往，深表歉意。”

通过这一段工作联系，我们视石老为尊师，他对我们更是关怀备至。

去年8月，他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时代鸿爪》，特意寄给了我们，并在扉页上亲笔题词，使我们深受感动。石西民同志关心故乡的党报《金华日报》，希望报纸成为群众的知心朋友。他曾说：“一张报纸办得如何，以什么作检验的标准？我说只能以群众是否关心、热爱它作为检验的标准。……希望金华日报的同志一刻也不要忘记倾听群众的呼声，把报纸办成群众爱看的人民自己的报纸。”

石老，你安息吧！我们将牢记你的遗言。

（原载浙江《金华日报》1987年10月25日）



石西民对故乡婺剧的一片深情

王志忠

我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动人的彩照：石西民同志穿着白衬衫，一手拉着方允均，一手拉着傅慧娟，旁边是郑兰香和我。大家笑容满面，像是战友重逢，又像是亲人团聚。这是1985年6月在北京国务院一招的宴会厅里拍摄的。石老和这三位婺剧演员重逢时的激动和欢愉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

1987年8月31日，我出差去吉林路过北京，又一次来到了石老家里。和往常一样，石老总是饱含乡情地问起家乡的一切：粮食生产、报社情况、婺剧演员……他刚从医院出来，身体是那么羸弱，但情绪却很好。告别时，他握住我的手说：“你从吉林回来，一定到我家来吃饭。”后来，我因故改道从大连回金华，谁能想到，这竟是我与石老最后的一次见面！

我第一次见到石老是1962年。当时，他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石老从小酷爱家乡戏，为了使婺剧这朵古老的奇葩在上海的舞台上争艳竞放，传播婺州的古老文明，特邀请浙江婺剧团再次赴沪演出。我作为“浙婺”的先行人员，带着演出合同到上海市文化局联系演出场地等问题。没想到演出处的同志皱起眉头说：“啊呀，上海的剧场紧张，不大好安排。”其实，他们对婺剧不很了解，怕观众不欣赏。我向石老汇报了这一情况，他听了很不高兴：“哪有这种事？请演出处长到我这



里来一趟！”我想，这下处长该挨批了吧？但事后知道，石老对文化局的同志并没有批评，他对那位处长说：“浙江婺剧团是我请来的，请你们尽量安排一下吧！”他还向那位同志宣传了婺剧的特色，并说，正因为上海的观众不了解婺剧，就更需要让他们看看。寥寥数语，反映了石老对婺剧的关怀和支持。

那一年“浙婺”进京演出时，长影的一位导演为婺剧的艺术所倾倒，准备将《三请梨花》搬上银幕。石老知道后既高兴又感叹地说：“南方的婺剧却由北方的制片厂拍摄，为什么华东的厂不能拍？”上影厂知道后，马上进行了研究，但后来因种种原因，没有拍成。1964年，根据大型越剧《双莲记》改编的婺剧艺术片《双红莲》，决定由上影厂拍摄，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石老非常高兴，亲自设法帮助解决所需的进口彩色胶卷。导演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担任，演员已试了镜头。无奈“文革”风暴骤起，这项计划又给冲掉了。

1982年，第一部婺剧艺术片《西施泪》问世，石老高兴地说：婺剧终于上银幕了。石老不止一次地对金华文化部门和婺剧团的领导说：你们要多出来走走，特别是争取到上海、北京演出。我在中央广播节目里很久没有听到婺剧了。一个剧种的发展要有好剧本、好演员，还要靠宣传。

石老爱婺剧，关心婺剧演员的成长。从周越先、徐汝英、周月桂到郑兰香、吴光煜、严宗河、葛素云……都不止一次地聆听过他的教诲。1959年，石老邀请“浙婺”第一次去上海演出，目的是为了宣传婺剧。当时气候寒冷，石老特地安排演员们住在锦江饭店。演出期间，他几乎场场必到。除夕之夜，石老设宴和大家一起吃年夜饭，饭后又冒雪陪大家到文化俱乐部参加活动。1984年11月，石老和弟弟石士助专程来金华，参加



邵飘萍烈士诞辰 100 周年纪念活动。会议结束后,他已经很疲劳了,仍赶往衢州去看望正在那里演出的“浙婺”的同志们。演员们拉着他的手,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和老师。

石老对婺剧的关怀之情,像婺江之水,永远在故乡人的心里流淌!

(原载浙江《金华日报》1987 年 12 月 6 日)



“迟暮犹燃赤子心”

——记石老最后一次故乡行

沙恩存

1982年4月下旬，我陪同70高龄的石西民同志探望阔别半个世纪的家乡——浙江省浦江县。

江南仲春，阳光明媚，风景如画。小车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飞驰。一路上，梧桐洒下絮絮碎花，泡桐的枝头缀满了一嘟噜一嘟噜的紫花。清风，绿野，使人仿佛置身于绿色的海洋。石老摇下车窗，感慨地说：“我离别家乡已经40多年，现在终于又回来了！”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浦阳镇。车刚停下，他就兴冲冲地要去街上走走。凑巧，正碰上当地集市，一大早就从十里百里外赶来的人们，把能并行通过三辆卡车的百米长街拥挤得水泄不通。石老花白的头发顷刻融进了万头攒动的人流。这哪是在走？分明是在被人流拥向前。他停下了，眼睛盯着一筐绿油油的西瓜秧苗。石老浓重的乡音，使坐在扁担上的老农眯起了双眼，高兴地站起来。石老抓过一把瓜秧，像老朋友似地和他交谈起来。

石老来到面食作坊前，站在高高的木架中间，和工人攀谈如何揉面、掺水、放油、搁盐。边谈边笑，仿佛已经尝到家乡特



有的拉面的滋味。

忽然，石老拽住一个像鳗鱼般穿梭在人群中的小孩，深情地抚摸着他那苹果似的小脸。看着小孩天真的笑，他禁不住拉过来，亲了又亲。

石老又走向排成一溜的卖新茶的姑娘前，抓过一把青青的茶叶，放到鼻下闻闻，又撮几片茶叶送进嘴里，点头说：“我要捎几斤回去，让大家尝尝家乡的茶叶。”……

翌日清晨，石老来到雄伟的龙峰塔下。他翘首仰望、抚摸塔身……这风雨中矗立近千年的古塔，勾起了他多少绵绵的思绪啊！

石西民的老家在北乡的廿四都，距城约 20 华里。4 月 21 日，石老回故居探望。车在沙石路上急驶。天下起了小雨，远近苍翠欲滴的山峦，渐渐被一片乳白色的云雾笼罩。

小车钻进了云雾，在山的尽头一拐，呵！远远地出现了房屋、树木、人群，人们早在迎候远方归来的亲人啦！

车子刚停下，几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迎上来，和石老紧紧拥抱。

“可见到你们啦！大家可好？”石老一面和大家握手，一面激动地说。

“好！村上的人早就盼你回来看看了。”

石老也不休息片刻，便急着要看看家乡的变化。眼前，是一道雄伟的大坝，“壶源江水电站”几个大字光彩夺目。他不要别人搀扶，径自走向石阶，花白的头发在微风中飘动。他听公社书记介绍：电站装机 5785 千瓦，蓄水 97 万立方米，全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成了“长藤结瓜”式的水利网，旱涝保收田达到 70% 左右，粮食亩产达 650 多公斤……



石老边听边说：“我为家乡的变化，大家的幸福高兴！”

雨停了，太阳悬在正空中，洒下万道金光。石老说，他今天不回招待所了，他要和家乡的亲人共度夜晚。

在石老的母校——建德严州中学（原省立第九中学），石老回母校的消息不胫而走，母校的老师和学生为迎接阔别半个世纪的校友，沉浸在一片喜悦中。

4月22日，面对1000多名学生，这个当年风华正茂，为追求真理奔走他乡的老人动了感情：“我可敬的母校老师们、校友们！半个世纪前，在我踏上社会，参加革命的时候，是母校给我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我永远忘不了，是母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点燃了我革命的火种……今天，你们正年轻，历史赋予你们更大的重任和大显身手的机会。但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这两点。同学们要发扬为振兴中华死而后已的精神，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热烈的掌声，这是80年代新一代对一个老校友、一个革命前辈所寄予的殷切期望的回答。

为期三天的故乡之行结束了。当石老怀着沉重的心情，向这块美丽的土地告别的时候，眼眶又一次湿润了。

石西民返京后，以《乡情》为题，写了七律二首。其中一首唱道：

漫步东山塔影明，依稀往事梦难成；
欣闻生计初见泰，乍遇乡音倍觉亲。
雾障仙华岗滴翠，车回花树鸟鸣晴；
今生南北行多路，迟暮犹燃赤子心。



苦乐共度 50 年

——忆西民

吴 伟

1987年10月17日，是我最难忘的一天：西民走了，他永远地走了！竟没有给妻子儿女留下一句话。

那天下午，他在协和医院第二次输血。一周前输过一次，平稳无事，所以医生决定再给他输一次。刚开始输血，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雷仲平同志来向他汇报工作。我向西民耳边轻轻说：“待输完血再听吧？或者明天请他再来一趟？……”西民则说：“免得人家等，也不要麻烦人家再跑一趟……。”我素知西民为人，总是把公事放在第一位，为别人想的多，我不好再强劝。于是他一边输血，一边认真听汇报。仲平同志汇报完就立即起身告辞了。

西民输完血，感到有些不舒服。那时已是下班时间，医生有的回家了，值班医生也去吃饭了。我急忙找医生，一时又找不到。待护士把值班医生找来为西民做心电图、听心脏，又说均属正常。

可是西民仍然感到不舒服，而且愈来愈不舒服。这使值班医生有点不好办，就请医院派车把平常为西民治病的一位心脏病专家接来。专家来时，西民已有点昏迷，瞳孔有变，但心脏



仍在跳动，于是专家立即进行抢救。这时我才感到情况严重，心里很紧张，但有专家在抢救，总以为有希望抢救过来。抢救一直在进行，从傍晚到下半夜，西民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停止了跳动。当专家宣布抢救无效时，我全身瘫软，人也站不住了。死神突如其来，是我没有料到的，我想西民也没有料到。唉！我后悔，后悔至今，难忘那一天！西民走了，他永远走了！

在抗日烽火中结为终生伴侣

我和西民是1938年夏天，在南昌认识的。

1937年秋，北平党组织派我和邹恩徇（邹韬奋胞弟）、潘泳流夫妇等一批江西籍的进步大学生回江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时蒋经国刚由苏联回国在南昌工作，他是主张抗日的。我党估计在江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会是一个较好的环境。在南昌，我和潘泳流受党之命，创办了一个名为“妇声社”的妇女群众组织，并出版了一份刊物《妇声》。那时我和从上海来的作家夏征农夫妇、北平来的孙席珍教授等同住南昌市中山马路一幢三层楼洋房里（房主避日机轰炸，住到乡下去了，女儿是我中学同学，所以房子借给我们住）。到1938年，日军侵华战火已烧到江西。这时，范长江、孟秋江、刘尊棋、陆诒、石西民等一批名记者，先后来到南昌，准备去战地采访。“妇声社”就在我们住的楼下大厅里举办了一次简朴的茶会，由我主持。我代表“妇声社”欢迎他们来南昌，并请他们为《妇声》撰稿。因为他们和夏征农原是熟人，从此范长江、孟秋江、石西民等就经常抽空来我们住处聊天。秋江和西民来得最多，特别是西民，他



们常为《妇声》写稿。当时我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女大学生，夏征农常常和我开玩笑，要为我介绍对象，这时他就提到西民。我当时已是中共党员，找对象首先要考虑政治上的一致，我想石西民是党报记者，应该是党员吧，而他的为人看来很朴实，文章也写得不错，于是在心中就产生了爱的萌芽；而他对我也有所注目，经常邀我到外面去散步闲聊。我们终生不渝的爱情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1938年深秋，南昌政治形势日渐恶化，“妇声社”和我以及一批搞抗日救亡运动的同志，都受到国民党的特别注意，省党部书记范增波经常找我们的麻烦。于是我党就决定把我们分批疏散到皖南新四军去。

事有凑巧，西民这时接到重庆新华日报来信，要他到皖南去采访新四军抗日战况。于是西民和我同路离开江西，经浙江金华，准备转道去皖南。

我们到金华后，住在经济学家骆耕漠家里。他爱人已到新四军去了，他只租了一间房子，他和西民睡地板，把床让给我睡。第二天，房东把一间西厢房腾出来，作为我们的“洞房”，我和西民就这样结婚了。结婚那天，我们烧了几个菜，请作家黄源、上海女记者汪瑛和骆耕漠吃了一顿饭，虽然很简单，但毕竟是结婚喜酒。几十年过去了，不仅我忘不了，当年吃过喜酒的黄源同志，前几年来北京到我家作客，还开玩笑地喊我“新娘子”。

金华党组织留我在金华主编《浙江潮》副刊《妇女战线》，并在上层妇女中开展活动。这样，婚后没有几天，西民（和黄源等同志）去皖南，我则留金华，我们夫妇就匆匆分别了。为了避免特务注意，我把在南昌时的名字吴志元改为吴伟濂。我在金



华工作了一段时间,不幸病倒,党组织批准我回江西南丰县家里去治病,《妇女战线》由葛琴同志接手主编。

在家治病期间,父亲劝我把大学读完,我也觉得以后可能长期在白区工作,有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可能方便些。于是病愈之后,便去江西吉安(此时南昌已沦陷)通过“妇声社”找党。江西党组织同意我去读书。这时西民在皖南接到重庆新华日报来电,要他回报社,他也需经吉安去重庆,于是我们在吉安会合,同路去重庆。这是我们婚后久别的第一次重逢。

到重庆才有了一个小小的家

重庆党组织是廖似光同志和我谈话的,她同意我去读完大学。她问我到哪个大学去?我说我有一个堂兄在三台东北大学教书,他同意在经济上支持我,我想去这所大学借读。廖说:“那好,东北大学正需要一个党员去把党组织恢复起来,你还可利用堂兄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你去后,我们会派人来和你接头的。”于是我去三台读书,西民则留在重庆报社工作。我们重逢后仅仅几个月,又各自东西了。两年后,我在东北大学毕业了,带着在三台出生的大女儿小华回到重庆。因西民在党报工作,我在外工作不方便,于是组织上安排我也到新华日报工作。报社领导吴克坚同志要我改个名字(因我在白区工作过),我就把吴伟濂的“濂”字去掉,改名吴伟。我先在四版工作,后调资料室。我和西民婚后多年,分离时多相聚少,至此我们才算有了一个小小的温馨的家。

在党报工作,是供给制,虽然物质生活相当艰苦,但精神上却是愉快的。报社全体同志都为同一个共同目标积极工作,全



报社就是一个团结、友爱的革命大家庭。我在报社期间，又连生了二女小国和三女小秋。西民先是担任夜班编辑，后来调任采访部主任。这期间，他每天在外采访新闻，又肩负和各报社进步记者联系、做统战工作的重任。他每天东奔西跑，经常后面有国民党特务尾随。有一天，我说：“你够忙够累的，说不定哪天特务还下毒手哩！”西民说：“既要革命就不能怕苦怕累，更不能怕牺牲！”他说他17岁在上海入党后，一直担任党的联络员工作，经常要到工人中去送传单，组织游行示威，召开小组会，一直平安无事。又说1931年暑假回家，他和另一同志策动浦江与诸暨交界地区的武装起义，遭国民党通缉，通缉令就贴在他家门口。一位同乡赶紧跑来告诉他，他连家也没回，跑回上海了。

“既要革命就不能怕苦怕累，更不能怕牺牲！”他是这样说的，数十年来他也是这样做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新华日报工作，是一个忙人。日本投降后，筹办《新华日报》南京版未成，国共和谈破裂，我们撤到延安，在延安他身兼新华通讯社和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仍然是个忙人。撤出延安之后，他和同志们一面行军日走百里，一面还要坚持宣传报道，使国内外都能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其劳累可想而知。北平和平解放后，接着南京解放，他随军进入南京也是身兼南京新华日报、新华通讯社南京分社和南京人民广播电台三个单位的领导工作；后来又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每天都是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1955年调到上海，先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后任文教书记。上海是一个中外瞩目的大都市，文教工作面广、影响大，任务繁重，他更是夜以继日地扑在工作上。有些工作白天做不完，就利用夜晚时间来完成；他做



报告也是自己利用晚上时间草拟稿子。在上海工作 10 年,他很少是在夜晚 12 时前就寝的。

他唯一的嗜好是买书、读书

如果哪天晚上没有工作,他就看书。他看书的速度很快,傅雷翻译的厚厚一本法国小说,他可在两个无事的晚上一口气读完。他说,傅雷翻译的小说,就是译得好,拿上手就放不下。

西民爱读书的习惯是从青少年时期养成的。他在严州中学读初中时,有位语文教师姚伯谦先生,讲课非常好,引发了西民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经常去学校图书馆借书看;后来到了上海读高中,更是大开眼界,看了不少进步书刊。读了郭沫若的《女神》,思想深受启发。在北平读大学时,也是学校图书馆的常客。解放后,他在上海工作,只要星期天没什么公事处理,他就驱车到四马路一带的书店和荣宝斋去看书、看字画,经常是买几本带回,那些书店老板、经理们都和西民结成好朋友了。可西民在生活上却马马虎虎,不讲究穿着。他调到上海工作,我们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才告别了那套穿了多年的军棉衣,在上海估衣店里各买了一件旧呢大衣,每件 60 元。后来他有了外事活动和几次出国访问,才做了两件新衣服。平时一日三餐,有什么吃什么。为了照顾他的健康,他比家人每天只多一杯牛奶而已。



一件令他深感遗憾的事

西民一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这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的。在他担任上海文教书记期间，为了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和一些专家学者建立了深厚友谊。由于他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对知识分子十分尊重、关心和爱护，许多知识界朋友有什么问题都愿找他谈心。

1957年他受命负责《辞海》修订工作，此项工程浩大，因此邀请了全国各地专家参加。当专家来到上海，西民如果因工作缠身不能亲去机场或车站迎接，那他就一定要在当晚去看望他们，以示尊重和欢迎。在讨论问题时，他认真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并作笔记。专家们心情舒畅，各抒己见，努力工作，使修订后的《辞海》未定稿能及早问世。不少专家对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说：“你们的文教书记没有架子，一派书生气，平易近人，知识广博，对于辞条如何修订提出的意见不少都是中肯的。”《辞海》名为修订，实为重新编写。西民负责这项工作，任务重，时间紧，为此付出了不少精力和心血。“文革”中，“四人帮”竟以这项作为西民罪状之一，多次批斗，令人心寒。

1957年反右运动中，一批有才学和专长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这使他深感痛心。他不顾个人安危，对傅雷、刘海粟等一批堪称“国宝”级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挺身力保，但最终还是没有保住。西民虽然无法改变这一切，但当他得知被打成右派后的傅雷生活困难，就立即伸出援手，曾为此专门写信给上海出版部门，指示继续出版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以便傅雷



可得到一笔稿费,维持生计。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有些到西北边远地区去劳动了,三年困难时期,有些人身体垮了,来信向西民求援,西民千方百计把他们调回上海,安排工作。

尽管他做了一些补救工作,但我知道他在反右运动后的心情是从未有过的沉重。记得反右后期,一天夜晚已过12点了,从他书房传来叹气声,我起床到书房一看,只见他一支烟一支烟地接着抽,心绪极坏。我惊奇地问:“出了什么事嘛?”他说“上面”批示:上海右派打得不够,还要通过整风补课补一些。他感叹地说:“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把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都打光了,对我党工作极不利;打成右派后,本人也不能工作了……。我想来想去实在不好办,只能补一二个,以应付‘上面’,不能多打。”说话时语气沉重,平时很少见他如此激动。

“文革”后,西民和我曾到上海、南京一带看望老友。在上海时,有一次一位新闻界老友请我们吃饭,西民在闲谈中提到整风补课中不得不补两个右派这件事。不料席间有位同志佛然而起,说“我就是那次补上去的一个!”后来我们回到住处,西民对我说:“今天聚餐,没料到会有这种情况,我无思想准备。唉!当时我应当站起来,举杯向这位同志陪礼道歉才是,我没这样做,很对不起他。”今天回想起这件事,我以为,如果说西民生前有什么遗憾,这件事应是他最大的遗憾之一。

江青为什么说“石西民是个坏人”?

西民从17岁参加党,数十年无私无畏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精力。但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却遭到残酷的批斗,被关押了八年多,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无论



在批斗会上,还是在关押期间,他从不透过于人,从不乱写交待材料,更不揭发别人。江青在“文革”中曾两次咬牙切齿地说:“石西民是个坏人!”江青为什么如此仇视石西民?我想一是怕石西民知道她30年代在上海的老底,向人去说;二是解放后江青曾多次到上海,起初上海市委把接待江青的任务交由石西民负责。江青以毛主席夫人身份自居,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极难侍候。西民为人耿直,内心十分厌恶江青这种作风。后来西民藉口工作忙,怕接待任务做不好,请市委另派他人负责,市委就改派张春桥去负责接待江青。这可能引起江青的不快,所以“文革”中她必欲置西民于死地。

西民被关押八年多,“四人帮”找不到他的罪证,于1975年5月释放后,给他作了一个“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结论。

出狱后,西民一身病,先住朝阳医院,后转协和医院。不久又被驾上工作岗位,先在出版局负责,致力于《鲁迅书信集》的编纂和《鲁迅全集》的校订、出版。后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分管科学研究规划局、文学研究所、新闻研究所和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等几个单位的工作。这时,他虽年近古稀,身体不好,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將全身心扑在工作上。

为了使《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出版能按期胜利完成,他抱病把郭老全集通读了一遍,每一集的注释终审会他都认真参加。还写了《纪念郭老、学习郭老——郭沫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感怀》和《郭沫若与〈十批判〉》等文章,受到学术界重视。这期间,他曾先后两次带团出国访问,一次是带领一个学者访问团出访日本,他在日本所作的学术报告,受到好评。另一次是带领一个新闻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等三国,回国后写了长篇



访问记在刊物上发表。

直到晚年，他爱买书、爱读书的习惯不变。每周日他就抽出一点时间到北京内部书店去看书，每次都买回几本。“文革”中我家被抄，他的书全被抄走。他释放回家后，落实政策，退回了一部分书籍。西民爱家乡情切，把退还的约3000册书送给老家浦江县图书馆，自己留下了一部分。老朋友们来看望他，见他不是伏案写东西，就是读书。

西民75岁就离开了人世。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文革”对他的摧残，如果晚年不是那么劳累，他可能不会死得这么早。西民辞世消息传出后，上海、南京、四川、浙江等地认识他的朋友、同志无不痛惜，唁电唁函从四面八方纷纷飞来。其中有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池田大作教授等打来的唁电，有来自香港名演员夏梦等拍来的唁电。还有不少战友在报刊上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悼文。这些深情厚谊，足以告慰西民于九泉之下，也使我和孩子们永远铭记在心。

转眼间，西民同志离开我们快10年了。10年时间不长，然而人事沧桑，世界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值得欣慰的是，世事虽如白云苍狗，而健在的朋友们没有忘记西民。在西民逝世10周年前夕，经过朋友们的热心奔走，得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和省出版部门的大力支持，得以出版了《俯仰之间》这本纪念文集。这就足以说明，西民至今仍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对此，我和孩子们除了说声“谢谢”，还能说什么呢！



友情·亲情·乡情

——怀念大哥石西民

石士助

我的家乡坐落在浙江省浦江县西区的一个山村里。这里山青水秀，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山村。我家兄弟五人，石西民是我们的大哥。他11岁时就由一位当老师的姑夫带去离家50多公里的金华上学。16岁到上海读高中，一边读书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因为我比他小15岁，在一起的时间极少，小时候只记得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父亲是一个封建思想比较严重的人。他让我们读书，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能够赚钱，能寄钱回家。可是事与愿违，我大哥和二哥外出读书后，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他们不但没有给家里寄一分钱，有时还向家里来要钱。更令我父亲担心的是听说我大哥还参加了共产党。大概在30年代初，我父亲一气之下，竟亲自跑到上海，想强制我大哥回家。我大哥得到消息后便躲到朋友家里，以致我父亲遍寻无着，只得独自回家。大的管不住就管小的，刚读完初小的三哥从此就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以后就一直在家里务农。第二件事是，1932年暑假时，一天早起开门，看到隔街对门墙上赫然贴着一张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通缉令，通缉的对象就是我大哥。我大哥原名石士耕，这张通缉令把“耕”错写成“根”，加之乡村



里识字的人很少,使他得以及时脱逃。还有是1938年秋,我在县城小学读书,他曾到我寄住的小姨家来看我,以后还陆续寄给我《萍踪寄语》、《表》等一些书籍。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采访时,奉命回重庆《新华日报》途中,顺道回乡探望的。此后,他一直在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没有机会回家,也极少写信,解放战争期间更是音讯全无了。

解放后,他先后在南京、北京工作。当时,我几次大吐血后卧病不起,发现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左右两肺都有病灶,右肺还有一个空洞。那时,我无经济来源,他就为我负担了很长时间的生活和医疗费用,使我得以死里逃生。1955年后,他在上海工作近10年,虽常有机会见面,终因他工作繁忙,见面也只是问好而已。我和他接触较密、交谈较多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几次来上海治病、开会,以及一次和他一起去金华参加邵飘萍诞生100周年纪念活动,一次和他同回老家。在这些接触中,对他的处事和为人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他对知识分子,不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都非常尊重和爱护。这类事我听人说了不少,在我和他的接触中,我也深刻地感觉到了。他在上海长期负责文教工作,接触的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他虽然尽可能设法保护一些知识分子,但在那样的政治气候,还是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粉碎“四人帮”后,他第一次来上海治病,他计划中的一件事就是亲自上门向在他工作期间政治上受过伤害的同志当面致歉。可是他到了上海以后,许多老同志,包括政治上受过伤害的同志,纷纷去他的住所探望,使他大为感动。他在回京后给我的信中说:“这次上海之行,看到了许多老战友老熟人。大



难之后，旧地重游，与友人畅叙离情，确是一件快事。出我意料的是，一些政治上受过伤害的好同志，他们也来看我，而且不要我提起向他们道歉的话。我说你们对我耿耿于怀，也就不会来看我，来看我就是对我的谅解，但我的歉意还是要说的。特别是×××同志也来看我，还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方知你过去还是很关心我的生活的。”他深为自己能得到别人的理解而欣慰。

1982年1月，原解放日报总编辑魏克明同志去世，他因故没有及时看到讣告，当他知道后，怀着深深的歉意和敬意在信中说：“由于躲在国务院招待所开会，一个星期没有去社科院院部。春节前两天，会议结束去院部看到魏克明同志的讣告，遗憾的是追悼会时间已过，送一个花圈也来不及了。我对这样一个老战友的逝世，内心感到非常悲痛。”“我本来想写一点短纪念文章，悼念这位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老新闻战士。魏克明同志正派、俭朴，待人诚恳，对是非好恶，立场鲜明，非常有原则性。”“可惜由于日子过去，好多情景记忆不起来，难以下笔。如果你能为我收集一些材料，特别是我们在上海一起工作时的材料，我还想试试。北京新闻研究刊物上应该有介绍他的文章。如果姚天珍同志（魏克明同志夫人——作者注）还在工作，请代我面致慰问。”收到这封信后，我除了向姚天珍同志转致慰问之意外，也曾设法查找他所需要的材料，可惜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符合他要求的材料，以致这篇悼文也没能写成。

1984年，他在上海治病时，适逢新闻界前辈俞颂华逝世40周年和《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殉难50周年，上海新闻界为此举行纪念活动，他都参加了，并在会上发了言。11月，我收到了金华发来的邀请函，邀我并要我转邀我大哥（他们知道他



在上海)去金华参加新闻界先烈邵飘萍诞生 100 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他身体虚弱,医生劝他最好不要远行,但出于对这位新闻界先烈的崇敬,加之有我同行可以照顾,便决定前去参加。在纪念会上,他倡议在邵飘萍的家乡金华为其塑造半身铜像,以纪念这位优秀的文化战士、杰出的新闻记者。第二天,新华社报道了这个倡议,金华有关方面当即把它列入了议事日程。回京后,他便分头写信或打电话,抱病联系首都和各地的主要新闻单位,想方设法为塑造铜像筹集资金。在各新闻单位的热情支持下,资金到位了,接着又为铜像的设计出谋划策,一直到最后为铜像审定设计图稿。遗憾的是,1986年7月,当铜像建成,金华邀请他去参加揭幕仪式时,他已重病在身,无法前去参加了。

他对我们几个弟弟,从政治上到工作和生活上都关心,有热情的关怀,也有严格的要求。二哥就是由他介绍去延安抗大学习走上革命道路的。后来,二哥在浙江工作时一度脱党。解放初,二哥要求组织上恢复其党籍时碰到了困难,很有意见。大哥知道后就向他严肃指出:这件事首先得你自己好好检查,不能去怪任何人。他俩年龄相近,相处时间较多,感情较深。1987年8月二哥因医疗事故去世,大哥在告诉我这个消息时说他“悲痛万分,泪如泉涌”。1979年,三哥因患胃癌来沪开刀,大哥每月寄钱给他,供其疗养之用,直到他去世。50年代,三哥的儿子一时没有考上高中,想请大哥为他找个工作。大哥听后说:考不上学校就留在农村,农村也是需要知识青年的啊!我们最小的弟弟也是由他介绍去二野军大学习参加了革命工作的。弟弟先在西南后来调到北京工作。大哥在来信时常常提到他,发现他经济上有困难时便给他一点帮助,发现



他心情不好时，便要我多写信和他谈谈心。

在和大哥一起的时候，或在他给我的信中，他经常对我的工作和新闻资料研究工作提出希望和鼓励。我知道他在任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时曾兼任过资料研究室主任，当时正是中央有关部门提出新闻工作采（访）、编（辑）、资（料）三者并重方针的时候，他们在资料研究室设立了解放区、国统区和国际三个研究组，进行资料研究工作，他是深知新闻资料研究工作在整個新闻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1980年，我们在全国率先创办了《报刊文摘》，我寄报纸给他，他说他是每期都看的，还说“每期都有一些东西可看”，“北京一般熟人都反映你们办得不错，继续努力吧！”1986年，上海一家刊物介绍了我的工作情况，他看到后给我来信说：“看到刊物又在表扬你的勤奋工作，甚为欣慰”，并鼓励我能“利用自己的优势，除日常工作外，编撰几部有用的书”。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惜我忙于日常工作，只在1989年和其他四家新闻单位的有关人员合编过一本《上海全书》。还记得有一次和他闲谈时，我向他介绍了我们报社保存的从《申报》留下至今的许多珍贵资料亟需抢救，而报社又缺乏资金时，他想了一会说：“啊呀！去年中国社科院有相当大一笔拨款没有用完，年底上交了，如果我早知道，倒可以为你们争取争取的。”在他30年代曾在《申报》工作过，深知这些资料的价值，也确实很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点忙，可惜机会已失，未能如愿。

1987年夏天，由于天气炎热，晚上不能入睡，他本来就有的心脏病和肾脏病一齐发作，住进了医院。医院里有空调，经过20多天的休息治疗，病情得到了控制。出院后，为了预防明年夏天再度犯病，便给我写信，要我在上海打听并购买一台适



合他家用的空调。我正在打听了解有关空调情况时,想不到10月份他的病情突然恶化,竟不治去世了。这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联系。

我大哥从小在外,在家乡的日子屈指可数,但对养育他的故土的感情却并不淡薄。1956年,家乡出版《浦江报》,他为报纸题写了报名。1960年,他介绍家乡的地方戏婺剧团来上海演出,后又介绍去北京演出,推荐给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两地的演出都很成功,报纸发表了不少文章,备加赞赏。1984年他在金华参加纪念邵飘萍诞生100周年活动时,正在衢州演出的浙江婺剧团,听说他到了金华,便来电请他去衢州看戏,他得悉后便不顾两天来活动的疲劳,欣然前往。浙江婺剧团已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还借此机会,参观了有名的南宗孔庙和一些珍贵文物。1981年5月24日,他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对故乡的一点期望》一文,从回忆1956年在杭州一次会议上听毛主席讲编写乡土教材的重要性,谈到希望故乡能重视和做好地方志的编写工作。他还在汇编他的文集《时代鸿爪》时,特地把1934年撰写的评述灾后家乡农村形势的《亢旱后的浦江农民生活》一文排在第一篇。退居二线后,他和家乡时有书信来往,他非常关心家乡的两个文明建设,对家乡地方志的编写、党史的征集、文物的保护、文化工作的开展以及地方戏的继承和发展等都很关心,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

解放后,他只在1960年冬因母亲去世奔丧回家住过一夜,因此他后来几次来上海治病和开会时,常和我说起,想在什么时候能回一次家乡看看。这个愿望,因工作和身体关系,一直到1982年才得以实现。这年4月,他和大嫂吴伟同行,到上海和我会面,在杭州稍事停留后即乘汽车去浦江。此时正是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之际，田野一片青绿，汽车在两旁盛开着泡桐树花的公路上行驶。他一边观赏车窗外的美丽景色，一边饶有兴趣地向我们介绍浦江建县的历史和家乡几位革命老同志的事迹。在家乡期间，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农田、水利、电站、集市和名胜古迹，观看了家乡戏。在老家的村子里，他在村干部带领下，走访了全村 300 多户人家，向父老乡亲问好，虽然他认得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但始终沉浸在浓浓的乡情之中。当他看到家乡在改革开放后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心情非常愉快，途中曾赋《乡怀》诗两首，中有“田园景色迷人眼，耄稚欢颜醉客心”、“今生南北行多路，迟暮犹燃赤子心”之句。游子深情，跃然纸上。

1960 年的回乡和这一次的回乡，两相对比，使他感慨万千。他在后来为《浦江县志》所写的序言中写道：“解放后我曾两次回到浦江。第一次是奔母丧，时在 1960 年初冬，浦阳镇街上冷冷清清，营业的商店货摊很少，走近自己的村庄，田野里没有人影，乡亲衣衫破旧，面有菜色。作为一个党的干部，我怀着负咎的心情，第二天早晨送母亲灵柩上山后，无法不痛苦地告别。第二次回家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城内大街上熙熙攘攘，商业繁荣，工业也随之而兴，教育文化都有发展。我回到家乡，村中父老笑语相迎，家家户户都吃上了大米饭。两番回家，两番景象。为政者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关系国计民生如此之巨大，历史教训永值铭记。”在乡间和干部、父老乡亲交谈时，他总是怀着歉意说：我一辈子在外，对家乡没有什么贡献。1987 年 4 月，也就是在他去世前半年，他把自己的藏书 3000 余册，派女儿小秋专程送到浦江，赠给浦江县图书馆。这可以说是对故乡的最后一点贡献，也是对故乡的最后一片爱心了。



父亲留给我们的无价宝

吴捷

1987年10月17日，在“文革”中心肾受到极大损伤的父亲，在住院输血中突发喘憋，心脏停跳，未留下一句话，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时光飞转，不觉九个年头过去了。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兄弟姊妹六人，工作岗位不同，但做人如一，即爱国爱民，朴实务实，待人以诚。这是父母亲在日常生活中待人处事，身教言传，大量不言之教的结果。这笔无形财富，弥足珍贵。

父亲一贯主张儿女不要靠父母，走自己发展的道路。我们各人喜好什么，将来选择什么专业，父母一般不干预，尊重个人的意愿。1963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上海正在动员知青去新疆支边。当时父亲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亲自负责此事。我和同校的一批团干部及二姐受到鼓舞，要求不参加高考，报名奔赴新疆。父亲听说后表示支持，一点没含糊。虽然学校后来要求我们参加高考，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而最终我们分别走进了解放军和保密单位的大门。从这件事，我们看到了父亲支持我们自己选择人生道路，报效祖国的热忱。

父亲一贯尊重人，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劳动者，均待之以诚，而且爱才，惜才。父亲在沪工作10年，曾主管上海和华东的文教宣传工作，因而与我家往来的知名人士不少。记得住



在武康路4号时，一天，傅抱石、唐云和谢稚柳等先生来访。我外公吴士桢，江西南昌人，工篆书，曾为华东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傅抱石曾是他的学生，傅还与我母亲共过事。外公说过，傅在中学时期已迷刻印章，上课时常搞“副业”。那天相聚甚欢，家中留饭。杯酒过后，三位丹青高手便在父亲书房中挥毫作画。傅抱石画了两幅人物，落笔不多，却古朴传神。另两位大师画的是山水，在有限的幅面中展示了无限的宁静秀美。画被制成了挂屏，至今仍挂在家中。

父亲非常热心于振兴昆剧、婺剧(家乡戏)等古老剧种。他曾对上海京昆戏校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满腔心血。父亲兼任该校名誉校长，常去学校了解情况，观看教学及结业演出。校长俞振飞和夫人言慧珠曾多次来我家，商谈校务。他们精心培育的学生，如李炳淑、蔡正仁、梁谷音、岳美缇、杨春霞、蔡瑶铣、孙花满、王芝泉等，后来名重一时，如今分别是南北剧团的骨干演员。父亲积极促进上海京昆剧团去香港演出，结果盛况空前，媒介好评如潮，引起了国内的注意，昆剧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赏识，一批青年演员由之声誉鹊起。他们常来我家玩，没有作客的那份拘谨。父亲跟俞老及他的学生们谈戏、谈学习、谈生活，非常融洽。有一次我随父亲去戏校，李炳淑见我手上冻疮溃烂，还帮我用纱布包扎。大家相处如家人。“文革”后，父亲与他们在上海或北京重聚，流失的岁月丝毫未减昔日的亲切之情。

对于普通劳动者，父母同样尊重。我在上海一师附小读书，班上同学普遍淘气，有些同学在课堂上比教课的老师还忙。我们的班主任刘成瑞老师，年轻持重，非常耐心地教育我们。他来家访，母亲待之以礼，时逢端午，非要留他吃了粽子再



走。我现已届知天命之年，回忆起来，刘成瑞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教师。我家在上海书记处大院内住过几年，与司机、保卫、阿姨等多人相熟，父母对他们随和友善。“文革”期间，他们中从无人给我父母贴大字报。这些人与我家大人小孩间友情长存，至今保持着联系。父母去沪，或他们来京，总要欢聚叙旧。我家保姆谈慧珠全力照料我们10口之家，她扬州乡下有一儿一女。女儿玉琪，父母让她来我家住，与我们姊妹相称，父母待之如己出。玉琪姐姐后来上学、工作，乃至成家育女，父母均很关心。那些工作人员，就是从这些事上看重父母为人的。

父亲最突出的长处是宽容仁厚。我们子女从未听他说过别人不好，却常常听他赞扬别人或自谦自责之语。长期来，我国政治风云变幻，演绎了多少人间是非恩怨。父亲经历了风风雨雨，却一生不言人短。古之君子，待人轻以约，责己重以周。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人？

我在上海读中学时，爱好很多，参加了区里和市里的一些校外活动。因不愿让人知道自己是市委书记的女儿，便自行改随母姓，另起了名字。过了许久，父亲才发觉，他说“好哇，你都不跟我姓了，也不给我打声招呼。”然而，仅此而已。我自己起的名字沿用至今。

父亲对祖国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常告诉我们，要多与工农子女交朋友。三年困难时期，父亲享有高干补贴，但他要求我们在学校吃饭，而不是在家“揩油”。他和母亲都主动削减月粮食定量至二十四五斤。在那些日子里，我与大家在食堂排队打饭，菜里无油无肉，常是水煮洋白菜帮子，或是几片胡萝卜，而且菜汤浑浑的。一天粮食定量有限，总感到饿。拿着饭卡，常要为哪顿饭少吃一两、挺过去而踌躇。在那时，我常跟



阿姨三四点钟起床，奔往菜市场排队。有时丢块砖头占好位子，回来再睡一会，至五点半左右再去，正赶上早市开张。经历上述种种，使我们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大众，有了与人民共甘苦的体会和感情。祖母于1960年冬去世，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奶奶是病死的。近两年回到老家，众人告我，奶奶其实是在困难时期饿死的。村里吃食堂，可是没什么吃的。由此可见父亲一生从不搞特殊化。

父亲虽然工作忙，但有时也挤出一点时间与子女交谈学习、工作和做人的道理。记得有次二姐向父亲汇报学校对她的思想品德的评语：“勤恳朴实，不像高干子女”，父亲马上打断说：“什么高干子女？你是公务员之女！”教导我们永远不要以特殊身份自居。

父亲深爱中国古典文学。他在我们年幼时，就教我们背唐诗。待我们年纪稍长，又布置我们背诵《唐诗三百首》，稍后是《古文观止》。他有时亲自讲解重点章句，或抽查我们背诵的进度。我11岁左右时，他曾以《冬雪》为题，让我和两个姐姐各作诗一首，他听后讲评一番。时隔久远，我尚记得自己第三句为“白雪来致农家益”，父亲说“来”与“致”皆为动词，叠用为累。家中几千册的图书将我们带入了跨时空的精彩纷呈的世界，家中往来的文化人谈古论今，在如此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我们早早地就知道祖国文学宝库中竟有“碧云天，黄叶地”那么优美精炼的文字。我们在垂髫之年，已被父亲口授范仲淹的《岳阳楼记》。1984年，我留英归来，惊喜地发现8岁的儿子也能熟练地背诵《岳阳楼记》，且念得饶有韵味。问后方知，是因周末看望外公外婆时，被外公叫过一旁亲口教出来的。父亲对膝下两代人从小就注重培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胸怀，树入之心可谓良苦。

父亲深沉的爱国爱民感情来源于他的民本思想境界，又是与哺育他成长的家乡密不可分。浙江浦江县，位于浙江中部偏西，境内仙霞岭余脉诸峰叠翠，浦阳、壶源两江交汇出的盆地铺金，浦江又是天台宗法脉传承和印度高僧宝掌和尚驻锡的地方。县内水清林秀，民风醇厚，历来崇尚馆学。民间从事剪纸、书画、刺绣者众。灯彩精绝，熔书画、扎制工艺于一炉，声名远播。当地流行的“乱弹”、婺剧，曲近昆腔，优美动听。建县1700多年来，涌现了吴莱、柳贯、宋濂、张书旂、吴弗之、张振铎等著名文人和艺术家。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父亲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底蕴。他周围的人是那么质朴、勤劳、礼让。奶奶为人仁厚，常备粥桶置于街口，接济往来断炊的穷人，他人有难，常倾囊相助。她虽去世多年，至今乡中口碑极好。这些都给予了父亲极深刻的影响。以至他10岁离家，到老还能操家乡话与父老们促膝谈心。

父亲暮年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于1987年3月派我护送3000册赠书至老家图书馆，为家乡的繁荣尽自己最后一点绵薄之力。在辞世前给家乡县志撰写的前言中，他用最后的激情，号召为家乡，乃至为中国的昌盛几代人作不懈的努力。读来令人感奋不已。

父亲的老师夏承焘先生曾有言：“五车身后事，百辈眼前恩”。人的一生是短暂的，父亲为国家和子孙后代做了诸多有益的事情，特别是他留下的做人之道，其意义是久远的。平常、自然，却又是那么的隽永，让人回味无穷。这就是父亲永久存留在我们心中的精神。



编 后 记

1987年10月石西民同志逝世后，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悼念和回忆他的文章，作者有文化、新闻界知名人士，有和他并肩斗争多年的战友，有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他们和逝者的交往有深有浅，文章角度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对西民一生的高风亮节充满景仰之情，对知识分子失去这样一位堪称“知音”的领导者 and 友人深感痛惜。虽然大多是一时一事或某一侧面的片断回忆，而集中起来，就足可烛照西民同志的全人。

我们早有这样的愿望：搜集整理这些悼念回忆文章，编印成册。这既是对逝者的最好纪念，也是让后人知道，在20世纪的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把毕生心血献给革命事业、在不少方面堪称楷模的知识分子。

西民同志在南京、在江苏工作的时间，解放前后加在一起，不到六年。时间不长，而留在这里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他是南京《新华日报》的创始人，又是1952年建省后的首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解放初期的思想文教战线任务十分繁巨，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领导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江苏的同志，不会忘记石西民。1996年春，江苏省新闻工



作者协会主席樊发源和我们两人共商后，联名给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霞林和常务副部长王建邦写了一封信，建议江苏出版《石西民纪念文集》，在1997年石西民同志逝世10周年之前问世。霞林、建邦等同志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并请出版部门办理。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迅即纳入选题，并选派经验丰富的同志担任本书责任编辑。在如此热情支持下，我们虽年迈力衰，却深感责无旁贷，只有勉力承担全书编辑业务。

西民同志的夫人和战友吴伟，在编辑工作中给予了全力协助，令我们十分感动。她以耄耋之年，不仅为本书撰写了《苦乐共度50年》，提供了有关西民生平事迹的重要史料，还邀请京沪等地友人补写了一些回忆文章，使本书更加充实、全面。为了编好这本书，仅书信往还，就费去老人不少时间和精力。

全书编排，大体上是按西民同志工作的时间、地区先后为序。和西民相识较早者的文章，作为一组置于卷首，以下依次为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的友人。西民亲人写的文章，置于全书最后。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西民同志的著述，我们把林放（赵超构）和张友渔分别为《时代鸿爪》和《报人生活杂忆》二书撰写的序言及报刊评论，一并收入，以供读者参阅。

这本文集，酝酿多年，曾得到一些新闻界前辈人士的关注。我们曾通过上海的谢蔚明兄，先后约请赵超构、徐铸成先生作序。他们都是西民同志的挚友，虽重病绕身，仍欣然应允。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二老均未能如愿，即相继作古，本书序言因此而付之阙如了。

今年夏秋之交，著名学者、百岁老人陈翰笙先生听说《俯



仰之间》即将付梓，欣然命笔为本书题签。据吴伟同志信告，老人手持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天内写了四行，供我们选用。此前，著名经济学家、西民生前挚友薛暮桥先生也曾题写了“石西民纪念文集”七字；可是当我们去信再请他补书《俯仰之间》四字时，这位93岁高龄的老人已经住进医院，我们不便再去打扰他了。对两位前辈学人给予本书的关怀，作为编者，我们谨一并表示谢意。

在西民同志逝世九周年之日，我们完成了文集的编辑工作。这是我们献给亡友和老领导的一瓣心香。

编辑工作中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淮冰 姚北桦

1996年10月17日



- 书 名** 俯仰之间——石西民纪念文集
- 主 编** 姚北桦 王淮冰
- 责任编辑** 倪正太 王 田(电话:025—6639664)
-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电话:025—3210466)
- 地 址** 南京 210009 中央路 165 号
-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 照 排**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 印 刷 者** 无锡春远印刷厂
-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 张** 9 插页 2
- 印 数** 1—3600 册
- 字 数** 200 千字
- 版 次**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784—9/K·256
- 定 价** 14.00 元(软精装)
-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